

2021 “北外学术期刊” 电子专辑（二）

疫情专题

“Corona Virus Disease” Special Issue

本专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学术期刊方阵2020年刊登的论文中

摘取部分优秀文章，以飨读者。专辑摘自《国际论坛》

《区域与全球发展》《中国ESP研究》等刊物。

更多文章及期刊信息请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公众号：北外学术期刊

目 录

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评析 《国际论坛》	1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国际论坛》	8
欧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机制及其局限 《国际论坛》	20
全球危机管理视阈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理念、制度和措施 《区域与全球发展》 ...	29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经济展望——基于国际制和知名智库的判断 《区域与全球发展》 .	37
新冠疫情背景下对特朗普民粹主义言论的解读 《区域与全球发展》	55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及应对分析 《区域与全球发展》	65
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治理：改革与限度 《区域与全球发展》	74
美、意、韩三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模式差异探析——基于国家自主性视角 《区域与全球发展》	83
新冠疫情扩散背景下的西方对华污名化 《国际论坛》	90
新冠疫情期间世界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 《国际论坛》	102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 《区域与全球发展》	113
关于后疫情时代 ESP 教育改革的思考 《中国 ESP 研究》	123

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评析^{*}

晋继勇 郑 鑫

【内容提要】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重要行为体，联合国在实践中遵循了基于人权、发展和安全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通过构建自身人权议程框架中的卫生话语和议题，联合国基于人权的公共卫生治理理念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价值引领；通过在全球发展战略或倡议中设定健康改进目标，联合国明确了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理念；通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中采用安全话语或安全考量，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安全理念提升了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中的能见度。毋庸置疑，联合国上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新冠疫情防控，但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的原则制定不明晰、卫生问题“政治化”等诸多问题，对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和公平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关键词】 联合国；全球治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冠疫情

【作者简介】 晋继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郑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0083）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20.06.001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20）06-0003-17

^{*}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公共卫生全球治理战略研究”（批准号：KY01B0222016007）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影响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有效性的因素研究”（项目编号：51000754）的阶段性成果。

联合国是当前众多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主体中的重要一员。随着全球卫生安全危机的频发,联合国也频繁通过全球卫生的相关决议,凸显了该组织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参与导向。全球卫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生物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到人权保障、社会发展和全球安全等众多领域的综合性议题。在联合国的实践中,人权、安全和发展三大理念成为其行动的支柱,这三种理念也在联合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行动的过程中得以贯彻,并以此为支撑构建起了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框架。2019年底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政治以及国际安全构成了史无前例的挑战。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人权理念、发展理念以及安全理念在全球新冠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明晰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主体理念,并探究其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推进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方式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人权理念: 治理活动的价值引领

人权与健康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战后,随着人权运动的发展和对健康问题影响因素的深入理解,卫生治理与人权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联合国在推动二者的结合上发挥了引领性的作用。作为联合国纲领性的文件,《联合国宪章》是第一个承认人权的国际条约。人权保护和促进原则成为联合国工作的价值尺度。^①在联合国人权体系建设的推动下,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人权也逐渐从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权利。^②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人权理念的实践归依于以下两条路径。

(一) 人权体系中的健康权理念

联合国在自身人权体系的构建中,将健康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包含在内,通过国际公约的形式赋予健康权合法性,并以此为卫生治理实践树立价值引领。1948的《世界人权宣言》成为联合国人权领域实践的基础,其中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

① Lawrence O. Gostin, Benjamin M. Meier, et al., “70 Years of Human Rights in Global Health: Drawing on a Contentious Past to Secure a Hopeful Future,” *The Lancet*, Vol.392, No.10165, 2018, pp.2731-2735.

② Lawrence O. Gostin, “*Global Health La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要的社会服务。”^①这一文件正式确立了健康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地位，为健康权理念的进一步细化奠定了基石。1966年，联合国通过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是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人权理念发展的又一重大成就。其中第12条规定：

“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权享受可能达到之最高标准之身体健康与精神健康，”^②并从多个方面提出国家为达成目的所需采取的必要措施。通过明晰《世界人权宣言》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确定的有关健康的人权理念，联合国以此为依托开展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行动。

冷战的终结使得人权观念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发展中自然也包括对健康权的认知。2000年，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通过了第14号一般性意见，其中对健康权的定义被普遍视为权威性的解释。^③“健康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可以分解为更具体的权利。例如：产妇、儿童和生殖健康；健康的工作场所和自然环境；预防、治疗和控制疾病，包括获得基本药物；获得安全饮水的权利。”^④这一意见是联合国在健康权定义问题上的重大进展，为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人权理念的推进提供了清晰的概念和政策指导。^⑤在上述决议基础之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2002年4月设立健康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负责监测世界各地的健康权状况，并与有关行动者对话，促进健康权的实现，进而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⑥

① 《世界人权宣言》，<https://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

②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2200-XXI.shtml>。

③ 参见 Lisa Forman, “What do Human Rights Bring to Discussions of Power and Politics in Health Policy and System,” *Global Public Health*, Vol.14, No.4, 2019, pp.489-502; Lawrence O. Gostin, Benjamin M. Meier, et al., “70 Years of Human Rights in Global Health: Drawing on a Contentious Past to Secure a Hopeful Future,” *The Lancet*, Vol.392, No.10165, 2018, pp.2731-2735; Alice M. Miller, et al., “Sexual Rights as Human Rights: A Guide to Authoritative Sources and Principles for Applying Human Rights to Sexuality and Sexual Health,”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Vol.23, No.46, 2015, pp.16-30.

④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August 11, 2000, <https://www.refworld.org/pdfid/4538838d0.pdf>.

⑤ Lisa Forman, *A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Global Health Policy: What Contribution can Human Rights Make to Achieving Equity*,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3, pp.459-482.

⑥ UN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the Enjoyment of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health/pages/srrihealthindex.aspx>.

（二）人权理念引领下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实践

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动议中强调保障人权的重要性，并以此为支撑将人权理念付诸卫生治理实践。1978年，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号召下，阿拉木图国际卫生会议顺利召开，各国共同签署了《有关初级卫生保健的阿拉木图宣言》。该宣言设定了到2000年实现“人人共享健康”（Health for All）的目标，并明确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政府对其公民健康负有责任。^①《阿拉木图宣言》是人权理念与卫生治理实践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推动了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人权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在关注具体的公共卫生问题时，联合国也坚持人权的价值引领作用。例如2016年7月1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在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背景下获取药品》决议，重申“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权是一项人权”，并呼吁各国在卫生治理行动过程中将药品的可及性嵌入人权保护机制之中。^②在联合国发起的另一项重要卫生议程“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中，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人权理念也得以充分彰显。2019年9月，联合国召开了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政治会议。会议通过的《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强调：“健康对促进和保护人权与人的尊严以及增强所有人的权能具有重大促进作用。”^③

二、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理念：治理目标的实现路径

促进全球发展是联合国工作的重心之一。联合国致力于“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④联合国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而卫生治理与发展问题相互交织，不良的健康状况与贫穷和

① WHO, “Primary Health Car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Health Care, Alma-Ata, USSR,” September 6-12, 1978, https://www.unicef.org/about/history/files/Alma_At_a_conference_1978_report.pdf.

②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ccess to Medicin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the Enjoyment of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July 1, 2016,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6/195/99/PDF/G1619599.pdf?OpenElement>.

③ UN General Assembly, “Political Declaration of the High-level Meeting on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October 10, 2019,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74/2&Lang=E.

④ 《联合国宪章》，<https://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chapter-i/index.html>。

欠发达总是相伴而生。^①许多疾病根植于贫困,因此也只能通过解决贫困和资源不足等发展问题来预防。^②联合国将卫生问题融入发展理念之中,将发展作为其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目标的实现路径。

(一) 联合国发展决议中的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导向

在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构建自身发展议程的过程中,联合国始终在这一议程下关注卫生问题。早在196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这是联合国关于发展问题的首份宣言。该宣言明确提出,“实现最高卫生标准,对全体居民提供健康保护,如果可能则免费提供。”^③这也是联合国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确定了卫生问题在发展议程中的地位。此后,联合国在制定发展策略时都将卫生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目标。例如1970年通过的《国际发展策略》强调同时注重传染病防治和基础卫生建设。^④1980年通过的《国际发展策略》的卫生目标则将重点集中于初级卫生保健,认为国家应努力使“最贫穷的阶层也能享受保健资源”。^⑤上述理念与阿拉木图会议以来形成的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卫生服务要点的主流话语一脉相承。而1990年的《国际发展策略》则在“有条件地执行初级卫生保健”的形势下,将重点聚焦到贫民和妇幼保健工作之上。^⑥

除上述决议外,联合国还多次举行专门的发展会议,讨论全球发展问题,并将卫生问题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其中第六章专门讨论“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问题。^⑦该

① Maria Julia and Mary E. Kondrat, “Health Care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Context: Indigenous, Participatory and Empowering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48, No.5, 2005, pp.537-552.

② Ann Bonair, et al., “Medical Technolog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sue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ransfer, Diffusion and Us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28, No.8, 1989, pp.769-781.

③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December 11, 1969,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ProgressAndDevelopment.aspx>.

④ 《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策略》, 1970年10月24日,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2626\(XXV\).shtml](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2626(XXV).shtml).

⑤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Decade,” December 5, 1980,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35/56&Lang=E.

⑥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Fourth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Decade,” December 21, 1990,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45/199&Lang=E.

⑦ 《21世纪议程》, 1992年6月14日,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21stcentury.shtml>.

议程为健康促进和治理建立起一个细密的发展指导框架。此后,联合国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基多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等都在发展议程中对卫生问题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涉及到传染病专项防治、基础卫生保健等多项卫生治理领域。上述发展议程中对卫生问题的承诺和重视是联合国以社会发展为路径依托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发展理念的有力体现。

(二) 联合国发展目标中公共卫生治理议题的凸显

进入21世纪,联合国为推动全球发展设定了重大目标,卫生议题在全球发展议程中的地位愈发凸显。2000年9月,联合国大会千年峰会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成为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发展理念的最有力体现。《宣言》设定了八类全球发展目标,统称为“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其中三类直接聚焦公共卫生问题,包括降低儿童死亡率、孕产妇健康、遏制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另外五类目标中也与卫生问题密切相关,其中包括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等。^①公共卫生问题在“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分量表明,国际社会在构建发展议程时越来越重视卫生问题的重要性,将卫生发展置于一个突出地位。而且,“千年发展目标”创造了一个规范的全球卫生议程,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框架和融资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塑造性作用。^②

在“千年发展目标”到期之后,联合国又确立起“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指导未来发展。在所有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目标三便专注于全球卫生问题,即“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在这一总体目标之下,共设定了十三项具体的卫生目标,除在“千年发展目标”中已提及的问题外,增加了对非传染病、生殖健康、基本保健服务、烟草控制等问题的关注。^③该议程在将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理念推进到新的高峰的同时,也促进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给的增加方面,更重要的

①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February 19, 2018,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mdgs\)](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mdgs)).

② Kent Buse, Sarah Hawkes, “Health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ady for a Paradigm Shift?” *Globalization and Health*, Vol.11, No.13, 2015, pp.1-8.

③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年9月25日,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70/1。

是通过议程设定，增强了国内各部门之间和跨国行为体之间的卫生治理政策协同。^①

此外，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理念在机构设置方面也得以彰显。作为致力于全球发展的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在推动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机构的五个工作重点之一便是应对艾滋病。从 1990 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发布年度《人类发展报告》，设定了对各国人类发展指数的衡量和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健康因素是一个重要指标。由此可见，联合国已将公共卫生问题视为发展的重要一环。

三、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安全理念： 卫生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的提升

作为当前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联合国将国际安全危机的预防视为其核心要务。冷战后，随着安全的概念不断拓展，学界对安全的关注重点逐渐从传统的“国家安全”转向涵盖更广的“人类安全”，^②即对人的生命存在威胁的因素。“安全”一词的内涵和使用场域不断延伸。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由此而生。



扫码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免费获取完整版电子专辑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张季风

【内容提要】 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

【关键词】 中日关系；中日经贸合作；美国因素；抗击疫情；第三方市场合作

【作者简介】 张季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 邮编：100007）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20.03.002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20）03-0019-16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对中日经济关系而言，又出现了三个新时代，其一是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其二是日本进入了“令和”新时代，其三是中日关系迈向了新时代。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今后主要任务是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日本进入令和时代预示着日本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也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这必将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在多重新时代的背景下，中日关系不断改善，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不断增多，机遇也会不断增多。

但还应当看到，中日经济关系还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中日两国之间一些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解决，还存在诸多隐患和变数；中日经贸关系还存在许多不平衡。虽然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定已经签署，但并未改变中美长期博弈的大趋势。从全球视野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程度还难以估量，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也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的局面，保持清醒的头脑，变“危”为“机”，进一步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

一、中日经济关系的既往与现在

回首以往，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虽然两国关系风风雨雨，一波三折，但经过长期的合作，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经贸合作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格局，成为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日本通过对华贸易、直接投资、开发援助、科技合作等方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给予了宝贵支持，同时，日本也获得了巨大市场和丰厚利益，这是合作共赢的结果。以下分四个阶段，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经济关系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个阶段（1972—1978年），为双边贸易扩大时期。这一时期的中日经济关系虽然由过去的民间主导转为政府主导，但依旧是单一的贸易往来。与此前的20年的不同点在于，贸易规模大幅度增加，而且一直是稳步增长。1972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仅为10.38亿美元，1978年猛升至48.2亿美元。^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日贸

^① 张季风：《中日经贸关系70年回顾与思考》，《现代日本经济》2015年第6期，第2页。

易质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贸易空前扩大。在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双边经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阶段（1979—2000年），为全面经贸合作期。这一阶段除了中日双边贸易持续扩大之外，1979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华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与此同时，日本企业也开始对华直接投资，中日经济关系从此进入贸易、投资和政府资金合作的全面合作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日经济关系进入了黄金时代。

第三阶段（2001—2009年），为经贸合作深化期。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对外开放进入崭新阶段。中日经济关系也进一步深化，不仅双边贸易额、日本对华投资额迅速扩大，而且中日之间在财政、金融领域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展开合作，特别是在“走出去”大战略下，中国企业开始对日直接投资，尽管投资额还很少，但毕竟结束了两国之间单向投资局面。这一时期，中日关系也出现新的变化，即从过去的“政经双热”变为“政冷经热”。

第四阶段（2010至今），为经贸关系转型期。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失落感增强，战略焦虑凸显。从中日关系的大背景来看，以2010年9月“撞船事件”为转折点，中日关系转冷，在2012年日本政府悍然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后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伴随着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双边经济关系也出现剧烈波动。构成中日经济关系的四大支柱：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几乎全线受阻。中日贸易额在2011年达到3429.9亿美元高点之后，2012—2016年出现连续5年负增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2012年达到73.8亿美元后，2013—2016年出现连续4年负增长，投资额降至高峰期的一半以下。同期中日财政合作、金融合作也几乎停滞。中日韩FTA谈判、RCEP谈判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017年以来，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经贸关系也随之得以恢复。2017—2018年，中日贸易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双双出现了两年的正增长。2018年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和中日经济关系的丰收年，这一年中日双边贸易额恢复至3276.6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恢复到38.1亿美元。不仅如此，在当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期间，中日双方还举办了第一次“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署了总额为180亿美元的52项合作协议。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也标志着中日经贸合作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18年中日两国在金融合作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当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

协议》，协议规模为 2000 亿元人民币 /34000 亿日元。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央行还签署了在日本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① 2019 年 4 月中国银行东京分行正式开始日本人民币业务清算。更令人欣喜的是，RCEP 谈判在 2019 年年底取得决定性进展，达成框架协议，尽管印度最后退出。然而，由于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中日贸易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双双跌入负增长。尽管如此，中日贸易仍维持在 3000 亿美元以上，按国别排名，日本依然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国连续十二年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据商务部统计，长期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稳定增长，除香港及自由港以外，日本是我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区。

综观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经贸合作，虽然也出现过一些波折、矛盾与摩擦，但主流是好的。无论是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还是财政金融合作都取得了健康发展，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我国的经济现代化政策和改革开放是形成中日紧密经济关系和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日经贸合作的扩大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密切联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此巨大规模的中日经贸合作根本无从谈起。但是，除了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原因外，中日经贸合作的互补性与互惠互利性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② 正是这种互补性与互惠互利性相结合，实现了中日经贸合作的长期良性循环。

二、中日经贸合作面临的诸多挑战

（一）中日关系仍存在隐患

国际关系理论告诉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向来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联动的，有时政治关系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例如，2012 年至 2016 年期间由于“岛争”问题导致中日关系降至冰点，其结果是经济关系也受到严重冲击。2017 年以来，中日关系逐步改善，2018 年实现了两国总理的互访，这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正常轨道，但是中日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

所谓中日之间的结构问题主要是指台湾问题、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台湾问题是

^①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第 21 号，2018 年 10 月 26 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651280/index.html>。

^② 张季风：《中日经贸关系 70 年回顾与思考》，《现代日本经济》2015 年第 6 期，第 1 页。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础，1972年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二条写的十分明确，“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日益复杂，到了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日本支持台独的政治势力蠢蠢欲动，尤其是蔡英文上台执政后，日台关系出现实质性提升的趋向。关于历史问题，日本并未能像战后德国那样，对战争做彻底的反省并向战争受害者真诚道歉。不仅右翼势力时常跳出来表演，政府也遮遮掩掩，历届首相中也有人公然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可以说，围绕侵略战争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和解远未形成。领土问题主要是指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中国的大量史料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日在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就将“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以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达成谅解和共识，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复交过程中放弃过维护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的努力。然而，2012年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也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最紧张的局面。^①

除了上述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之外，国民感情恶化问题也亟待缓和与解决。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表明，2019年受访者对方国家的印象和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评价都呈现逐渐改善的态势，特别是中国人对日本印象“不好”和“相对不好”的比例逐年下降，从2016年的76.7%下降到2019年的52.7%，但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和“相对不好”的比例仅从2016年的91.6%下降为84.7%，改善不明显。^②国民感情若不得到尽早改善，对经贸合作的负面影响不言自明。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其中86%左右来自于媒体，而日本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未必都是客观的，其中歪曲和妖魔化中国的报道也不在少数。百闻不如一见，“去过中国”和“没去过中国”的受访者对中国的印象是有所不同的。目前，两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中日青少年交流活动以及地方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不断扩大的人员交往有助于国民感情的改善。

① 高洪、吴限：《中日关系的既往、现实与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日本学刊》2017年第5期，第1—13页。

② 金赢：《中日关系舆论调查解读——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当如何看对方》，《人民中国》，2019年10月24日。

当然，中日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领土问题的解决将会需要更长的时间。特别是在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美主日从”的局面难以改变，这也就决定了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举足轻重。在中美长期战略博弈的背景下，日本随时都有可能根据美国的战略意图调整甚至改变其对华政策。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至关重要加强中日首脑交流，建立双方政治互信，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求同存异。同时，也需要花时间改善国民感情。

（二）中日经贸合作还存在不平衡

中日经济关系总体健康发展，但也存在若干不平衡，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相互投资不平衡。自1979年日本开始对华直接投资以来，总体稳定，发展态势良好，截至2019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1157.0亿美元，占我国吸引外资总额的6.1%，为中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但中国对日累计直接投资存量仅为37.4亿美元，仅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3.2%，^①占日本吸收海外资金的比重更是微乎其微，非常不平衡。国际投资理论与实践表明，两个较大经济体间的相互投资若能达到平衡状态则最为理想，长期的不平衡并不利于双边的国际收支平衡，对双边贸易以及其他经济合作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其二，相互往来的旅游人数不平衡。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4年以来，中国赴日旅游人数每年以100万人次的速度逐年增加，2019年中国赴日旅游高达959万人次，同比增长14.4%，在日消费高达1.7万亿日元，为拉动日本内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与此相比，日本来中国旅游人数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据日本观光厅的统计，2013年日本来华游客为287.5万人次，2014年降为271.8万人次，2015年再降为249.8万人次，2016年回升为258.7万人次，2017年增加到268万人次。^②但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每年350万人次左右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来华日本游客减少也有很多原因，如日本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日元贬值、担心中国环境问题、食品安全以及中日关系恶化，等等。其实双边人员往来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有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之功。

^① 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相关统计，参见张季风主编：《日本经济蓝皮书（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28页。

^② 国土交通省観光庁：『2018年全国調査結果（速報）』（国土交通省観光庁：《2018年全国调查结果速报》），2019年1月16日，<http://www.mlit.go.jp/kankocho/zh-cn/siryoku/index.html>。

实践证明，众多的中国游客赴日旅游加深了对日本的理解，也起到促进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提高的积极作用。与此相反，日本来华旅游人数减少也可能是导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难以回升的原因之一。

其三，中日之间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加剧。由于中日两国自然禀赋的差别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因此长期以来中日经济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所谓“雁阵模式”开始被打破，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中日两国在中低端家电领域出现了一些竞争，个别领域（如高铁等）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现象。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日之间的恶性竞争不断升级，中国在第三方市场进行项目投资，常常被日本搅局。可以推断，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中日企业之间的正常竞争还会加剧，恶性竞争也难以避免。^①今后如何克服这些以政治斗争为背景的非理性竞争，是中日两国政府、企业必须直面的挑战。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摩擦，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和影响，自然也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冲击。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9年中日贸易总额为3149.9亿美元，同比下降3.9%，对日出口总额1432.3亿美元，下降2.6%，自日进口总额1717.6亿美元，下降4.9%。^②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9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37.2亿美元，同比下降2.0%。^③中日贸易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对日出口下降；而且由于中日贸易中的中间产品占比较高，对美出口关税增加，也导致日本对华出口下降。由于受到中国经济下行预期的影响，企业投资欲望下降，导致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重陷负增长。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虽已签署，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是美国的常态，何时翻脸实难预料。

应当看到，中美贸易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生的日美贸易摩擦有相似之处。从表面来看，当时美国是要求日本减少对美

① 张季风：《全球变局下的中日经济关系新趋势》，《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4期，第3—16页。

② 中国海关总署：“2019年12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2020年1月14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5/2833764/index.html>。

③ 商务部外资司统计。

贸易顺差，而本质上是削弱日本的产业竞争力，以降低对美国的威胁。对此，日本采取的方针是避其锋芒，以柔克刚，迂回取胜。日本在谈判过程中，向美国做了很多让步，但这些让步也给日本带来了许多实际利益。日本一方面自愿限制出口，以减少日美贸易摩擦，另一方面扩大对美直接投资，既扩大了美国的就业也规避了贸易壁垒，其结果是日本的汽车等产品在北美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更重要的是日本利用美国的“外压”，实现了社会变革，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变的目标。日本企业也在日元升值逆境中进行改革，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竞争力得到空前提高。日本的经验很值得借鉴。

其实，中美贸易战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知道还存在哪些不足，最大的短板在哪里，今后更需要变“危”为“机”，如同当年日美贸易摩擦那样，在“外压”的作用下，奋发图强，倒逼国内改革，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逐步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从源头上削弱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战的能力。逐步减少中美贸易份额，可通过贸易转移的方式，扩大中日贸易以及双边投资，使中日经济关系更加紧密。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美贸易战中日本的表现具有两面性。在日美同盟的约束之下，日本有时也会追随美国非难中国，例如，参与对华为的围堵，鼓吹所谓“公平贸易”，责难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等等。不过，日本与美国还是有所不同，日本毕竟是WTO 自由贸易体系的获益者，中日两国在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另外，美国在贸易等方面对日本的打压也不手软，尽管美日货贸协定已经签署，但美国仍动辄以增加汽车进口关税以及增加军事基地费用等对日本进行恫吓与威胁，在对抗美国霸凌主义方面中日也有共同诉求。由此可见，在缓解中美紧张关系方面，日本的作用很重要，而在日本处理日美关系、缓解日美矛盾方面，中国的作用也同样重要。

碍于日美两国盟友关系，日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与美国公开对抗，但全面提升中日关系和中日经济合作水平，日本是可以做到的。实际上，现阶段中国想要从美国得到的核心技术，绝大部分都可能从日本获得。加速发展中日经贸合作，不仅对中日双方有利，而且也会在客观上对美国产生压力。同时，中美关系缓和，比如说，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的签订，不仅中美两国受益，日本也会受益，全世界都受益。但是，必须注意美国对华政策是善变的，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将是长期的，对中日经贸合作的冲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中日双方对此都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合作的影响

2020年新年伊始,世界遭遇了突如其来的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严峻的挑战,也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中日两国在产业链条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均有合作,经济依存度很高,疫情的发展对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合作必将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现在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到2020年4月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各地复工复产已陆续开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短期的,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走向。但出乎人们的预料,疫情中心已转向欧美地区,出现全球蔓延的严重局面,美股暴跌,截至2020年3月19日,10天内4次触及熔断,股市缩水30%,受其影响日经平均股指也缩水近30%。疫情还在恶化之中,欧美发达国家已纷纷停止正常生产活动,封城甚至封国,全球经济衰退难以避免。据多数经济学家预测,其严重程度可能超过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因此对日本经济以及中日经贸合作的影响难以估量,现阶段只能做初步判断与分析。

本次疫情对日本经济和中日经贸合作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对日本观光旅游业、航空运输、酒店、餐饮业、会展等行业的直接打击;其二是对在华日资企业收益的影响。间接影响主要是疫情导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下行,进而导致中日双边贸易和投资下降。

第一,日本观光旅游业遭受重创。如前所述,近年来,中国赴日旅游人数迅速增长,2019年已达959万人次,占全世界赴日旅游人数的1/4强以及来日消费总额的36%,成为支撑日本旅游业的主要力量。^①从以往的情况看,春节期间是中国人赴日旅游的集中期。今年春节期间,已有许多中国游客团组取消赴日旅游行程,这对日本的航空公司、酒店、餐饮店、百货公司和旅游景点产生很大影响,一些以中国游客为主的中小旅行社所受冲击更大。按日本旅游专家估算,因为这场疫情,日本旅游业一天至少损失44亿日元。^②保守估计,日本2020年第一季度仅在旅游业方面,将损失4000亿日元以上。当然,如果全球性疫情能很快得到控制,下半年旅游业将得以恢复,

^① 2019年日本观光厅统计,转引自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資料』(《新型冠状病毒资料》),2020年1月30日。

^② 徐静波:《冠状病毒到底给日本经济造成多大冲击》,《静说日本》2020年2月6日。

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

第二，对东京奥运会的负面影响。这是日本最担心的事情。本次奥运会是日本继1964年东京奥运会以来时隔半个多世纪的盛事，举国上下期盼已久，日本政府更是将其视为改变“国运”和经济翻身的天赐良机。日本现已为筹备奥运会直接投入超过1.35万亿日元，期待能获得数倍的回报。鉴于本次奥运会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意义，因此在疫情初期，日本千方百计规避因疫情而取消或推迟举办时间，首相安倍晋三、官方长官菅义伟和奥运担当大臣桥本圣子多次重申东京奥运将如期举办，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曾力挺日本。尽管日本感染病例并不多，病死率也处于较低水平（截至3月24日，日本感染病例1140例，死亡42例），但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全球性蔓延的疫情还在恶化，导致许多准备工作、运动员训练和预赛都难以举行，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已明确表示抵制，最终日本与国际奥委会协商决定延期一年后举办（2020年3月24日宣布）。这确实是无奈的选择，但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延期举行会对日本经济带来很大损失，据日本学者计算，直接损失可达6400亿日元。^①但笔者认为，迫使奥运会延期的原因，即疫情的蔓延将会远远大于奥运会延期自身对日本经济的冲击。

第三，对在华日资企业的影响。日本在华企业有2万多家，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的统计，武汉有199家，湖北全省有229家。在武汉的日资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最多，有92家，占46.2%；批发业企业38家，占19.1%；服务业28家，占4.1%。^②相较而言，在武汉和湖北的日资企业所受冲击大于其他地区，而餐饮业、零售业的日资企业的损失将会大于其他行业。在湖北的制造业中，以本田系列、日产系列为中心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规模较大，这些企业即便停产也必须支付员工的工资，因此损失惨重。但从整体来看，尽管目前已对在华日资企业产生了若干冲击，但由于中国疫情已基本结束，冲击是局部的和短期的。另外，在华日资企业90%以上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和大连地区，武汉和湖北地区数量较少，占比并不高，湖北全省不足2%。再者，在华日资企业60%以上为制造业企业，餐饮业、零售业等行业的企业

① 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宫本胜浩推算。《东京奥运会若停办日本赔多少？经济学家算出来了》，<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894853948633853&wfr=spider&for=pc>。

② 日本帝国数据银行数据，转引自 <https://www-cast.com/kaisha/2020/0130>。

相对较少。而在武汉与湖北的餐饮业、零售业企业占比更少。2020年3月底，湖北以外地区的企业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倘若疫情能得到较快控制，虽然对布局在中国各地的日资餐饮业、零售业企业和在武汉地区的全部日资企业的冲击在所难免，个别制造业产业也可能出现一些供应链断裂现象，但对其他地区的日资制造业企业影响有限。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出现了全球性疫情蔓延，由于各国停工停产会导致订单取消，产业链可能出现大面积断裂，对在华日资企业的影响必然增大。

第四，对中日双边进出口贸易、投资的影响。中日贸易和相互投资是中日经贸合作的两大支柱。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2019年中日双边贸易、投资双双跌入负增长，形势已经比较严峻，再加上此次疫情的冲击，可谓雪上加霜。估计2020年第一季度中日贸易和相互投资还会持续负增长，短期内中日合作项目的延迟和停滞在所难免。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伙伴，中日经贸合作受挫，对日本经济影响很大。另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下行也会对日本经济产生各种间接影响。据日本有关智库预测，本次疫情可能导致日本GDP下降0.45%—0.5%。^①2018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下行周期，2018年和2019年全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仅为0.7%，特别是2019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为-7.1%，^②再加上这次疫情的影响，股市下跌近30%，日元升值压力增大，形势严峻，第一季度实际GDP持续负增长已成定局。倘若疫情后出现类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级别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话，2020年日本经济陷入负增长在所难免。

四、抓机遇迎挑战，让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更上一层楼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多重意义上的新时代，为发展中日经济合作提供了的大好机遇，而中美贸易摩擦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下行又给中日经贸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应抓住机遇，直面挑战，把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合作推向新的台阶。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中日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合作，尽快结束这场灾难，为中日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还应重点抓好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推动中日务实合作。

① 日本野村证券等智库分析资料。

② 内閣府『2019年10～12月期四半期別GDP速報（改定値）』（内閣府：《2019年10—12月第四季度GDP速報（改定値）》，2020年3月9日公布。

（一）守望相助，共同携手战胜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举全国之力“抗疫”并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面胜利，其中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体现了日本人民对一衣带水的中国的祝福之情。同时，日本的疫情面临严峻形势，中国人民也十分关注并采取各种方式予以援助，中日守望相助，疫情无情人有情，共同抗击疫情拉近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也为两国经贸合作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日本在防控传染病方面经验丰富，防控体系严密，应对疫情淡定有序，在治疗技术、疫苗等药物研制等方面均有可借鉴之处。而中国在“抗疫”实践中，实行全民隔离防控，根据疫情的变化不断改变作战方式，又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也值得日本学习和借鉴。当前，中国人民已经取得“抗疫”战的全面胜利，而日本前期为确保奥运会的如期举办，不遗余力地严防死守，决定推迟举办后，也依然慎重应对以避免疫情在日本的扩大。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在防控方式上各具特色，疫苗、药物研制各有优势，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各有心得，中日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定会加速全球战胜疫情的步伐。



扫码关注“北外学术刊物”公众号
免费获取完整版电子专辑

欧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机制及其局限

张 磊

【内容提要】 根据欧盟内部的权能划分，公共卫生主要是成员国的权限，欧盟的作用是支持并补充成员国采取的行动，以达到促进健康和保护公民免受跨境健康威胁的目标。欧盟在卫生政策大框架下，利用有关跨境健康威胁的主要机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该机制强调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重要作用，鼓励成员国通过“预警和反应系统”与卫生安全委员会进行信息交流，并协调各国对健康威胁的应对措施。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欧盟对疫情的发展保持密切关注，采取多项举措在成员国之间进行信息共享和协调应对。随着疫情的快速蔓延，欧盟多机构、多部门联动，进一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和统筹应对，同时注重缓解疫情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此次疫情的发展反映了欧盟应对跨境健康威胁机制存在局限。由于欧盟权能有限，成员国仍是卫生政策的主体，欧盟层面的疫情应对受到限制。缺乏有效协调进一步削弱了欧盟的反应能力。欧洲民众的价值观、行为和生活方式等为欧盟有效应对跨境健康威胁带来困难。此外，英国脱欧也为欧盟的应对带来了潜在风险。

【关键词】 欧盟卫生政策；新冠肺炎疫情；跨境健康威胁；疫情应对机制

【作者简介】 张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20.04.008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20）04-0116-17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欧盟及成员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民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卫生系统面临极限压力，社会经济遭受巨大损失，政府威信也受到质疑。病毒不分边境，严重的健康威胁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地理区域或国家。面对疫情，欧盟成员国采取了差异化的应对措施，亟需欧盟进行协调。根据条约，公共卫生主要是成员国的权限，但是欧盟可以支持并补充成员国的行动，以达到促进良好健康、保护公民免受健康威胁等诸多目标。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出欧盟卫生政策的重要性，再次表明欧洲各国面临的挑战需要在欧盟内外进行密切合作与协调。欧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法律依据和主要机制有哪些？面对逐渐发展的严峻疫情，欧盟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在具体实践中，这些举措反映出欧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机制存在哪些局限？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一、欧盟卫生政策和应对跨境健康威胁的法律依据

欧盟的卫生政策源自卫生和保障条款，随着人员和货物在欧盟内部市场的自由流动而逐步发展起来。诸多因素包括 20 世纪末的牛海绵状脑病（BSE）危机，促使欧盟将健康和消费者保护置于政治议程的重要位置。^① 欧盟条约和法律法规对卫生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界定。欧盟第 1082/2013/EU 号决定（《严重跨境健康威胁决定》）规定了流行病监测、预警和应对跨境健康威胁的规则，是欧盟对紧急卫生事件采取行动的框架。

（一）欧盟卫生政策的法律依据和战略目标

欧盟卫生政策的法律依据是《欧洲联盟运行条约》（TFEU）第 168 条，其中规定在确定和实施欧盟所有政策和行动时，应确保高水平的人类健康保护。这一目标将通过欧盟对成员国的支持和促进合作来实现。^② 健康保护特别是卫生医疗系统的主要责任仍然由成员国承担，欧盟在改善公共卫生、预防和管理疾病、消除威胁人类健康的源头以及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卫生战略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换句话说，欧盟的行动是对成员国政策的补充，鼓励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欧盟尊重成员国政府在制定卫

^① European Parliament Fact Sheets on the European Union, “Public Health”,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factsheets/en/sheet/49/public-health>.

^②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 Part Three: Union Policies and Internal Actions - Title XIV: Public Health - Article 168 (ex Article 152 TEC).

生政策、组织并提供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等方面的职责，其中包括对卫生机构与医疗服务进行管理和分配资源。欧盟通过“健康促进增长”（Health for Growth）战略及其行动纲领（2014—2020年）和一系列二级立法，成功实施了内容非常丰富的政策。^①在欧盟范围内有大量保护公民健康的法律和标准，既包括针对卫生产品和服务的相关规定，也包括针对患者的法律法规，旨在鼓励成员国的卫生系统之间进行合作。^②目前为支持政策实施而设立的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下属的“卫生和食品安全总局”（DG SANTE）及相关专门机构。卫生和食品安全总局负责协调所有与健康有关的领域。专门机构中特别重要的是“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CDC）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③

欧盟卫生政策有四大战略目标：第一，促进健康。通过解决营养不足、体育活动缺乏、酗酒、吸烟和吸毒、环境风险和伤害等问题，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的具体健康需求也需要更多的关注。第二，保护公民免受严重跨境健康威胁。加强对流行病和生物恐怖主义的监测和防范，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等新的健康挑战的能力。第三，支持有活力的卫生系统。帮助成员国的卫生系统应对人口老龄化、公民期望上升以及患者和卫生专业人员自由流动所带来的挑战。第四、促进欧盟公民获得更好、更安全的医疗保健。支持建立“欧洲疾病对照网络”（European Reference Networks, ERNs），开展跨境合作，以解决罕见疾病并采取行动，例如在患者安全和预防抗菌素耐药性方面进行合作。^④

（二）欧盟应对跨境健康威胁的法律机制

对跨境健康威胁进行监测、预警和应对是确保欧盟高水平健康保护的基本要素。欧盟在这一领域的行动主要是支持和补充成员国采取的行动。一旦出现严重的跨境健

① European Parliament Fact Sheets on the European Union, “Public Health,”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factsheets/en/sheet/49/public-health>.

② Nicole Scholz, et al.,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 *European Parliament Briefing*, June 2019,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30272/EPRS_BRI\(2018\)630272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30272/EPRS_BRI(2018)630272_EN.pdf).

③ European Parliament Fact Sheets on the European Union, “Public Health,”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factsheets/en/sheet/49/public-health>.

④ Nicole Scholz, et al.,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 *European Parliament Briefing*, June 2019,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30272/EPRS_BRI\(2018\)630272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30272/EPRS_BRI(2018)630272_EN.pdf).

康威胁，欧盟范围内的应对措施就非常重要。在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欧盟卫生安全框架方面，2013年通过的《关于严重跨境健康威胁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①是重要的里程碑。该决定旨在改进备灾工作并加强协调应对卫生紧急情况的能力。

这项立法是欧盟对紧急卫生事件采取行动的框架，在改善欧盟卫生安全 and 保护公民免受各种健康威胁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决定》所涵盖的类别包括传染病、生物或化学制剂以及环境因素带来的威胁和抗菌素耐药性等，《决定》还特别强调要应对来源不明的威胁和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如埃博拉和寨卡病毒的暴发。《决定》就信息交流、风险评估和联合采购等内容进行了规定。欧盟支持成员国通过以下方式为公民做好准备，保护他们免受可能出现的流行病和严重的跨境健康威胁：第一，通过加强成员国备灾规划（preparedness planning）方面的协调、最佳实践和信息共享，加强欧盟一级的备灾规划能力（preparedness planning capacity）；第二，改进跨境健康威胁的风险评估和管理；第三，为制定和实施联合采购确定必要的安排；第四，通过向卫生安全委员会（Health Security Committee, HSC）提供坚实的法律授权，协调备灾工作，加强欧盟范围内应对措施的协调；第五，加强风险和危机沟通的协调，促进国际合作。^②

欧盟层面的应对措施由“卫生安全委员会”进行协调。该机构由各国卫生部的代表组成，负责协调成员国的备灾规划、应对措施以及危机沟通。欧盟委员会负责组建卫生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处和任命主席一职，并运营其卫生应急操作设施。卫生安全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全体会议，其他会议根据情况临时召开。《决定》还建立了“预警和反应系统”（Early Warning and Response System, EWRS），以便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政府之间进行直接和长期的联系。与此同时，《决定》强调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③在识别、监测和评估传染病对健康的威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① Decision No 1082/2013/EU of 22 October 2013 on serious cross-border threats to health,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3D1082&from=EN>.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Crisis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https://ec.europa.eu/health/preparedness_response/overview_en.

^③ 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疫情和2004年的禽流感促使欧盟采取紧急行动，防止疫情的再次出现。在此背景下，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05年成立，旨在加强欧洲对传染病的防御。Euractiv, “Parliament Backs Urgent Plan for New Agency to Control Infectious Diseases,” February 11, 2004,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health-consumers/news/parliament-backs-urgent-plan-for-new-agency-to-control-infectious-diseases/>.

就具体程序而言,欧盟应对跨境健康威胁机制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见图1):第一,就备灾规划进行信息交流。《决定》鼓励欧盟成员国之间就备灾活动交流信息和分享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制定国家备灾规划,以应对不同类型的跨境健康威胁。规划内容包括医院准备增加入院人数,安排储备医疗产品,以及在疫情暴发时出台措施,例如关闭学校或禁止大规模集会。第二,预警和反应系统。欧盟成员国通过“预警和反应系统”就可能对欧盟产生影响的严重跨境健康威胁发出警报,共享信息以及协调反应。

“预警和反应系统”由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第三,公共卫生风险评估与应对协调。在发出警报后,各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在卫生安全委员会内相互协商,以协调各国对卫生威胁的应对措施以及风险和危机沟通,并通知公众和专业医疗人员。风险评估根据威胁的性质由不同的部门完成,比如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欧洲食品安全局、欧盟委员会或其他欧盟机构。此外风险评估还需考虑其他实体,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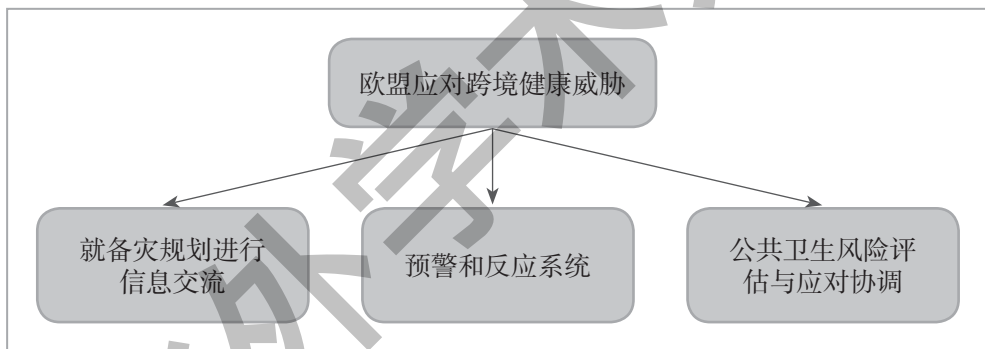


图1 欧盟应对跨境健康威胁具体程序

来源:作者根据欧盟《关于严重跨境健康威胁的决定》自制。

《决定》还指出,保护人类的健康是一个贯穿各领域的问题,与欧盟的多项政策和活动有关。为了实现高水平的人类健康保护,避免任何重叠、重复或相互冲突的行动,欧盟委员会应与成员国保持联络,确保根据《决定》设立的机制与欧盟层面的其他机制之间进行协调和信息交流,活动涉及对严重跨境健康威胁的备灾和反应规划、监测、

^① Nicole Scholz, “Cross-border Threats to Health: EU Action on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European Parliament Briefing, January 202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46123/EPRS_BRI\(2020\)646123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46123/EPRS_BRI(2020)646123_EN.pdf).

预警和打击。欧盟委员会应确保从各种快速警报和信息系统收集信息，并通过“预警和反应系统”传达至成员国。

成员国有责任在国家层面管理公共卫生危机。然而，如果个别成员国采取的措施不一致或基于不同的风险评估，就可能损害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因此，在欧盟层面协调应对措施应力求确保成员国采取的措施是相称的，并限于与跨境健康威胁有关的公共健康风险，而不与欧盟规定的义务与权利相冲突。《决定》还强调对隐私的保护，处理个人数据应符合欧盟的相关规定。在全球层面，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的缔约国。该条例加强了各缔约国之间的协调，以便就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准备和应对，执行工作由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协调。《决定》还强调，应促进与第三国和国际组织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尤其是确保与世界卫生组织就相关措施交流信息。^①

如果出现超出国家应对能力的严重跨境健康威胁，欧盟成员国^②还可根据第1313/2013/EU号决定，通过“欧盟民事保护机制”（EU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 UCPM）向其他成员国请求援助。^③自2001年成立以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已对欧盟内外330多项援助请求作出回应。^④此外，欧盟“综合政治危机应对机制”（Integrated Political Crises Response Mechanism, IPCR）为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欧盟成员国常驻代表委员会（COREPER）和理事会提供支持，在欧盟政治层面及时协调和应对具有广泛影响或政治意义的危机。该机制于2015年10月针对难民和移民危机首次启动，还被用于就网络攻击、自然灾害或混合威胁造成的重大危机作出联合反应。^⑤

① Decision No. 1082/2013/EU of 22 October 2013 on serious cross-border threats to health,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3D1082&from=EN>.

② 除了欧盟成员国，还包括6个参与国（冰岛、挪威、塞尔维亚、北马其顿、黑山和土耳其）以及处于过渡期的英国。European Commission, “EU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 https://ec.europa.eu/echo/what/civil-protection/mechanism_en.

③ Decision No. 1313/2013/EU of 17 December 2013 on a Union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02013D1313-20190321&from=EN>.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EU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 https://ec.europa.eu/echo/what/civil-protection/mechanism_en.

⑤ Council Implementing Decision (EU) 2018/1993 of 11 December 2018 on the EU Integrated Political Crisis Response Arrangement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8D1993&from=EN>.

二、欧盟层面的疫情应对措施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而欧洲仅有少数病例开始，欧盟就对疫情的发展保持密切关注，以《严重跨境健康威胁决定》为主要机制，采取多项措施在成员国之间进行信息共享和协调应对。随着欧洲疫情的日益严重，欧盟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协调和促进共同行动的力度，还提出了一系列缓解疫情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影响的举措。

（一）欧盟层面第一阶段的应对措施

欧盟层面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疫情暴发，部分欧盟成员国境内仅有少数病例阶段。疫情暴发初始，欧盟委员会就动员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密切监测和风险评估。欧盟利用有关跨境健康威胁的法律框架和机制，与成员国协调备灾和应对措施。正如欧盟卫生与食品安全委员斯特拉·基里亚基德斯（Stella Kyriakides）所指出，虽然公共卫生措施首先是成员国的权限，但是，欧盟委员会在支持这些措施、协调整个欧盟的应对措施以及帮助确保迅速满足潜在需求和弥合差距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①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密切监测并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第一，通过其官方网站，每天及时更新发布疫情发展的最新情况。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求各国在确诊后 24 小时内报告新病例。在此基础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天在其网站公布欧盟 / 欧洲经济区和英国的最新情况。^② 第二，发布风险评估。其在 2020 年 2 月 14 日的第四版风险评估中指出，欧盟 / 欧洲经济区和英国人口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仍处于较低水平。在流感高峰期评估了欧盟 / 欧洲经济区和英国医疗系统能力（healthcare systems capacity）面临的风险，认为是“低至中度”。^③ 第三，就一些问题提供技术指导以延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Remarks by Commissioners Kyriakides and Lenarčič on the EU's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s relating to the Coronavirus,” January 29,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0_152.

②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VID-19 Situation Update for the EU/EEA and the UK,” <https://www.ecdc.europa.eu/en/cases-2019-ncov-eueea>.

③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isk Assessment: Outbreak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Increased Transmission beyond China – Fourth Update,” February 14, 2020, <https://www.ecdc.europa.eu/en/publications-data/outbreak-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coronavirus-2-sars-cov-2-increased>.

迟和减轻病毒的影响，包括处理病人、清洁、使用个人防护设备和非药物措施等。

欧盟委员会启动危机协调机制，通过“预警和反应系统”、卫生安全委员会等机制协调各成员国的措施，进行信息共享。卫生安全委员会就新冠疫情举行了多次会议，^①在定期更新的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就当前的有关情况以及成员国的备灾需求和差距进行信息交流，附有关于临床诊断和管理的技术指导文件、旅行建议、一般健康建议以及治疗和医疗对策建议等，还通过“预警和反应系统”实时交换信息。

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克罗地亚针对疫情启动了综合政治危机应对机制的“信息共享模式”。这一机制在理事会主席的指导下，汇集了成员国和欧盟各机构特别是卫生、领事事务和民事保护领域的所有相关专家。该机制通过具体工具，在政治层面上进行共享信息、促进协作和协调危机应对，目的是促进成员国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确保成员国对局势有共同的理解。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对外行动署定期编写形势和分析报告，并通过专门的网络平台与成员国分享。^② 欧盟理事会于2月13日召开了卫生部长特别会议（extraordinary Council meeting），会议决定：敦促成员国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卫生，特别关注国际旅行，呼吁密切加强合作与信息共享。理事会还呼吁欧盟委员会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启动现有的供资机制（funding mechanisms），准备和应对健康威胁；促进成员国之间采取措施，有效减少进一步感染的风险；并与欧洲药品管理局和成员国药品管理机构合作，评估全球健康威胁对欧盟药品供应和供应链安全的影响。^③

欧盟民事保护机制于2020年1月底启动，1月31日至2月1日从武汉撤回了447名欧盟公民。^④在交通运输方面，欧盟航空安全局（European Union Aviation Safety Agency）就如何处理航空公司和机场的潜在传染向各国航空当局、航空公司和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 Health Security Committee Meetings,” https://ec.europa.eu/health/coronavirus/hsc_en.

② Croatian 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roatian Presidency Activates EU’s Integrated Crisis Response in Relation to Corona Virus,” January 28, 2020, <https://eu2020.hr/Home/OneNews?id=160>.

③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Health and Consumer Affairs Council Session on 13 February 2020: Conclusions on COVID-19,” February 13, 2020,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42546/st06013-re01-en20.pdf>.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Coronavirus: EU Calls for Strengthene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https://ec.europa.eu/echo/news/coronavirus-eu-calls-strengthened-international-coordination-and-cooperation_en.

机场提出了建议，还向成员国发出了关于入境欧盟相关问题的指导意见。^① 应急协调中心（Emergency Response Coordination Centre）负责与各成员国联络，为向中国运送个人防护装备提供便利。

在研究方面，1 月 30 日，欧盟委员会表示从其研究和创新项目“地平线 2020 计划”（Horizon 2020）中拿出 1000 万欧元，推动急需的新冠病毒研究。同时其他由欧盟资助的研究也在进行中。^② 超级计算机中心随时准备对新冠病毒的进化进行排序和模拟，帮助研究人员开发疫苗。如果局势恶化，欧盟委员会还将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动员紧急资金支持疫情应对。^③ 在援助方面，欧盟委员会 2 月 23 日共同出资，资助中国逾 25 吨个人防护装备。^④ 2 月 24 日，为加强全球准备、预防和遏制新冠疫情，欧盟委员会宣布了一项价值 2.32 亿欧元的新援助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随着病例的不断增加，公共卫生是第一要务。无论是在欧洲、中国还是其他地方，国际社会都必须共同努力。^⑤

（二）欧盟层面第二阶段的应对措施



扫码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免费获取完整版电子专辑

全球危机管理视阈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理念、制度和措施*

于宏源 包玉涵 王伟逸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 200 多个国家或地区出现，截至 2020 年 5 月底，全球确诊人数已破 500 万，已经成为全球性重大危机。本文基于全球危机管理视阈，深入分析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理念变更、制度创新和措施变革，从国际合作、软实力、全球危机管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角度探讨新形势下全球性重大、紧急危险应对的理念和方案变革，以及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外交角色在当前形势下的更大作为。

关键词：新冠肺炎；全球危机管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上海，200233）；包玉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学专业 2018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上海，200233）；王伟逸，北京林业大学金融系 2017 级本科生，专业为金融研究（北京，100083）。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36(2020)04-0005-12

近些年全球化的加深以及公共危机的外溢效应，使得危机超出其发生的范围，局部危机演变为全球性危机，造成一定程度的国际影响，危机管理的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来实现将意外损失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新冠肺炎疫情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第一次大流行，也是前所未有的大流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统计，新冠疫情已经在 200 多个国家或地区出现或流行，截至 2020 年 5 月底，全球确诊人数已破 500 万，死亡人数超过 31 万^②，已成为全球性重大危机，并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形成挑战，这类问题对区域和全球经济发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能源—粮食—水的三位一体安全机制研究”（16AGJ006）的阶段性成果。

②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ituation-reports>，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3 日。

展以及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新冠肺炎卫生疫情危机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在疫情面前,全人类都是“利益攸关方”。本文基于全球危机管理视阈,深入分析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理念变更、制度创新和措施变革,从国际合作、软实力、全球危机管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角度探讨新形势下全球性重大、紧急危机应对的理念和方案变革,以及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外交角色在当前形势下的更大作为。

一、防疫危机推进全球理念创新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连带效应,给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带来多重危机,展现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各国危机管理和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安全问题将在全球治理各主体的议程上占据重要地位。^①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未来全球治理改革的新维度需要从全球化的客观发展趋势、全球“相互依存”的系统性风险、跨国问题的普遍性和日益复杂化等方面展开,^②从国际政治学角度出发,防疫危机管理对于全球相互依存、国家间的权利和地缘政治,以及国际合作与集体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防疫危机管理导致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并对大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危机之际,一项国际研究显示,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做好了应对流行病或大流行的准备。全球卫生安全“从根本上说是薄弱的”。^③防疫问题给国家安全观念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在内涵上,它将关注重点从国家层次上的安全转向人和社会的安全;其次,在外延上,它已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这些高级政治问题扩展到卫生防疫、环境保护等低层政治问题。^④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卫生疫情的解决付出代价或得到收益。卫生疫情这类危机具有跨国性扩散蔓延的特征,这类危机如果控制不及时,往往会导致

① 杨雪冬:《光明时评:新冠危机与全球化的新动向》,载《光明日报》,2020年5月6日第4版。

② 张胜军:《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55—75页。

③ Elliott Davis,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s ‘Fundamentally Weak,’” US.NEWS, February 2020,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articles/2020-02-10/global-health-data-shows-weak-epidemic-response-preparedness>, 访问日期:2020年2月15日。

④ 张明明、周敏骏:《国际政治研究的新课题:非传统安全》,载《理论前沿》,2004年第24期,第23页。

一系列冲突连续暴发。传染病暴发不仅仅对当事国和地区构成威胁，而且是关系到周边国家或地区乃至整个人类安全与利益的全球性问题，而它的严重程度不亚于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① 因此，防疫危机管理需要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国家间的协同。从国家主权和卫生防疫来看，卫生疫情因其跨国性而牵涉到各国主权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中国、美国和欧盟等是全球供应链中重要的一环，此次新冠肺炎对世界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国际社会各方都在关注与国际供应链密切相关的中国有关产业。^② 那些依赖中国工厂生产产品、依赖中国消费者增加销量的跨国公司已经发出了亏损预警。

第二，卫生疫情等危机是复合型危机，这类危机的防范、冲击和恢复等牵涉到南北关系、地缘政治、国际制度建设等诸多因素。卫生疫情还同人类科学发展密切相关，^③ 也需要通过全球科技合作来逐渐解决。防疫危机管理具有全球公共物品、专业性国际合作、全球一体化的推动力量等三项特征。首先，这类危机具有公共物品的三个特点：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意味着需向全世界提供具有共同利益或联合消费特征的防疫危机管理。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主要表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享防疫危机管理带来的好处。所谓非排他性，是指其影响已经超越了某个国家或地区。防疫危机管理需要专业性国际合作的协助。随着全球联系日益紧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传染病等威胁。目前，在许多卫生疫情灾难中，专业科学知识往往扮演了权威的角色。抗击新冠肺炎并防止疫情出现全球性大流行，国际社会应在信息交流、疫苗研发、药物开发等领域全面加强合作。^④ 防疫危机管理是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卫生疫情是地球生物群落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危机，相应的防疫危机管理必须通过全球性的合作和集体行动努力来实现。新冠疫情会影响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在 2020 年 1 月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了

① 丁刚：《多边合作求安全》，载《人民日报》，2005 年 3 月 23 日第 3 版。

② 《新冠肺炎：国际关注中国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2020 年 2 月 19 日，BBC NEWS 中文，<http://zgzhfbp.cn/news/show-2117.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③ 意味着科学家和科技手段对于卫生疫情和环境灾难等危机的管理至关重要。参见：Karen T. Litfin, *Ozone Discourses: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9.

④ 长远等：《抗击新冠肺炎亟需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2020 年 2 月 15 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15/c_1125578662.htm，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8 日。

0.1%，调至 3.3%。^① 亚太地区旅游、经济往来中断，即便在新冠病毒刚成为“问题”，有关旅行的限制仅实施一周左右，澳大利亚等多个旅游目的地游客人数就已开始减少。^② 为了实现防疫危机管理领域的全球帕累托改进，应避免国与国之间的行动不协调或政策不适用问题，应当提供流行病的监测数据和额外调查成果，为大流行期间的全球风险评估作出贡献。与此同时，商定经由相关机构审核的各国通用研究协议，以便对疫情的严重性和防疫措施的有效性开展合作研究。

第三，新冠肺炎这样的防疫危机管理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袖手旁观，解决此类问题需要所有国家通力合作。单靠某个当事国、地区或者国际组织已经无济于事，只能在大国互动安排和国际制度建设中共同解决。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出现的危机，难以避免的会产生国际影响。防疫危机管理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必须通过国际立法、合作、协调才能逐步解决这一时代的新挑战，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020 年 3 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表示，二十国集团将致力于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一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战胜疫情。^③ 卫生疫情也是中美面临的共同挑战，它推动双方开始对国家的危机管理行为包括对外行为加以调整。疫情发生以来，中方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并于第一时间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接待了中国港、澳、台地区和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考察组，开展了积极有效的交流与合作。^④ 疫情的爆发也突出表明中、美两国的合作面上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 (Craig Allen) 表示，携手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疫情发生之后减少或取消关税不失为“适当的举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美方针对中方第三批 2000 亿美元加征关税排除清单，涉及中国输美

① 商务部：《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影响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2020 年 2 月 17 日，驻孟加拉国经商参处，<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lj/202002/20200202936671.s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8 日。

② 休·莫里斯：《新型冠状病毒如何影响全球旅游》，环球网财经，2020 年 1 月 31 日，<https://finance.huanqiu.com/article/3wq054oeBSn>，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8 日。

③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全文）》，2020 年 3 月 27 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3/27/c_1125773916.htm，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28 日。

④ 《国家卫健委：中美双方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保持密切沟通协作》，2020 年 1 月 30 日，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c/7tdlGDVWVWKO>，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8 日。

119 项产品，于 2020 年 2 月 5 日正式通过。^① 国际组织和其他政治团体的权力行使也在影响着中美防疫危机管理的理念。预防和管理各种危机是联合国的长期事业。危机管理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无国界医生以及各国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也结成了“防疫共同体”。因此，2020 年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疫情更加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②

二、新冠疫情防疫危机中的国际制度创新

从国家利益和防疫危机管理来看，卫生疫情的破坏性对各国的国家利益都不同程度地构成了挑战。例如，新冠肺炎使与中国联系十分紧密的东南亚地区成为全球面临风险最大的区域之一；澳大利亚经济也与中国联系密切，此次中国疫情确实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了很大压力。大量接收中国留学生的澳大利亚的大学已经受到冲击。^③ 防疫危机管理涉及不同类型的国家利益。防疫危机管理作为主权国家主导的多边行为，反映了现实的大国实力和威望，成为各国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和促进其国家利益的工具。^④

从新型国际关系建设角度来看，防疫危机管理还可以用“猎鹿原则”来解释。“猎鹿原则”指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有效的危机管理政策，但只要有一个国家拖延和破坏，也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因此，新冠肺炎疫情要求改变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内容中所包含的政治和理论偏好，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国际对话机制和有效应对跨国挑战的跨国合作机制。^⑤ 在防疫危机管理中，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球化”，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存在。我们认识到，只有切实合作，共同应对跨国威胁才能实现安全。防疫危机管理必须通过国际协调来加强。这首先表现为危机防范的“无国界行为”以

① 赵焕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携手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2020 年 2 月 12 日，中国日报网，<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002/12/WS5e42fd25a3107bb6b579ed33.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8 日。

② 张锐：《构建全球抗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光明日报》，2020 年 5 月 12 日第 4 版。

③ 《新冠肺炎：国际关注中国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2020 年 2 月 13 日，BBC NEWS 中文，<http://zgzhfbp.cn/news/show-2117.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8 日。

④ 薛澜等：《美国危机管理体系的结构》，载《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03 年第 5 期，第 69—72 页。

⑤ 张胜军：《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4 期，第 55—75 页。

及由此形成的各国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各国在制订危机管理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对地区、全球以及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影响。其次,这类危机管理方式也具有全球的协调一致性和合作性。危机的防范、解决不是仅仅依靠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只有在国际组织和大国的协调下、通过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应对新冠疫情。中、美两国在全球防疫危机管理和国际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而有区别的角色。在全球防疫危机管理的有关国际事务和活动中,中国的有效和广泛参与是非常必要的。在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各种卫生疫情的行动中,中国起到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也通过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框架进行全球防疫危机管理合作。大国合作对于控制传染病疫情极其重要。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① 特朗普在此次疫情危机中曾表示,“美国全力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② 在新冠肺炎流行的严峻时刻,中国与东盟国家及时协商、加强合作、相互支持。^③ 习近平主席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中国抗击疫情采取的举措,愿与中方加强沟通与合作,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④

从软实力角度来看,在国际政治中,如果军事、经济等硬国力是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必要工具的话,那么软实力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⑤ 根据《全球健康安全指数》,虽然大多数东亚国家在流行病应对和缓解方面处于中间位置,但泰国和韩国的表现最为出色。尤其是泰国,在快速响应能力方面排名第五,除贸易和旅行限制以及执行响应计划外,在所有措施中均获得最高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世界一流”的健康计划(尤其是在流行病学方面)以及泰国卫生当局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之间“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及与全

① 徐晶:《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020年1月2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 <http://news.cctv.com/2020/01/28/ARTIPrmX4KjZJqCquBu2MhBS200128.shtml>, 访问日期:2020年2月18日。

② 《中国战“疫”必胜!习近平与多国领导人留下这些“通话记录”》,2020年2月19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hi.people.com.cn/GB/n2/2020/0219/c231187-33809964.html>, 访问日期:2020年2月20日。

③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于2020年2月19日至21日赴老挝万象,与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菲律宾外长洛钦共同主持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东盟10国外长均与会。东盟与中国就政策层面和专业层面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应对疫情。这对控制疫情在亚洲的蔓延,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恢复人们的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④ 《湖北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核心事件一览》,2020年2月17日,新京报网, <http://news.ifeng.com/c/7u8Wvj66XuS>, 访问日期:2020年2月20日。

⑤ Joseph S Nye, “The velvet hegemony,” *Foreign Policy*, May/Jun 2003, p. 74.

球卫生界保持着“长期关系”。^①与衡量硬国力的方式不同，“软国力”并不是单纯地依靠 GDP 数据或者核武器数量来决定的，而且由于“软国力”强调无形的影响力，在常态下很难准确衡量，所以全球公共危机是检验国家软国力的最好时机。一个在防疫危机管理中处处“以邻为壑”的国家，很难在“软实力”上有竞争力。因此处理像新冠肺炎、疯牛症、禽流感之类危机的过程，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提升国家形象和显示国家“软实力”的机会。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国情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仍然尽自己所能，为防疫危机管理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已向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捐款支持其开展抗击疫情的国际行动^②，中国提供多语种的防控和诊疗方案，向多国推荐中国防疫网格化管理、方舱医院等做法，举行疫情防控经验国际分享交流大会；及时与全球科技界共享科学数据，技术成果和防控策略；分享中国的防治经验和技术，向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和技术支持。^③习近平主席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 20 亿美元的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中国将与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努力确保抗疫物资供应链，并将建立 30 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控能力。而美国在全球防疫危机管理中未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在这次新冠肺炎危机中，尽管全世界都在努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期间提议削减全球卫生项目经费。特朗普政府公布的 2021 财年预算草案概述了对世界卫生组织削减 6500 万美元支出的财政计划，与 2020 财年相比，减少 50% 以上。同时，特朗普建议将全球卫生项目的总费用减少 34%。^④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强调，“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深刻表明了全球的紧密联系及脆弱性和国际协作的重要性”。国际协作需

① Elliott Davis,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s ‘Fundamentally Weak,’” US.NEWS, February 2020,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articles/2020-02-10/global-health-data-shows-weak-epidemic-response-preparedness>, 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5 日。

② 《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2020 年 3 月 12 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18 日。

③ 《我国已援助八十九个国家和四个国际组织》，载《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27 日第 3 版。

④ 《特朗普政府公布新预算，削减公共开支引争议》，2020 年 2 月 11 日，第一财经，http://www.sohu.com/a/372072860_114986，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2 日。

要多元行为体，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逐渐凸显，非政府组织是区别于政府与私营企业的组织，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非官方性等特点，从全球社会治理经验来看，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公共危机管理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①在危机管理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全面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是人类解除疫情危机的关键，国际社会应该建立国际交流渠道，并加强疫情和病毒数据及信息资源共享。^②通过民间交流形式主动促成我国科学家与海外科学家的合作，对于正在进行病毒疫苗和药物研究科学团队，应给予相应的互联网便利条件，方便其与海外学者进行交流，可以通过社会机构组织中、美、欧、日等国家或地区联合科学家防疫调查组，合作论证病毒来源、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形成防疫领域的科学共同体。特别是全球新冠肺炎“战疫”已经进入多国联盟新阶段，打破国界划分，形成多国联盟抗疫是这场战“疫”新阶段的新形势。科学组织科学家们加紧科研攻关，与病毒“赛跑”，为全人类的命运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使用与推广作出贡献。在民间外交推行过程中，信息是疫情危机的稀缺资源，特别是国家间的信息。民间外交可以推进获得足够的信息，很多危机正是因为缺乏权威信息造成的。^③



扫码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免费获取完整版电子专辑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经济展望 ——基于国际组织和知名智库的判断

任康钰 巴玥 许斯昂

内容提要：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很快就形成了席卷全球之势，给诸多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对疫情下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判断，怎样认识不同行业和市场可能受到的冲击，成为经济领域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知名智库迅速做出反应，跟踪疫情发展，基于自身的专业资源做出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就其中的主要观点、判断进行了梳理，以期较为全景地展现来自国际组织和知名智库的展望和建议，进而能够为我们认识疫情下的经济状况提供参考，并为政府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关键词：新冠疫情；世界经济；国际组织；智库

作者简介：任康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货币金融；巴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许斯昂，通讯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国际组织（北京，100089）。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36(2020)04-0017-24

一、引言

2020年以始料未及的方式打开，世界受到了几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年初集中在中国武汉、到后来欧美地区的爆发式增长，再到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确诊；从最初的个位数病例，到2020年5月底的全球超过500万累计确诊和30多万的死亡人数，^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COVID-19）让

^① 新浪网：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动态追踪，https://news.sina.cn/zt_d/yiqing0121，访问日期：2020年5月20日。

人们逐渐认识到其可怕的破坏性，也让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承受这一破坏性带来的影响：从不得不较长时间呆在家里，到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同时也迫使每一人都要考虑：“疫情到底会持续到何时？疫情会怎样继续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而在疫情下超越个人的视角，从更宏观的层次思考这些问题，也刻不容缓。因此，自疫情爆发以来，很多国际经济组织迅速响应，积极应对，以各自的专业性做出相关判断，提出或执行救助措施。以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预防经济危机、促进金融发展为宗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通过展开金融支持、提出政策建议、开发特别工具来帮助其成员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网站首页建立了“The IMF and COVID-19”专栏^①来提供所有信息。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 WB）对疫情的反应更为全面，不但推出了相关的金融、贸易分析，还建立了 COVID-19 的数据库，^②跟踪疫情对商品市场、跨国汇款等细分领域的影响。联合国下的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 2020 年 3 月初发布了疫情对全球贸易和投资（FDI）^③的影响，并分析了可能受冲击最大的具体产业，如汽车、航空业等。国际清算银行（BIS）^④、世界贸易组织（WTO）^⑤等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也纷纷发声。

国际经济组织的专业判断，为我们理解疫情造成的冲击、探索和准备疫情期间及疫情结束后的恢复之道，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与此同时，一些知名智库（Think Tank）也在不断形成具有深厚专业基础的研究报告，探讨相关问题。作为职业的智囊和咨询机构，智库的研究产品一直是政府决策中的重要参考。它们的研究往往更具有实用性和预见性，对把握趋势和发展脉络非常有价值。尤其是一些国际知名智库，更是提供着可能影响决策的研究产品，甚至可以创造出引导未来发展方向的话题。目前，全球的智库有上万家。2006 年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研究项目（TTCSP）”每年都会发布一期《全球智库报告》，对全球智库进行综合评价与排名。2020 年 1 月 30 日，最新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9 年》发布，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① IMF: *The IMF and COVID-19*, <https://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 访问日期: 2020 年 4 月 20 日。

② World Bank, *World Bank Group and COVID-19*, https://www.worldbank.org/en/who-we-are/news/coronavirus-covid19?intcid=wbw_xpl_banner_en_ext_Covid19, 访问日期: 2020 年 4 月 25 日。

③ UNCTAD: *Global Trad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Epidemic*,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tcinf2020d1.pdf?user=1653>, 访问日期: 2020 年 5 月 10 日。

④ BIS: *Coronavirus(COVID-19)*, <https://www.bis.org/topic/coronavirus.htm>, 访问日期: 2020 年 5 月 10 日。

⑤ WTO: *COVID-19 and World Trade*,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covid19_e/covid19_e.htm, 访问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

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等名列前 10 名。近年来，中国的一些智库也越来越受关注，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等。疫情发生之后，这些智库大都迅速启动了对疫情下全球或国别经济、具体产业和市场等的跟踪研究，并从 2020 年 2 月初就开始陆续发布相关研究报告。

当然，疫情的发展既有医疗专家可以理解和预测的部分，也有出乎意料的走势。因此，无论是国际经济组织，还是知名智库，也都在不断随形势变化调整其判断。首先，据确诊病例在中国和除中国之外的变化情况看（见图 1），从 2020 年 1 月 11 日有系统统计开始，早期的新增病例主要出现在中国，直到 1 月 23 日武汉启动封城时，海外的每日新增数还在个位数；一直到 2 月底，疫情的主战场仍然在中国，尤其是湖北地区；2 月的最后一天，海外的新增病例数才第一次突破三位数，达到 1468 例。接下来，从图 1 可以看出，中国的新增曲线越来越低，从 3 月 7 日起基本回落到 100 以内。而海外的新增曲线则不断飙升：到 3 月 14 日，海外单日新增病例突破了 1 万例；4 月 4 日的新增病例达到近 10 万例，之后基本保持在 8 万例左右的高位上，而曾经疫情最为严重的中国武汉，则在 4 月 8 日解除了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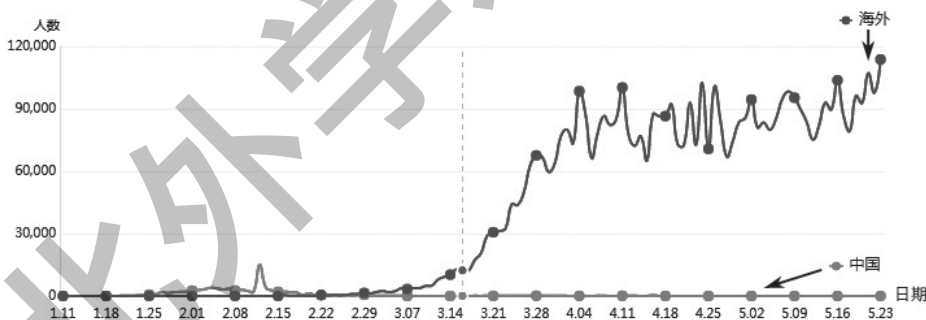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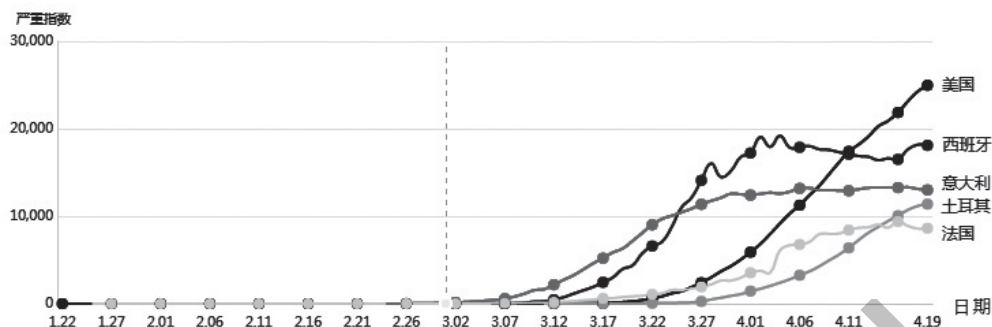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与海外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数

数据来源：https://news.sina.cn/zt_d/yiqing0121，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4 日。

从数字对比可以看出，早期的关注必然集中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疫情发展中的各项防控措施，不但对自身产生巨大影响，也震动着整个世界，这也被很多机构认为是疫情的“第一波”。但是，从 2020 年 3 月开始疫情在海外迅速恶化，国际组织和智库的研究视角也开始转移和扩展。并且，基于疫情在欧美、伊朗、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演进情况，疫情又被划分成了“第二波”和“第三波”。

图2 海外主要国家疫情严重指数^①

数据来源：https://news.sina.cn/zt_d/yiqing0121

在3月初开始的“第二波”中，意大利和伊朗率先爆发，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法国等国家，美国也很快在3月19日突破了一万例，并在3月27日成为世界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之后的疫情更是快速发展，到5月16日突破了150万例。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也相继在3月底4月初进入爆发期，开始了“第三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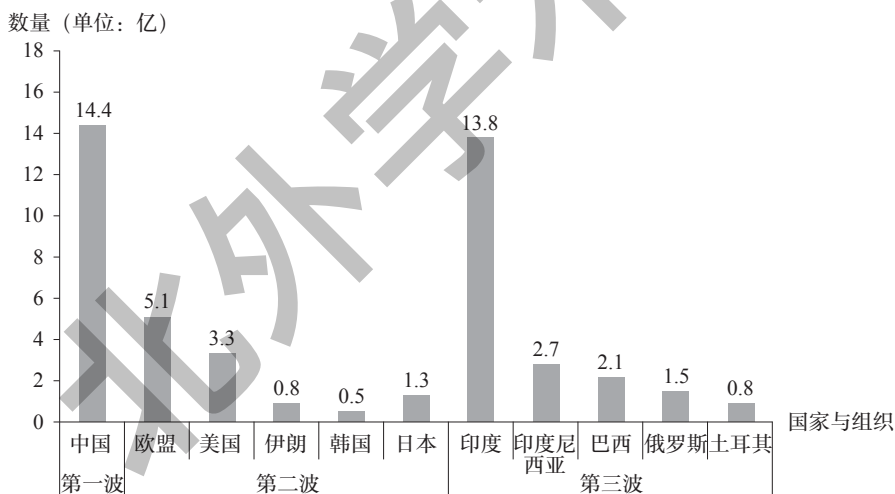


图3 全球疫情各阶段涉及的主要国家、地区人口

数据来源：联合国，中金公司研究部。

^① 严重指数：由现存确诊、国家人口数、国家建成区面积综合计算而来，考虑到确诊人口密度以及确诊人口占比两方面因素，辅以确诊数在全球确诊占比来增加占比权重，综合反映各国疫情严重程度。

这几波疫情涉及的国家人口都在 10 亿级以上，还集中了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基于对疫情不同阶段的观察，本文研究视域内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知名智库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了判断和展望，研究了不同行业或产业可能受到的冲击，针对性地推出或提出政策建议。接下来，本文拟从这几个方面展开，以期在疫情期间对经济环境有更好的把握，从而使个人（家庭）、企业、政府，都能在有限条件下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与决策。

二、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

新冠疫情从局部地区开始向全球蔓延，对所涉国家和地区的冲击逐步显现，并产生合力，共同影响着世界经济在 2020 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走势。2020 年 3 月，在中国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且疫情开始冲击海外后，国际组织和各大智库对经济发展的预测得以在一个更加宏观、也更加全面的视角下展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 2020 年 3 月发布《OECD 中期经济展望》^①报告时还认为全球经济不会受到大规模冲击，但很快便基于疫情变化做出了修正——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受到严重打击，并将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降为 1.5%。从目前情况看来，这一预期还是过于乐观。因此，在 4 月份的评论^②中，OECD 判断在当前形势下，每增加一个月的封锁，全球 GDP 增长将损失 2%。其中，仅旅游业产出就将面临高达 70% 的降幅，许多经济体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衰退。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清晰地从小 OECD 在此次过程中判断预测的变化看出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的速度。IMF 在 4 月份发布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关于 COVID-19 的评论》^③中，直接将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测降至 3%，认为这将会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远比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IMF 推测：如果此次新冠疫情能够在 2020 年下半年消退，同时全球采取的政策行动能

① OECD: *OECD Interim Economic Assessment Coronavirus: The World Economy at Risk*, 2 March 2020, <https://www.oecd.org/berlin/publikationen/Interim-Economic-Assessment-2-March-2020.pdf>,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26 日。

② OECD: *OECD Up dates G20 Summiton Outlook for Global Economy*, 15 April 2020, <http://www.oecd.org/newsroom/oecd-updates-g20-summit-on-outlook-for-global-economy.htm>, 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③ IMF: *What is the Impact of Coronavirus on the Global Economy*, 20 May 2020, <https://www.imf.org/en/About/FAQ/imf-response-to-covid-19#Q4>, 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够有效防止企业大范围破产和高失业率长期存在，那么，预计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反弹至 5.8%。与此同时，世界银行^①也指出，此次疫情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剧烈冲击，并带来经济活动的严重衰退，随后商品价格势必普遍下跌——其中，能源与金属价格（尤其是原油价格）受影响最大。作为宏观经济的风向标，原油价格于 2020 年 1—3 月骤降 50%，并在 4 月达到历史最低点，这预示和加强了世界经济不可扭转的衰退趋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疫情带来的供应链中断以及政府限制出口措施可能对未来的食物安全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直接关系到大量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

除了国际组织，世界知名智库也分享了他们的观点。英国的牛津经济研究所（Oxford Economics）与德国知名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ics, IFW）在 2020 年 3 月初发布的报告^②中预测，由于病毒的传播，2020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降至 2%，将会是 2009 年大衰退以来最低的增长率。现在看来，这个数字可能是偏高了。我们可以看到，牛津经济研究所 2020 年 4 月份新的预测^③便将 2020 年全球 GDP 增长率调到 -2.8%，超过了 2008 年金融危机时的衰退程度；2020 年 5 月，该机构最新的预测^④表明，GDP 收缩幅度被进一步调低到 4.8%。而除了不同程度的衰退预测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衰退后的恢复。由于此次疫情冲击的特殊性，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⑤认为，此次衰退下会出现需求与供给同时不足的情况，这使得政府常用的政策工具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呈现明显效果。

① World Bank: *The Outlook for Commodity Markets, and the Effectsof Coronavirus, in Six Charts*, 23 April 2020, <https://blogs.worldbank.org/voices/outlook-commodity-markets-and-effects-coronavirus-six-charts>, 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② IFW: *Kiel Institute Economic Outlook: GDP expected to shrink in 2020*, 12 March 2020,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media-information/2020/kiel-institute-economic-outlook-gdp-expected-to-shrink-in-2020/>, 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③ Oxford Economics: *World Economics Prospects*, http://resources.oxfordeconomics.com/world-economic-prospects-executivesummary?interests_economic_topics=macroeconomics&interests_trending_topics=coronavirus,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15 日

④ Oxford Economics: *World Economics Prospects*, http://resources.oxfordeconomics.com/world-economic-prospects-executive-summary?interests_economic_topics=macroeconomics&interests_trending_topics=coronavirus, 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⑤ PIIE: *Designing an Effective US Policy Response to Coronavirus*, 2 March 2020,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designing-effective-us-policy-response-coronavirus>, 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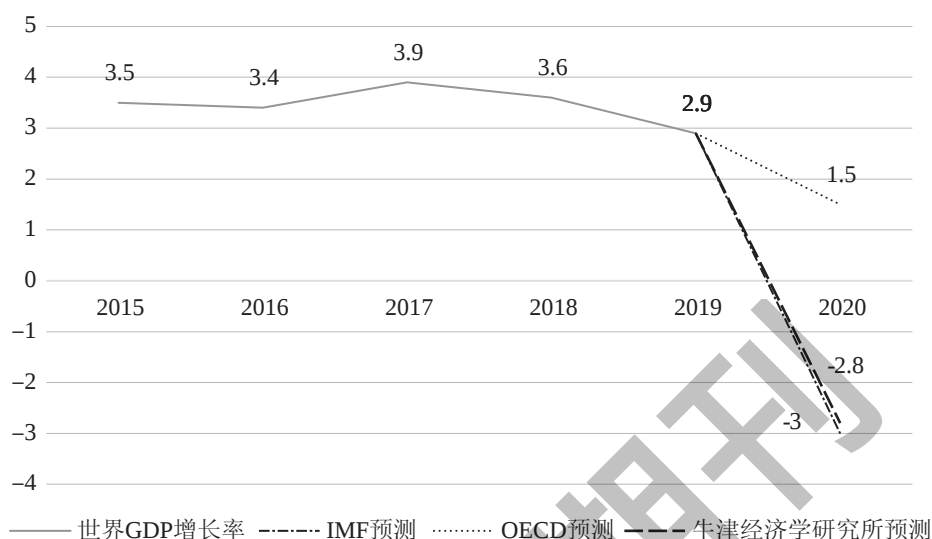


图4 全球GDP增长及预测

世界的表现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自身运行及彼此互动的结果，而国际组织与智库对全球经济的展望也是综合对各个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预测和判断而得出的。从前文对疫情分段的情况来看，中国、欧洲、美国顺次在第一波、第二波中受到冲击，接下来我们再具体看一下对这几个区域的判断。

中国在此次全球疫情中经济最先受到冲击。显然，此次新冠病毒疫情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应对能力及对病毒蔓延的控制能力。回望2003年，中国也曾经历过一次类似的公共卫生危机——非典。仅从经济角度探究，当年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低于人们的估计——2003年前后，中国经济仍然处于改革开放后较为高速（10%左右）的发展阶段，再加上非典疫情影响的时间和范围都非常有限，因而经济较快实现了全面恢复。反观此次新冠疫情，中国经济将会面对更大的困难。我们同时注意到，2020年还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这将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2020年1月底，全国范围内实施防疫。2月中国经济几乎陷入停滞，综合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从1月底的53.0%降至2月底的27.5%，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Bruegel^①在2020年3月初预测中国2020

^① Bruegel: <https://www.bruege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PC-06-2020-130320.pdf>, 访问日期：2020年5月20日。

年第一季度的 GDP 会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收缩。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4 月 17 日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 20650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 6.8%。同时,2020 年 3 月份国内的失业率达到了 5.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6.1%,外资同比下降 10.1%,但并未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的情况。^①

从数据上看,第一季度的表现比较符合预期,随着中国逐渐复工复产,经济有望在第二季度反弹。同时,相比于疫情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病毒传播,在全球仍然笼罩在新冠疫情的负面情绪中且经济严重停滞的情况下,中国取得了优先的战略位置,在经济恢复与反弹上存在着较大优势。2020 年 4 月 29 日对中国疫情防控是个重要节点——中国首都北京宣布自 2020 年 4 月 30 日起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中国两会的召开时间也随即确定,全国复工复产已全面实现,经济恢复逐步进行,各大智库也作出相应判断。PIIE^② 在 2020 年 2 月份仍预计 2020 年中国经济将保持 5.9% 的增长率,虽然值得期待但明显过于乐观。OECD 在专栏文章^③中指出:鉴于中国在全球生产、贸易、旅游和大宗商品市场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疫情有效遏制情况下,2020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低于 5%,但在 2021 年将逐步回升至 6%。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④指出,中国第一季度 -6.8% 的增长速率超过预期,3 月指标明显好于 2 月,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从疫情当中走出来,并认为,中国 2020 年经济增长目标应为 2.5%—3%。兰德公司 (Rand) 在其 3 月份发布的《新冠疫情对中小企业影响评估》中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其韧性很强大,前景整体乐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余森杰认为,中国全年 GDP 增速大概会在 3% 至 4% 之间,会成为世界范围内表现较好的国家。

欧洲是第二个遭受新冠疫情威胁的区域。根据路透社的报道^⑤,欧洲爆发的疫

① 新华社:一季度重要数据出炉怎么看当前经济形势?, 2020 年 4 月 17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17/content_5503698.htm, 访问日期: 2020 年 4 月 20 日。

② PIIE: *China Economic Recovery Strategy Faces Challenges*, 24 March 2020, <https://www.piie.com/blogs/china-economic-watch/chinas-economic-recovery-strategy-faces-challenges>, 访问日期: 年 5 月 20 日。

③ OECD: *OECD Interim Economic Assessment Coronavirus: The World Economy at Risk*, 2 March 2020, <https://www.oecd.org/berlin/publikationen/Interim-Economic-Assessment-2-March-2020.pdf>, 访问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解读一季度经济数据: 好于预期, 全年经济增速目标预估 2.5-3%, 2020 年 4 月 4 日, http://www.iwep.org.cn/xscg/xscg_sp/202004/t20200424_5118474.shtml, 访问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

⑤ Reuters: *Eurozone set for record recession, inflation to vanish-Commission*, 6 May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eu-economy/euro-zone-set-for-record-recession-inflation-to-vanish-commission-idUSKBN22I151>, 访问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

情，其流行程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流行性疾病相比，传播范围更广，更加剧烈，对欧洲各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尤其是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与葡萄牙等国。意大利是第一个受到疫情冲击的欧洲国家，其旅游行业随之下降了40%到80%。随着国内封锁范围的增大，这种情况继续恶化。IMF^① 预计2020年意大利经济将出现高达9.1%的收缩。尽管疫情较轻，但经济本身就比较脆弱的希腊，可能会面临最大的GDP缩减幅度，达到9.7%的降幅。西班牙紧随其后，预计会有9.4%的降幅。除了以上四个国家，IMF^② 对英国、法国的2020年增长率预测也较为悲观，分别是-6.5%与-7.2%。而德国作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出口国，虽然疫情较轻，但基尔研究所^③ 认为其在此次疫情所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中国疫情处于高峰期时，德国生产商同时面临着来自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冲击。而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提供了德国生产过程所需中间投入品的10%。数据表明，2020年2月德国对华出口同比下降8.9%，进口同比下降了12%。自2020年3月中旬以来，德国政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公共卫生措施，这也令本来前景黯淡的经济雪上加霜。所以，即使德国的疫情得到控制，本国经济能否复苏仍要取决于全球贸易量的情况。基尔研究所^④ 对德国2020年的经济情况预测相对乐观，预计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下降0.1%，到2021年有望恢复到2.3%的增长。从欧洲整体上看，基尔研究所认为欧元区在2020年将经历衰退，失业率也将暂时再次上升，近期消费价格的温和上涨将明显放缓，经济增长率预计为-1.0%。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⑤ (McKinsey) 的预测则要悲观得多，认为欧洲经济整体将在2020年萎缩11%，并且到2023年才能恢复到此次疫情之前的水平。

美国的疫情爆发晚于中国和欧洲，但之后的情况迅速恶化，很快就成为全球

①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The Great Lockdown*, 6 April 20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访问日期: 2020年5月20日。

②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The Great Lock down*, 6 April 20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访问日期: 2020年5月20日。

③ IFW: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Global Economy —Survey-based Evidence from Free Zones*, April 2020,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kiel-policy-briefs/2020/the-impact-of-the-covid-19-pandemic-on-the-global-economy-survey-based-evidence-from-free-zones-14087/>, 访问日期: 2020年5月20日。

④ IFW: *Kiel Institute Economic Outlook: GDP expected to shrink in 2020*, 12 March 2020,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media-information/2020/kiel-institute-economic-outlook-gdp-expected-to-shrink-in-2020/>, 访问日期: 2020年5月20日。

⑤ McKinsey: *How European Businesses can Position Themselves for Recovery*, 29 April 2020,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sector/our-insights/how-european-businesses-can-position-themselves-for-recovery>, 访问日期: 2020年5月20日。

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截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 美国累积感染人数已突破 157 万, 其中死亡人数达到 93533 人, 早已超过了美国在越战期间的牺牲人数。除了感染人数巨大, 美国经济遭受的打击也非常严重, 从短时间内的几次股市熔断, 到迅速上升的失业人数, 实体经济和预期层面都迅速调整。据麦肯锡^①统计, 自 2020 年 3 月 14 日开始的六周里美国失业金申请总额达到 3000 万件。较高的失业率会带来连锁反应——各州及地方政府削减公共部门岗位, 学校削减预期开支, 各大银行也大量裁员。摩根大通 2019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只有 50% 的小企业有足够 15 天的现金储备, 而只有 40% 的企业拥有 20 天的现金缓冲期。因此, 流动性将成为疫情期间各中小企业首要担忧的事情。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AEI)^② 认为, 美国的小企业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在疫情下遭到重大破坏; 等疫情缓解后, 经济复苏的能力将极大程度依赖于这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因此, 预计美国 2020 经济增长率会下降 5.4%。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③ 指出, 由于此次疫情几乎在所有方面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如病毒的传染性、流行性和致死性, 美国医疗系统的应对能力以及疫情下的政策应对措施等, 这些不确定性最终将带来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因此, 他们预测截至 2020 年第四季度, 美国实际 GDP 可能出现高达 11% 的同比下降指数。

表 1 IMF《世界经济展望》增长预测 (%)

年份	2019	2020 (预测)	2021 (预测)
世界	2.9	-3.0	5.8
中国	6.1	1.2	9.2
日本	0.7	-5.2	3.0
美国	2.3	-5.9	4.7

(待续)

① McKinsey: *COVID-19 and Jobs -Monitoring-the US Impact on People and Places*,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sector/our-insights/covid-19-and-jobs-monitoring-the-us-impact-on-people-and-places>, 访问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

② AEI: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An introduction*, 1 April 2020, <https://www.aei.org/research-products/report/the-paycheck-protection-program-an-introduction/>, 访问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

③ NBER: *COVID-Induced Economic Uncertainty*, April 2020, <https://www.nber.org/papers/w26983>, 访问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

(续表)

年份	2019	2020 (预测)	2021 (预测)
英国	1.4	-6.5	4.0
法国	1.3	-7.2	4.5
意大利	0.3	-9.1	4.8
西班牙	2.0	-8.0	4.3
德国	0.6	-7.0	5.2

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访问日期：2020年5月20日。

疫情不但影响着各个国家及整个世界的经济走势，甚至可能带来一些经济发展趋势和格局的改变。首先，近年来，反全球化浪潮迭起，以美国发起贸易战为代表，威胁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可能会带来更多冲击。PIIE^①认为，此次疫情会导致世界各国来往骤减，使得世界经济还原到各国相互隔离的状态。许多政策制定者以及企业开始消极看待全球化的趋势，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下国际合作已然大量缺失，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倒退。但是，也有乐观的观点，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②认为，经济活动的逐利性及第四次科技革命发展的不可抗拒性，使得绝大多数国家不可能拥有全要素供应链。因此，疫情的影响仅仅是部分，并不会改变全球化发展的大势。当然，不管是悲观还是乐观的预判，可以确定的是全球化在未来深化的进程中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其次，疫情可能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巨大变化。中国在此次疫情中展现出其绝佳的政治勇气、有效的社会治理和大国的责任担当，经济也表现出危机下的韧性，并且率先控制住疫情，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恢复发展，保证和提升了其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将成为全球制造业回流的首选。^③相比之下，

① PIIE: The Pandemic Adds Momentum to the Deglobalization Trend, 23 April 2020,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pandemic-adds-momentum-deglobalization-trend>, 访问日期：2020年5月20日。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疫情将全球化推向何方？短期回摆难挡长期继续加深，2020年5月1日，http://www.iwep.org.cn/xscg/xscg_sp/202005/t20200501_5121504.shtml, 访问日期：2020年5月20日。

③ 余森杰：《余森杰：我国是全球制造业回流的首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http://www.cinn.cn/gongjing/202005/t20200506_227897.html, 访问日期：2020年5月10日。

美国不但在本国疫情控制中出现政策失误，而且也没有体现出其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领导力。^①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更增加了欧洲在疫情之下演进的不确定性。2020 年 5 月以后，俄罗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5 月 16 日确诊人数达到 28 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多病例数国家，再叠加油价的长期低位，也非常值得关注。因此，可以预见，欧洲、亚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格局乃至地缘政治格局，都可能随着疫情的演进发生较大变化。

三、对主要行业 and 市场的判断

对世界及各国的经济形势的判断，要基于更为微观的行业和市场研究。因此，国际组织及智库还特别关注一些重点行业和市场。疫情之下首先受到冲击的便是一国的消费行业，进而是基于国家间经济往来的贸易、投资等行业，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负向冲击。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行业或产品反而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比如线上经济业态和医药医疗产品等。

（一）零售与制造业

零售行业的蓬勃发展基于大众的消费场所活动（线下）或便捷的物流网络（线上）。随着防疫措施的实施，一方面公众减少外出，另一方面消费场所关闭或限制人流、物流力度加大，因而带来最为直接而严重的冲击。制造业作为零售业的基础，同样损失惨重，需求下滑、工人复工复产的延后都会带来巨大影响。

从中国的数据看，2020 年第一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同比下降幅度达 19%。^②但随着最艰难的阶段成为过去，复工复产有序推进，预计零售业的表现会在第二季度会明显好于第一季度。而从全球范围内看，美国、欧洲等较大的经济体 2020 年 3 月零售额同比增长率下降也超过 10% 以上。但是，进入到第二季度，全球消费行业已经随着疫情的好转逐步恢复，目前已经出现明显回弹。根据 IMF、WB、Bruegel、BCG（波士顿咨询）等各大国际组织与知名智库的观点，预计会在各国政策的推动下进一步复苏。

^① McKinsey: *How can the Economies of Emerging Asia Respond to Covid-19*, 30 April 2020,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sector/our-insights/how-can-the-economies-of-emerging-asia-respond-to-covid-19>, 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② 2020 年 4 月 17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一季度的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78580 亿元。

再来看制造业。中国制造业 PMI 于 2 月份见底，之后随着疫情的缓解而逐渐复苏（图 5）。根据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的分析，虽然以受影响地区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将经历严重中断，但考虑到企业会想办法弥补大部分生产损失，因此，可能会相对较少地受到生产能力的制约，预计中国制造业可能强劲反弹（图 6）。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 2020 年 4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3.4%，比上月提高 0.4%，表明中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继续恢复，这也部分印证了 ARMO 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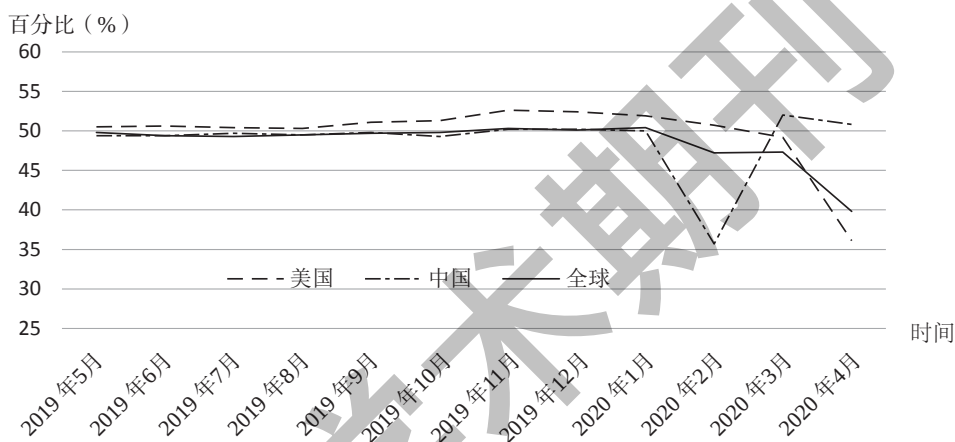


图 5 制造业 PMI 指数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及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

但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的复苏还需要时间。2020 年 4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指数较上月大幅下降 38.3%，降至 39.5%，连续 3 个月运行在 50% 以下。各大智库以及国际组织对于制造业复苏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中国制造业已经逐渐回归到疫情前的状态，而由于欧美国家疫情爆发的时间均晚于中国，所以，这些国家有望在 2020 年 4 月份见底。

在制造业中，医疗和汽车行业是受到关注较多的两个分支。医疗用品由于其特殊性，在疫情期间获得爆发式增长。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一系列医疗器械产品都是抗击疫情的重要资源，需求猛增，在短期内迎来迅猛发展。PIIE 预计，中国医疗用品的生产扩大会持续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但这部分更多是满足国内需求。因此，PIIE 提醒全球其他各国政府，要尽快提供紧急融资来提高关键医疗用

品的国内产量。^①与医疗行业相反，疫情对汽车行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冲击，且来自各个方面，涉及生产力、供应链、市场需求等诸多问题，所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将存在一定困难。BCG 的汽车和宏观经济学中心团队预测，2020 年新车销售将下降 20%，最坏的情况是下降 40%。

虽然零售与制造业受到重创，但具体到不同业态，则可能迥然不同。线下零售业的发展无疑遭遇挫折，但线上零售业则借助此次疫情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涌现了一系列新消费、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起到了保稳定保供应的作用^②，间接为制造业提供支撑与保障。自 2020 年 3 月份以来，美国最大的一家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已经雇佣了超过 10 万名新仓库管理员和配送员，公司还计划再新增 7.5 万名就业岗位，以应对订单数量的激增。一个月以来，其股价上涨了约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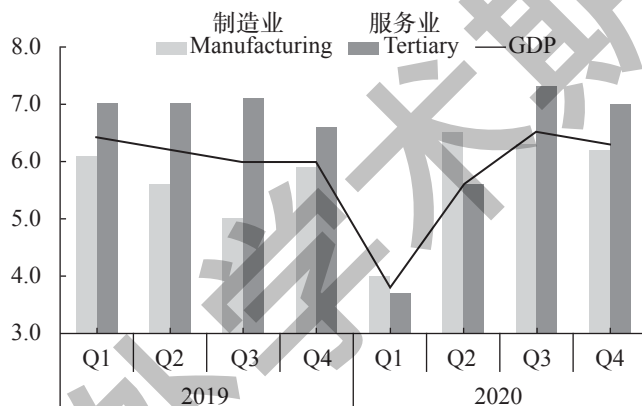


图 6 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复苏趋势预测 (ARMO)

数据来源：Wind，ARMO 计算。

(二) 服务业

以旅游、餐饮、主题乐园等为主的服务业形势不容乐观。服务业同样面临需求锐减，但与零售业和制造业相比，其利用线上形式带动消费的能力有限，因而表现将会更差。

① PIIE: COVID-19: China's Exports of Medical Supplies Provide a Ray of Hope, 26 March 2020,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covid-19-chinas-exports-medical-supplies-provide-ray-hope>, 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② <https://www.drc.gov.cn/xsyzcfx/20200303/4-460-2900298.htm>, 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中国企业联合会 2020 年 3 月份发布的《中国服务业 500 强企业受疫情影响分析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 2020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产生了明显不利影响，营业收入减少、运营成本增加、盈利下滑，中国服务业 500 强企业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损失。其中，50.77% 的企业遭受了很大损失，另有 28.85% 的企业遭受较少损失，还有 15% 的企业反映尚未对损失进行全面评估，只有 0.77% 的企业表示没有遭受损失。其中，遭受到很大损失的企业在交通运输业中占比最高，为 75%；旅游、餐饮以及娱乐业的损失均在 70% 以上。但报告中显示，多数企业对二季度经营形势持相对乐观态度。同样，欧美地区的疫情也和中国的情况类似。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数据显示，2020 年 4 月份美国服务业在 10 年来首次出现萎缩，ISM 非制造业指数从 3 月的 52.5 降至 4 月的 41.8，是 ISM 指数自 1997 年推出以来的最低水平。

正如 Bruegel 与 AMRO 分析的那样，即使是疫情逐渐缓解，服务业也很难弥补已经发生的损失。当需求反弹时，制造业企业往往能够找到弥补大部分销售损失的方法，但服务业很难挽回在逝去的时间里可能发生的消费。再加上疫情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旅游业等服务业的需求估计很难出现大幅反弹。因此，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将是一个更加缓慢的过程（见图 6）。例如，全球知名的迪士尼集团，疫情之下关闭了全球的主题乐园、商店和饭店。尽管上海的迪士尼乐园从 2020 年 5 月 11 日开始恢复营业，但惨重的损失仍然无法弥补。据迪士尼首席财务官克里斯汀·麦卡锡（Christine Mc Carthy）在 2020 年 2 月的财报电话会议^①上表示，仅关闭上海和香港两个公园二个月，就会带来 1.75 亿美元的损失。而按照瑞士银行的推算，迪士尼的美国乐园业务，闭门一天就会损失 1300 万美元。

（三）全球贸易与供应链

随着疫情的全球扩散，对贸易的重创开始逐渐显现。由于疫情导致全球工厂停产、开支减少，全球贸易急剧萎缩。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发布的广受关注的《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显示，2020 年 2 月全球商品贸易量同比下降 2.6%，环比下降 1.5%，为当年连续第二个月萎缩。

在本次疫情中，全球贸易萎缩重点表现在供应链的切断上。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2019 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

^① <https://www.cnet.com/news/coronavirus-could-cost-disney-175-million/>，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大的出口国和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是汽车、手机、医疗设备等许多产品的原料和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国和国外制造业公司中间输入品的主要供应国。但 2020 年 1 至 2 月，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作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一环，中国贸易出口暂时中断，从而导致全球供应链严重受阻。

虽然在短期内，很难找到能够替代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但各国几乎都在思考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来的问题。Bruegel 在 2 月 28 日发布的一篇《企业必须把供应链进一步从中国转移》报告中表示，跨国企业的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这种情况对企业自身没有任何好处，尤其是疫情期间，必须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同时，AEI 在《美国准备好了吗？新冠病毒与医药行业全球供应链的挑战》一文中，也在极力劝说美国企业应当力图寻求可替代的供应商。但进入 2020 年 3 月份，中国疫情率先得到控制，欧美国家疫情形势反而更严峻。此时，中国贸易出口已经逐渐回到正轨，而困扰欧美国家的供应问题便转移到当地务工人员的复工复产情况上。^①2020 年 4 月，WTO 称，为了遏制疫情蔓延，2020 年就有数亿人被迫呆在家中，今年全球商品贸易将会萎缩 13% 至 32%，降幅将超过金融危机期间。同时，联合国贸发会议还有另外的担忧，认为疫情可能造成保护主义加剧，使得全球贸易更难恢复到先前的水平。

（四）金融市场

实体经济遭到新冠疫情带来的重锤，会迅速甚至领先反映到金融市场上，如快速下降的股票市场指数和不断走低的债券市场利率等。

2020 年 4 月 13 日，IMF 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重点谈到了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自 2020 年 1 月中旬起，随着对疫情影响经济的担忧加重，全球股市出现大幅震荡。2020 年 3 月 8 日至 3 月 18 日的短短 10 天内，美国股票市场发生了四次熔断；而上一次、也是美股的第一次熔断发生在 1997 年。2020 年一季度，道琼斯指数下跌超过 23%，这是自 1987 年以来最大的季度跌幅；标准普尔 500 指数在这段期间下跌了 20%，是自 2008 年以来的最大季度亏损；同时，英国富时 100 指数、德国 Dax 指数、法国 CAC40 指数等走势也如出一辙（见图 7）。值得庆幸的是，进入 2020 年 4 月份，全球股市随着疫情的转好而出现较大幅度反弹，在持续了近一个月的低迷后终于迎来拐点。

^① Bruegel: *An Effective Economic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in Europe*, March 2020, <https://www.bruege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PC-06-2020-130320.pdf>, 访问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图7 全球重要股指走势图 (2020年1月2日=100)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经作者计算整理。

债券方面，发达经济体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急剧下降，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一度跌至0.5%，刷新历史最低记录（见图8），金融恐慌指数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①自2020年3月以来，日本、美国先后开始实施零利率政策，欧洲部分国家甚至出现负利率。同时，对金融机构来说，线下柜台大量停业，经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各大金融业务平台推出“延期还款”政策，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风控失效”，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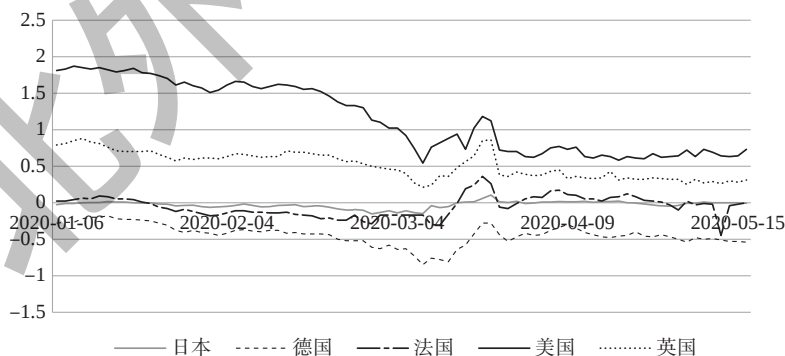


图8 主要国家十年期债券收益率 (%) 走势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

① 《金融市场对投资者的警示》，BIS 季度报告，2020年3月。

② 《疫情之下，金融科技如何补短板》，柴财智库，2020年3月。

国际组织和智库对于金融市场的复苏并不乐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认为，本次全球金融动荡的治理难度要高于此前的任何一次危机，在疫情全球扩散得到抑制之前，仅靠发达国家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很难让金融市场真正稳定下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看法类似，在对比了 1929 年与 1987 年股灾后认为，在疫情持续期间，美国股市不会很快企稳，大萧条的可能性随着疫情持续时间的延长而提升。

同时，IMF 原副总裁朱民也表示，疫情持续下金融市场目前还有波动下跌的可能，但波动会进一步按行业分化；而疫情完全结束后，金融市场一定会出现巨大变化。首先，负利率会在根本上改变市场的风险溢价、风险定价、市场定价；市场准则会发生变化，随之变化的是整个资产之间的链接。其次，对传统银行来说，数字化转型的脚步将会进一步加快。除线上办公、远程会议外，“零接触银行”的技术变革正在呼啸而来。

（五）全球 FDI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极为关注全球 FDI 受本次疫情影响情况，认为疫情对跨国公司 FDI 的主要影响表现为资本支出的推迟与再投资收益下降两个方面，且修正了先前对 2020 年全球 FDI 流量走势的预测。



扫码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免费获取完整版电子专辑

新冠疫情背景下对特朗普民粹主义言论的解读

张馨元 郑培林

内容提要：“民粹主义”可以理解作为一种话语风格。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作为话语风格表现为：人民不仅与政治精英对立，而且与作为“第三元”的少数族裔移民对立。特朗普作为右翼民粹主义政治领导人，在新冠疫情美国大流行期间所发表的言论体现出其对这两种“对立”的塑造。这背后的真正意图是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在2020年总统大选临近之时，转移民众关注点进而拉拢选民。

关键词：新冠疫情；民粹主义言论；总统大选

作者简介：张馨元，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语言学、国际关系；郑培林，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央文献翻译。（天津，300204）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36(2020)04-0041-14

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新冠疫情预示着世界新秩序的大潮流之一就是民粹主义；在对全球化的指责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正缓慢抬头。^②学者们对新冠疫情期间（2020年1月到3月）德国媒体在脸书上发布的约12万个帖子进行研究后发现：严肃媒体在大规模报道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时，一些“替代性媒体”也发布了大量信息，而右翼势力正是“替代性媒体”（alternative news media）^③报道的幕后操盘者。他们的报道添油加醋，并

* 本文为天津2018年度哲学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中外媒体话语比较的‘一带一路’对外宣传策略研究”（TJWW18-025）的阶段性成果。

② 《伊恩·布雷默：疫情预示世界新秩序三大潮流》，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0/0417/2407806.shtml?bsh_bid=5502471006，访问日期：2020年5月15日。

③ 替代性媒体：指在特定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定位为传统或主流新闻媒体的校正者的新闻媒体。这类媒体按照其替代性可分为不同层次：通过建立替代媒体网络、通过依靠不同的新闻生产线路、通过引用主流媒体中通常听不到的声音以及通过采用边缘的认识视角等。通常这类新闻内容的目的是根据主流新闻媒体中被视为代表不足、排斥或边缘化的议程来塑造公众舆论。

添加捕风捉影的内容。主导该研究的学者托斯顿·科万特(Thorsten Quandt)指出,那些在疫情中宣传阴谋论的文章体现着民粹主义特征,并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的话语风格。^①这种话语充满矛盾、威胁和疑惑,质疑着所有“官方声明”,并因此给公众造成巨大困惑。疫情持续时间越长,这种话语的制造者们就会变得越极端。^②

一、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个难以捕捉的概念,缺乏具体明确的特征描述,其本质特点是易变性。^③民粹主义贯穿于美国历史,后被植入欧洲土壤,它是一种政治逻辑,一种用以对政治进行思考的方式。^④不同的民粹主义研究者给予民粹主义不同定义,包括从政治、经济、社会和话语等不同视角观察民粹主义,并基于多种理论观点分析解读民粹主义。^⑤这些理论包括结构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社会运动理论、政党政治理论、政治心理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民主理论等,而研究方法也很多样,比如文献研究、话语分析以及建模等。^⑥民粹主义思潮席卷了欧洲并加剧了欧洲的动荡局面,随后又蔓延至美国。无论哪种民粹主义,其核心都是政治精英阶层与人民以对立的形式并存,而民粹主义政党则标榜自己是代表人民唯一真实的声音。^⑦

(一) 民粹主义的概念

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尽管学界为发展民粹主义理论做出诸多尝试,却

① 《民粹主义为什么会在疫情下滋生?》, DW, <https://www.dw.com/zh/%E6%B0%91%E7%B2%B9%E4%B8%BB%E4%B9%89%E4%B8%BA%E4%BB%80%E4%B9%88%E4%BC%9A%E5%9C%A8%E7%96%AB%E6%83%85%E4%B8%8B%E6%BB%8B%E7%94%9F/a-53261917#>, 访问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

② Thorsten Quandt, Svenja Boberg, Tim Schatto-Eckrodt and Lena Frischlich, “Pandemic Populism: Facebook Pages of Alternative News Media and the Corona Crisis — A Computational Content Analysis,” Muenster Online Research (MOR) Working Paper, Vol.1, 2020, pp.1-21.

③ [匈] 安东·佩林卡、张也:《右翼民粹主义:概念与类型》,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10 期,第 12—26 页。

④ John B. Judis, *The Populist Explosion*, NY,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6, p.11.

⑤ Kirk A. Hawkins, *Venezuela's Chavismo and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02-105.

⑥ Bart Bonikowski, “Three Lessons of Contemporary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23, No.1, 2017, pp.9-24.

⑦ Thomas Greven,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rli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6, pp.2-3.

并未就民粹主义的定义达成共识，只能找到一个分析内核，即社会最终会分裂成两个同质且对立的阵营——“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①是“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②这是民粹主义变体的共同特征，但“人民”和“精英”却并非一成不变。

首先，民粹主义政治中“人民”概念的边界往往是模糊抽象的，便于民粹主义领袖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的阵营。他们利用主流民众对特定外群体的反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通过“排他性”将“人民”建构成一个拥有合法政治权力的群体，尽管此处“人民”只是虚构出的群体。^③此外，民粹主义者眼中的“人民”未必是真正处于绝对贫穷状态的人们，但一定是自认为被剥夺、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人们。这种感觉使他们不仅能团结起来，且很容易找到对立面，即“人民”的敌人。民粹主义者在此过程中提供的解决方式是设置一个敌人，并让其承担民众的愤怒。^④

其次，民粹主义政治中的“精英阶层”身份并不相同。精英阶层可能是政府官员、选举代表，也可能是记者、学者或商业领袖。民粹主义政治中“人民”的谱系范围很宽，但基本都具备‘反精英’属性。民粹主义领袖通常会强调“人民应为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却被‘腐败的精英’掌握了权力，还利用手中权力剥削和压迫人民”。^⑤之后，民粹主义领袖基于对精英的指控提出解决办法，即由代表人民的民粹主义政党或领袖获取政治权力。^⑥

虽然，反精英和亲人民是民粹主义基本的道德逻辑，但由于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历史与制度文化因素有所不同，民粹主义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派着力于批判社会上层，即“企业界精英以及与他们同流合污的政府官员”，这类民粹主义者被称为自由派或左翼民粹主义，他们追求的是不分种族和宗教的所有美国人的平等；另一派则着力于批判包括社会精英和社会底层少数族裔两种对象的民粹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精英与少数族裔之间存在某种“邪恶”同盟，而这个同盟的目标是损害占美国人口大多数的中下

①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9, No.4, 2004, pp.541-63.

②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3.

③ Ibid, p.57.

④ Francisco Panizza,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New York, Verso, 2005, pp.35-37.

⑤ 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页。

⑥ Margaret Canovan, "Taking Politics to the People: Populism as the Ideology of Democracy," in Yves Meny and Yves Surel, ed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p.134-138.

层白人的利益，这类民粹主义者被称为保守派或者右翼民粹主义者。美国两大民粹主义传统之间的区别是：左翼民粹是二元的，强调精英与人民的对立；右翼是三元的，强调精英、少数族裔与中下层白人的对立。^①

（二）民粹主义的本质

民粹主义是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它不断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粹主义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当把民粹主义理解为意识形态时，不仅易于分析，也易于了解民粹主义行为体的想法如何而来、其政策立场是什么、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政治形式来赢得大众支持等。有些学者把民粹主义归类为一种“中心薄弱的意识形态”，^②形式上是对精英的批判和对人民的赞美，而真实目的则是通过在道德上打击精英阶层，指责他们只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而激发公众不满、恐惧和愤怒，并将民众的这类情绪最终用于实现自身的政治议程。意识形态的理解路径虽然有助于解释民粹主义行为体的动机，但它的假定前提却存在问题：如果民粹主义是意识形态，那么它应该具有政治行为体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属性，但实际上民粹主义却具有流动的动态属性。^③

若民粹主义本质并非意识形态，又该是什么呢？民粹主义学者巴特·博尼科斯基（Bart Bonikowski）和诺姆·吉德隆（Noam Gidion）研究了多位美国总统的竞选话语后发现，同一位候选人在不同时期竞选话语中呈现出的民粹主义的程度非常不同，说明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话语风格或方式，或称之为政治家在话语中使用的“框架”。^④民粹主义作为话语风格或方式表现出两个特点：

第一，强调“人民”与“精英”的对立。社会学学者卡洛斯·代·拉·托雷（Carlos do la Torre）认为“民粹主义”这种话语方式将政治建构为人民大众与精英阶层之间的道德与伦理对立。^⑤民粹主义政治家利用民粹主义话语动员群众和

① 谢韬：《只有摧毁美国才能拯救美国？——论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根源》，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8期，第50页。

② Michael Freedon, *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Theory: A Conceptual Approa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85.

③ Bart Bonikowski, "Three Lessons of Contemporary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23, No.1, 2016, pp.9-24.

④ Bart Bonikowski, "The Populist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Presidential Campaign Discourse," *Social Forces* Vol.94, No.4, 2016, pp.1614-16.

⑤ Carlos de la Torre, *Populist Se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Ecuadorian Experienc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3.

争取选票的方式，就是要在其话语中建构“人民与精英”二元对立的框架。具体来说，他们经常将某一个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并将道德高尚的“人民”与道德腐朽的“精英”之间的对立作为框架视角来切入对议题的讨论，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使观众产生共鸣。

第二，强调“人民”概念的可变性。民粹主义学者科克·霍金斯（Kirk Hawkins）和历史学家麦克·卡赞（Michael Kazin）都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二元论话语方式，并进一步提出民粹主义的力量在于其适应性。^① 政治学家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指出，民粹主义话语的“能指”（Signifier）其实是空的，故可依据不同的情境带入不同的内容。^② 另外，“民粹主义”概念里的“人民”并不是泛指全体人民，而是根据民粹主义领袖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严格规定和限制的团体，范畴的边界到底如何划分取决于具体情境，被划分在“人民”范畴之外的就是敌人，是要与之斗争的对象，因此，“民粹主义”话语方式也可称为“反现状话语”。^③

二、新冠疫情下特朗普民粹主义话语的使用

大多数学者将特朗普称为“新民粹主义”，^④“新”在于他是“右翼民粹主义”，^⑤还有人直接称其为“白人民粹主义”。^⑥ 本文认为，民粹主义的本质是话语风格或方式，或是话语中使用的“民粹主义框架”，行为体对民粹主义话语的使用具有流动性，大多出于某种政治意图。他们会根据社会背景与受众情况，选择民粹主义或非民粹主义语言来表达其政治主张。本文将结合新冠疫情在美国大流行期间特朗普发表的言论来分析其话语中的民粹主义框架，考察他的民粹主义话语如何

① Kirk A. Hawkins, "Is Chavez Populist? Measuring Populist Discour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0, Vol. 42, No.8, pp.1040-67;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xi.

②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69.

③ Francisco Panizza,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2005, pp.1-31.

④ [英]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第100页，第156页。

⑤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pp.23-53.

⑥ Amanda Taub, "Trump's Victory and the Rise of White Populism,"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6/11/10/world/americas/trump-white-populism-europe-united-states.html>, 访问日期:2020年4月26日。

体现了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倾向，以及这些话语背后的真正意图。

2020年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日内瓦召集紧急委员会会议，将疫情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①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的迅速传播，2020年2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风险级别由“高”调至“非常高”。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宣布，此次疫情已构成“全球大流行”。^②2020年1月22日，美国官方宣布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4月27日晚，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团队实时统计，全美确诊新冠肺炎人数已超过百万，死亡病例已超六万，全美50州均有疫情且均有死亡病例。在疫情快速发展的三个多月里，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从盛赞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高效得当，称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有力地领导了对新冠病毒的反攻”，强调了美国政府正在与中国“密切合作”以遏制这种疾病；到2020年3月16日突将“新冠病毒”改称为“中国病毒”，为这次全球流行的传染病涂抹上了种族主义色彩；再到2020年4月14日，以“对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应对上未能履行其基本职责”为由，指示政府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最后到2020年4月23日签署总统行政令，暂停批准绿卡申请60天……其言论不断发生变化，而这也许并不是结束。

（一）新冠疫情下特朗普的言论

美国官方宣布第一个确诊病例是在2020年1月22日，至今已经历时三个多月。“截至作者向编辑部投稿日”本文将分为两个部分梳理其言论内容及特点。

第一部分是《纽约时报》三位记者所记录的特朗普从3月9日至4月中旬关于新冠疫情的言论；第二部分将主要梳理新冠疫情期间特朗普与中国相关的言论。

1. 特朗普新冠疫情期间言论的总体特点

从3月9日到4月中旬，特朗普发表的言论超过26万字，《纽约时报》的三名记者考察了特朗普所有与疫情相关的发言，并在此基础上对特朗普的话语风格进行了归纳和描述。这些文字记录显示了特朗普的发言中包含大量的固定模式以

①《世卫组织新型冠状病毒突发事件委员会将继续开会》，世界卫生组织，<https://www.who.int/zh/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statement-on-ihr-emergency-committee-on-novel-coronavirus>，访问日期：2020年4月28日。

②《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RFI，<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311-%E4%B8%96%E5%8D%AB%E7%>，访问日期：2020年4月28日。

及重复信息，显示出傲慢和自夸的特点。^①三位记者通过考察特朗普的言论，将其言论常用的模式和主题归纳为以下六点：

第一，经常对新闻媒体嗤之以鼻，并斥责媒体对他的功劳视而不见，也从未给予过他应有的赞誉。

第二，谎称自己总是在抗疫过程中迅速果断地做出反应，而实际上，他一再淡化病毒的严重性。

第三，把矛头指向各州州长。比如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每日工作小组发布会上，他如此谴责州长们：我们有 50 个州长，其中很多州长都是民主党人，他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②

第四，他在 2020 年 1 月份对中国采取了旅行禁令，并夸大地声称这一决定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通过这一事件，他将自己刻画为一位英勇的、敢于与全世界抗争的英雄人物。

第五，惯于指责其他总统，其中最严厉的莫过于对奥巴马总统的指责。特朗普声称，前任总统们留给他的是一个过时的、支离破碎的体系和可怕的考验。同时，他还指责其他前任总统们玩忽职守。对于事实，特朗普是选择性使用，有时还会错用。

第六，试图发出团结与同情的声音。他夸赞民众——无论在哪里，都能看到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前线医生和护士们的勇气，能看到食品供应工作者的奉献精神，以及每位公民对战胜病毒的承诺。

综上，特朗普在疫情期间的发言中最常见的是自我喝彩，他确实对其他人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超过 360 次），但也多次指责他人在州和联邦政府的应对措施上做得不够（超过 110 次）。他还试图表现出同理心或呼吁全国团结（约 160 次），但这只是他赞美自己和其团队次数的四分之一。

2. 特朗普对中国的言论

研究者认为，民粹主义者惯于将领袖气质、政治失范及明目张胆的歧视结合

^① Jeremy W. Peters, Elaina Plott, Maggie Haberman, “260000 Words, Full of Self-Praise, From Trump on the Virus,”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4/26/us/politics/trump-coronavirus-briefings-analyzed.html>,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Vice President Pence, and Members of th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in Press Briefing,”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vice-president-pence-members-coronavirus-task-force-press-briefing-25/>,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

起来。^①也有学者将民粹主义易于煽动起民众极端情绪的表演维度称为“快感政治”。^②特朗普所使用的“快感政治”从形式层面看,是倚重网络新媒体同时抨击传统媒体;从内容层面看,是通过发布大量负面情绪性言论、自相矛盾言论以及对事实天马行空加工后,让真相变成“后真相”,通过极力自夸、指责他者和激发民众恐惧与焦虑达到某种政治意图。^③

在新冠疫情期间,特朗普发布有关中国的言论就体现出自相矛盾的风格。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统计,2020年1~4月,特朗普曾37次赞扬中国对阻止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做出的努力,^④可是其间又穿插着对中国的指责和攻击。2020年3月16日,特朗普突然将疫情疾病从“冠状病毒”改称为“中国病毒”,这一行为引发了评论人士的指责,称他的做法将流行病涂抹上了种族主义色彩。公共卫生专家曾告诫,将流行疾病与特定种族群体或地区联系在一起可能带来病耻感。特朗普为自己使用“中国病毒”一词进行辩护,将其与“西班牙流感”做类比,称其只是将地名与流行病组合在一起使用。且不说“西班牙流感”起源于美国,更大的问题是,特朗普如此使用语言会将一场健康危机演变为“排外和种族歧视”的政治危机。^⑤2020年4月14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宣布将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他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疫情的危机反应迟缓,还谴责世界卫生组织“以中国为中心”。特朗普在有关美国疫情处置的一连串失误后,和鹰派官员转而对华进行指责,在新冠病毒源头并未有定论的前提下对中国追责,要求赔偿。^⑥在疫情工作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除了其他惩罚性措施外,政府还将寻求数千亿美元的赔偿。

从特朗普有关中国言论所体现出的自相矛盾风格中可以解读:在美国,新冠

① [澳]本杰明·莫菲特、西蒙·托米著:《对民粹主义的再思考:政治、媒介化和政治风格》,宋阳旨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第38页。

② 吴冠军:《阙点中的民主——2016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学分析》,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第21—22页。

③ 谭道明:《民粹主义的三个维度——以特朗普民粹主义为例》,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39期,第50—52页。

④ Jennifer Hansler, Curt Merrill and Isaac Yee, “The Many Times Trump Has Praised China’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CNN, <https://www.cnn.com/2020/04/21/politics/trump-china-praise-coronavirus-timeline/index.html>, 访问日期:2020年5月25日。

⑤ Eladio Bobadilla, “COVID-19 and Trump’s Racist Rhetoric,” Common Dreams, <https://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20/03/19/covid-19-and-trumps-racist-rhetoric>, 访问日期:2020年4月30日。

⑥ 《新冠肺炎疫情,你应当知道的15个真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大使馆, <https://www.fmprc.gov.cn/ce/cein/chn/gdxw/t1779500.htm>, 访问日期:2020年5月16日。

疫情的影响已经逐渐超越了公共卫生领域，并慢慢渗入社会和政治领域，带来消极影响。当这场流行病被称为“中国病毒”时，美国一些城市也加强了对移民的搜捕。追溯美国的历史会发现，危机时期的人们总要寻找替罪羊，而政府则会利用人们的恐惧和焦虑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①

（二）特朗普言论中的民粹主义框架

特朗普拥有一套模式化的民粹主义话语体系和表达风格，它可以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简化为“人民”与“精英”及“第三元”之间的对抗。在上一部分中，本文对作为话语一个分支的言论进行了分类梳理，下面将特朗普言论中的民粹主义相关要素分别进行归总。

1. 特朗普言论中的“人民”

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期间发表的言论中，对两个群体大加赞赏：

其一，特朗普对每日置于危险之中拯救病患的医疗工作者进行赞扬，他称医护人员们为“我们的战士”。^②

其二，特朗普经常赞赏美国人民在疫情期间表现出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他对民众说，“我们调动出了美国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美国人民的勇气”，并经常表示，他相信这个遭受重创的国家会迅速恢复元气。

德克萨斯大学的罗德瑞克·哈特（Roderick P. Hart）教授认为特朗普在向受难者表示同情心的时候总是很做作。媒体评论说，他的赞美总是显得不真实。而当他表达善意的时候，也通常会用一种平淡、无表情的语气表达。^③ 尽管态度不够真诚，但可以据此判断，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期间言论中所指的“人民”，是被疫情威胁着生命安全的美国民众和拯救病患的医护人员。对待“人民”，他主要使用“表达同情和呼吁团结”的方式。

2. 特朗普言论中的“政治精英”

^① Eladio Bobadilla, “COVID-19 and Trump’s Racist Rhetoric,” Common Dreams, <https://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20/03/19/covid-19-and-trumps-racist-rhetoric>, 访问日期：2020年4月30日。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Vice President Pence, and Members of th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in Press Briefing,”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vice-president-pence-members-coronavirus-task-force-press-briefing-25/>, 访问日期：2020年4月30日。

^③ Brian Frazer, “Trump’s Me-me-me Coronavirus Response – Broken Down Word by Word,” Front Page Live, <https://www.frontpagelive.com/2020/04/30/trumps-me-me-me-coronavirus-response-broken-down-word-by-word/>, 访问日期：2020年4月30日。

特朗普言论中被他攻击的政治精英也包括两部分，他们分别是：

其一，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总统们，特别是奥巴马总统。他将自己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治理失当归咎于前任们留给他的烂摊子，并多次将检测失败和医疗用品短缺的问题归咎于奥巴马政府，声称这些问题“已经破坏了他的政府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反应”。^①

其二，现任的美国各州州长。特朗普与多位州长的政治斗争再度加剧，新冠病毒检测率成为争论的焦点。他在检测问题上指责州长们没有能力获得本州民众需要的检测用品。在应对新冠疫情问题上，特朗普让各州承担起保障本州医疗供应和发布“居家令”的责任。由于经济受挫，美国各地“要求复工”“停止封城”的抗议此起彼伏。因此，特朗普于2020年4月17日在其推特连发三条推文，分别用全大写字母写下“解放密歇根”“解放明尼苏达”“解放弗吉尼亚”来为因对疫情“居家令”不满而上街游行呼吁“解封”的美国民众站台。这不仅因为这三个州是“摇摆州”而对特朗普寻求连任“至关重要”，也因为这三个州的州长都是民主党人。^②



扫码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免费获取完整版电子专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及应对分析*

陈本昌 崔日明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是“灰犀牛遇见黑天鹅”性质的事件，对世界各国及世界经济产生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有可能在这次疫情的冲击下终结，但会开启新一轮的“全新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的资本市场、实体经济、全球价值链会产生不同影响。各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与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战斗，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防止出现经济危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最终战胜疫情，需要世界各国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超越经济理性，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只有如此，世界经济才会避免陷入混乱局面。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经济理性；合作共赢

作者简介：陈本昌，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崔日明，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理论、国际贸易规则。（沈阳，110136）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36(2020)06-0005-18

一、引言

2020年初，一场无法预料的新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球感染人数已超过1000万，且每天还以十余万的病例增加，传染范围波及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已造成全球50多万人死亡。^①这次疫情感染人数之多、传

*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推进制度转型与促进我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关系研究”（项目编号：L14BJL016）的阶段成果。

①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疫情数据网站，<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访问日期：2020年6月30日。

播速度之快，是近百年人类社会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灾难。图 1 清晰地展示了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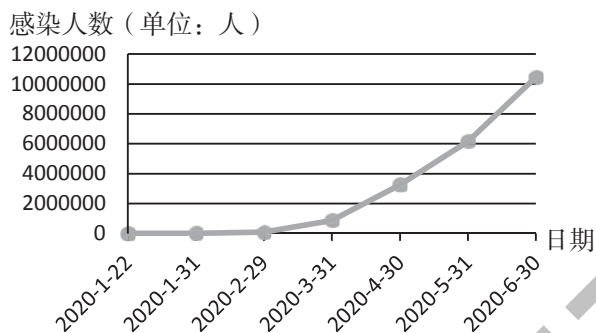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走势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疫情网站。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这场全球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影响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各国政府都在竭尽全力地应对疫情，挽救生命，努力减少疫情的危害。新冠肺炎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场疫情是目前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任何一个国家和族群都不可能置身事外。^① 要想最终战胜这场肆虐全球的疫情，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思考这一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才能对这场疫情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采取更好的应对措施。本文将从疫情发生的历史节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途径、影响阶段、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及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如何应对疫情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历史节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 2019 年末至 2020 年初，此次疫情可以定义为“灰犀牛遇上黑天鹅”性质的事件。之所以这样定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宏观层面看，这次疫情是在世界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经济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世界经济体突然遭到始料未及的巨大外部冲击；其次，从微观层面看，全球

^① 刁大明：《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迫切性》，载《光明日报》，2020 年 4 月 17 日第 02 版。

价值链在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下其稳健性遭受冲击的同时，又遭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由此必将导致世界贸易额大幅度下降，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再次，从国际经济格局及国际治理体系方面看，当前，关键国家对全球化的认知已经改变，全球化趋势出现危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很有可能使本轮全球化走向终结。

人类社会目前经历了两轮的大规模全球化。第一轮是 19 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对广大不发达国家进行武力侵略、资源掠夺而推动的全球化，以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第二轮全球化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由美国推动的新一轮全球化。这轮全球化主要由资本推动，使世界各国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条的一环，形成全球价值链。本轮全球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并推行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在制度上的障碍得以消除，世界各国纷纷加入由资本推动的全球化，分享全球资本盛宴，全球产业链在地域上已经基本囊括了所有国家，世界财富总量也在不断增加，这波全球化也到达了顶峰。然而，在这轮全球化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财富分配却是极其不平衡的：一些国家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发挥资本与市场的优势，赚得盆满钵满；而另一些国家却变得更加贫穷。因此，在全球化带来财富增长的同时，全球化的结构性矛盾也在不断加深。

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终以 2001 年的“9·11”事件爆发出来。“9·11”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或全球化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武装攻击，其后又以各种名义在世界各地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势头结束了。2008 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在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遭受了严重的冲击，许多国家多年以后仍然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各个国家对全球化的分歧逐渐加大，“去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2017 年美国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明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战略，这实际上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已经停滞。随后，美国推出的一系列单边机制和各种退群行为更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趋势。为应对美国的这种“去全球化”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与美国这种单边行为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和斗争，尽力维护这种有利于世界各国发展的多边体系，使这种既有的全球化体系得以维系。2018 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表明其“去全球化”的决心已明确，美国认为既有的多边体系使自己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美国优先”的口号指引下，

对自己主导的全球体系发起了攻击。美国这种严重的单边主义行为，使世界经济受到巨大影响，世界经济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突如其来的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伴随疫情传播的还有人们对疫情的恐惧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巨大担忧。

三、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途径

本次疫情是世界经济体系外的外生性变量。一般来讲，如果世界经济体系本身没有问题，那么，疫情传播对经济的冲击将取决于疫情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疫情结束后世界经济就会恢复正常运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而，今天的世界经济大不如前，“去全球化”势头凸显，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世界经济随时可能陷入危机之中。本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无异于雪上加霜，从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两个途径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反应最直接、最快速的表现是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冲击。当疫情只在中国发生而没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蔓延开来的时候，疫情的危害还没有被充分认识。世界各国普遍认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像其他传染病一样，很快会被中国政府控制，不会传播到其他国家。中国的股市也只是在2020年2月3日后开盘第一天出现恐慌性下跌，其后虽然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在不断上升，但从2月4日开始股市持续上涨一个多月，到3月4日一度涨到了春节前的高点，沪市达到了3074.26点，深市达到了11869.41点。欧美股市在疫情初期好像没有受到中国疫情的影响，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2020年2月12日达到了29568.57点的历史高点。当疫情在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开始蔓延时，世界各国好像才认识到这场疫情的严重性，随之而来的担忧和恐慌程度不断加深，这种担忧的影响迅速在资本市场上蔓延开来，中国上证指数从2020年3月4日的高点跌至3月19日盘中低点2646.80点，深证指数3月23日跌到9659.35点。2020年3月9日至3月18日，美国三大股指出现四次熔断，急速下跌。2020年3月2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至18213.65，40天跌幅达到38.4%。^①在美国股指下挫的带动下，其他欧洲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股市也纷纷下跌，上演了1929年以来的全球股市短时间内的最快速和最大幅度的下跌。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资本

^① 东方财富网：行情中心，2020年3月23日，<http://quote.eastmoney.com/center/>，访问日期：2020年4月1日。

市场将继续动荡。受疫情恐慌及全球停产停工需求下降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出现了断崖式下跌。2020年4月20日，布伦特原油从2020年初的每桶75美元一路下跌到每桶20美元左右的最低价格，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克萨斯轻质含硫原油5月期货合约价格最低达到-37.63美元/桶，历史上首次跌至负值区域。^①随着各国的应对疫情政策纷纷出台，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又呈现出过山车式的走势，使全球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不确定性增大，进而将使世界经济整体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图2至图4直观展示了半年来相关指数的变化及波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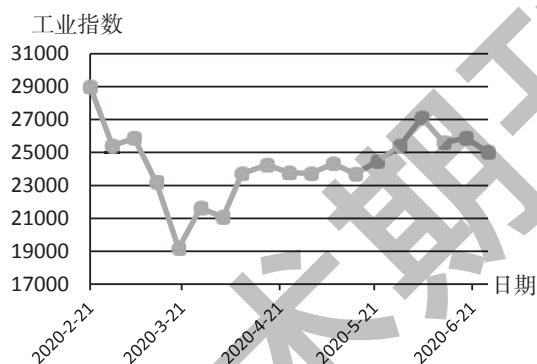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半年走势

数据来源：根据道琼斯工业指数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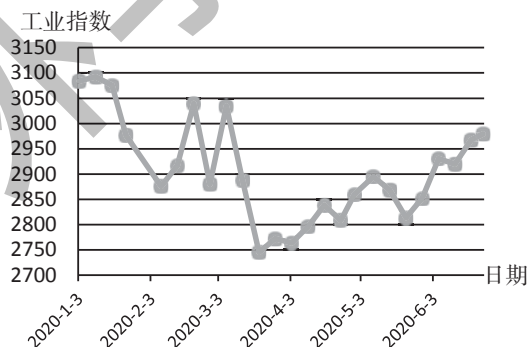


图3 上证指数半年走势

数据来源：根据上证指数整理。

^① WTRG Economics, *NYMEX Crude Oil Futures*, <http://www.wtrg.com/daily/crudeoilprice.html>, 访问日期：2020年4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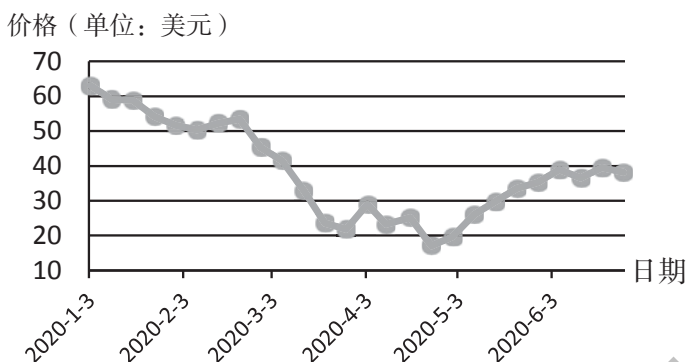


图 4 WTI 原油半年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根据纽约商品交易所数据整理。

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首先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体现出来。此次疫情的爆发适逢中国春节假期，最先产生的影响是春节的节日经济行情，这对许多服务行业的打击非常严重，对餐饮、影院、航空、运输、旅游休闲等产业的冲击是疫情从需求端冲击经济的第一波。春节假期延长，企业面临着复产复工的难题，这是疫情从供给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经过将近两个月封城的疫情“一级响应”的严格措施，中国的疫情已经基本可控，各类企业的复工复产也开始启动。然而，由于疫情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蔓延加剧，全球生产价值链被迫中断，大批外贸型企业的订单被停止或取消，很多企业又面临着“无工可复”这一严峻局面，这是疫情对需求端的第二波冲击。如果疫情能在短时间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则这种价值链中断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不会对价值链重构产生影响。然而，从目前观察到的情况看，短时间内控制疫情已不太可能，疫情很大可能将持续一到两年的时间，甚至长期伴随人类生存，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已逐渐显现。从需求方面看，价值链的下游需求减少，使企业无产品可生产；从供给方面看，价值链上端供应商的原材料和中间品不能按时供应，如此一来，即使价值链下端有需求，企业也可能由于没有充足的投入而无法满足客户的产品需求。价值链断裂带来全球订单的下降情况导致需求减少，必将使国际贸易量、贸易额双双下降。全球贸易的萎缩将使世界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进而对世界经济带来的损失将进一步扩大。近期，粮食出口国限制粮食出口的现象则有可能促使全球贸易量进一步

下降,甚至有可能引起全球粮食危机。^① 价值链断裂的另一个危害是,企业倒闭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并且这种影响进一步放大。2020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2月份为6.9%,3月份5.9%,4月份6%,^② 均高于5%左右的历年同期水平;同年,美国4月失业率为14.7%,创历史新高;5月份的失业率略有下降,为13.3%;6月份的失业率为11%,均高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高失业水平。^③ 就业的下降必然导致居民收入的减少,进而导致社会消费需求进一步降低,进而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的时间长短及严重程度决定了世界经济能否陷入衰退或萧条,并将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和未来。

四、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非理性的恐慌和假日经济停止带来的冲击,主要是对中国的冲击。随着中国国内企业的陆续复产复工,疫情在中国得到基本控制。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在中国第一季度的GDP数据中已经体现出来。2020年,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下降6.8%,第一产业下降3.2%,第二产业下降6.9%,第三产业下降5.2%。从影响经济的三大需求看,也都出现了较大的同比降幅,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12.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16.1%,货物贸易顺差达983.3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80.6%。^④ 如此严重的经济下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

第二个阶段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中期影响和疫情结束后对世界经济体系的长期影响。世界贸易组织于2020年4月8日发布的2020—2021年贸易增长预测数据

① 自2020年2月份以来,由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除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之外,大米、小麦等主粮也成为各国的战略物资,各国为了保障自身粮食安全而限制出口。据统计,截至2020年4月17日,已有俄罗斯、埃及、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泰国、柬埔寨、乌克兰等14个国家出台了限制农产品和食品出口的政策。参考搜狐新闻:《11国暂停大豆出口多国限制粮食出口,全球打响粮食保卫战》,2020年4月25日, https://www.sohu.com/a/391084605_433360, 访问日期:2020年4月30日。

② 国家统计局:《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访问日期:2020年4月30日。

③ Trading ECONOMICS, <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unemployment-rate>, July 3, 2020, 访问日期:2020年7月20日。

④ 国家统计局:《2020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算结果》,2020年4月18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7_1739602.html, 访问日期2020年4月20日。

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乐观估计,全球贸易将收缩 13%;悲观估计,将收缩 32%。乐观情况下,2020 年全球经济将收缩 2.5%,2021 年回升到 7.4%;悲观情况下,2020 年全球经济将收缩 8.8%,2021 年将恢复至 5.9%。2020 年的全球经济收缩是不可避免的。^①2020 年 4 月 13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20 年全球经济将下降 3%,比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还要严重。^②世界银行在 2020 年 6 月份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 年全球 GDP 将下降 5.2%,是几十年来程度最深的衰退。^③学者、机构及政策制定者更担心的是,全球将陷入一年以上的严重经济萧条当中。就疫情对中国的中期影响而言,中国应主要考虑疫情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冲击。随着疫情的蔓延,各国纷纷采取封城、封国的措施,全球生产价值链必将受到严重打击,所有国家的国际性生产企业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在中国表现为多数外贸型企业将会面临一段艰难的挣扎期,很多企业也有可能在这一轮的冲击下倒闭,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和重构不可避免。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如何稳住和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或者在更严峻的形势下如何在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中避免“去中国化”这一极端情况的出现,是需要中国企业面对和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影响看,本次疫情对世界经济格局乃至世界经济秩序都将带来深远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过程终结。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认为,新冠肺炎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人类历史将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节点划分为“新冠前”和“新冠后”即 B.C.(Before Corona)与 A.C.(After Corona)。^④美国著名学者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Henry A. Kissinger)认为:“当新冠病毒流行病结束时,许多国家的制度将被视为是失败的。然而,这种判断是否客观公正无关紧要。事实是,在此次疫情之后,世界将会变得不一

① WTO, *Trade Set to Plunge as COVID-19 Pandemic Upends Global Economy*,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0_e/pr855_e.htm,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10 日。

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0 年 4 月 13 日,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16 日。

③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20 年 6 月 9 日, <https://www.shihang.org/zh/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访问日期:2020 年 6 月 20 日。

④ Thomas L. Friedman, “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 and A.C. — 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7/opinion/coronavirus-trends.html>,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

样。”^①很多学者也预测疫情后发生“去全球化”的趋势。随着疫情结束，跨国公司重新调整产业链，确实会对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产生一定影响，但就此判断疫情将结束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却显得过于轻率。笔者认为，在世界经济日益紧密联系的今天，国际分工链条不会被轻易被切断，人员、商品、资本、信息的全球流动的趋势不会改变，全球化的事实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全球化的运作规则和模式，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有可能终止，而世界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趋势并不会减弱。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过是加速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调整契机的到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一定会有新的指导原则和运作模式的全新一轮全球化取代旧秩序的全球化。

五、各国应对疫情的措施



扫码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免费获取完整版电子专辑

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治理： 改革与限度

徐磊祥 许启启

内容提要：特朗普上任后对美国的生物安全治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动行政机制变革的同时，还重视发展生物科技，但在国际合作领域却“开倒车”。这些改革是对生物威胁的重点领域发生转变、生物安全治理的专业化要求等现实治理形势的回应，最终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霸主地位。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在推进生物安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生物安全治理机制运行不畅，生物安全关联产业回迁困难重重，美国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领导力下降等，这将对美国未来进一步开展生物安全治理带来挑战。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治理；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简介：徐磊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北京，100091）；许启启，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国际传播（北京，100037）。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36(2020)06-0023-12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生物安全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通过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国家生物防御战略》(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美国卫生安全国家行动计划》(U.S. Health Security National Action Plan)、《国家卫生安全战略实施计划2019—2022》(NHSS IP 2019—2022)、《全球卫生安全战略》(Global Health Security Strategy)等一系列战略文件、政策法规和行政命令，特朗普政府重塑了美国的生物安全治理框架。美国作为较早开展生物安全治理的国家，研究其生物安全政策的调整和执行不仅有利于掌握其工作重心、了解其政策导向、检查其政策效用，更对中国推进自身的生物安全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将梳理特朗普政府在生物安全治理方面的改革举措，剖析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治理改革的动因，并根据其生

物安全发展现状指出特朗普政府在生物安全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

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治理改革

进入 21 世纪，生物安全治理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确立了新世纪美国生物安全治理的初步框架。特朗普政府着手美国生物安全治理改革，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还推动多个方面的政策调整与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幅改革行政机制

特朗普上任之初，美国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行政体系还是沿用小布什政府时期构建的行政架构。在小布什政府时期，2004 年发布的《21 世纪生物防御》对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行政机构进行了整合。在国内，“国土安全部部长是负责国内事件管理的主要联邦官员，负责协调国内的联邦行动……国土安全部部长视情况与其他联邦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进行协调，以便有效地完成这项任务。”^①在国外，“国务卿是负责美国境外发生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的主要联邦官员，包括美国对国外事件的结果管理和支持，并视情况与其他联邦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进行协调，以便有效地完成这一使命。”^②这种行政体制一直沿袭至特朗普政府时期。

特朗普执政后，开始谋划对这一存在了 10 多年的生物安全治理机制进行改革。2018 年 9 月，特朗普政府正式出台《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公布了对生物安全治理机制改革的方案。根据《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规定，原先由国土安全部牵头的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架构，改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负责。这不是简单的负责部门的更换，而是整个生物安全治理体制的变革。治理体制由原先的松散变得更加集中，变得更加专业化。

《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要求成立生物防御委员会，建立专门的应对生物威胁的行政体制。在总统层面，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则作为政策协调和审查的牵头人，

① George W. Bush White House, “Biodefense for the 21st Century,” April 20, 2004,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homeland/20040430.html>, 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3 日。

② Ibid.

对联邦政府的生物防御工作提供战略投入和政策监督。^①在联邦政府层面，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由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担任主席，牵头整个战略的实施，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农业部长、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和环境保护局长负责监督、协调及执行，并确保与国内和其他国家政府及非政府合作伙伴进行协调。^②特朗普对生物安全治理行政体制的改革，标志着美国生物安全治理机制趋向于协调治理、专业治理。

（二）重视发展生物科技

特朗普政府将发展生物科技看作其生物安全治理的重要技术支撑。《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强调，必须依靠充满活力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体系，从源头上检测和遏制生物威胁，支持生物医学创新，改善应急响应，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威胁风险。因此，特朗普政府十分重视对生物科技创新发展的支持，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强化生物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2月发表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明确了政府对生物科技创新发展的支持。该报告指出：“美国将通过加强生物医学产业基础的知识产权体系，保护和支持生物医学创新的发展。”^③特朗普政府对科技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体现在国内的政策上，而且更加体现在国际政策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美国收紧国外资本对包括国内生物科技公司在内的科技公司的收购、并购政策。

第二，给予官方的研究机构财政预算支持。在生物科技研究领域，官方的研究机构主要有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下辖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国立卫生研究院主要致力于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研发和资助相关个人及企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特朗普执政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 September 18,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09/National-Biodefense-Strategy.pdf>, 访问日期：2020年2月13日。

^② Ibid.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访问日期：2020年2月13日。

以来三年的财政预算虽然出现逐年递减之势，但每年的总额仍高达数十亿美元，具体为：2018 年为 76.25 亿美元，2019 年为 72.83 亿美元，2020 年为 65.94 亿美元。^① 在 2020 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财务预算中，预防传染病传染的预算为 25.57 亿美元，占总预算的 38.78%，这是所有项目中占比最高的预算。^②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特朗普执政三年的财政预算则高达数百亿美元，2018 年为 338.32 亿美元，2019 年为 348.83 亿美元，2020 年为 362.43 亿美元。^③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于 2014 年成立了专门致力于生命科学研究与投资的生物技术办公室，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近三年内用于生物科学研究的预算分别为：2018 年为 2.96 亿美元，2019 年为 3.44 亿美元，2020 年为 3.56 亿美元。这些预算所占比重都超过了当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总预算的 10%。^④

第三，给生物科技领域的企业减免税收。特朗普政府延续了往届政府对生物科技公司的研发税收抵扣政策，同时，特朗普在上任第一年就推动国会通过了《减税和就业法案》，这一法案不仅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而且有利于减轻企业成本压力。该法案允许企业立即注销资本投资，使企业可以在自己的运营中进行更多的投资。^⑤ 这同样有利于生物科技企业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的投资与发展。

（三）持续背离国际合作

生物威胁无国界的特点必然要求每个国家在生物安全治理中加强国际合作，美国也不例外。虽然特朗普政府在诸多文件中提及国际合作，但实际上却采取了背离国际合作的生物安全治理政策。

①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Budget Request Overview,” <https://www.cdc.gov/budget/documents/fy2020/cdc-overview-factsheet.pdf>, 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3 日。

② Ibid.

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he NIH Almanac,” March 4, 2020, <https://www.nih.gov/about-nih/what-we-do/nih-almanac/appropriations-section-1>, 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30 日。

④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epartment of Defense Fiscal Year (FY) 2020 Budget Estimates,” March 2019, https://www.darpa.mil/attachments/DARPA_FY20_Presidents_Budget_Request.pdf, 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30 日。

⑤ The White House, “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 is Generating An Economic Resurgence i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April 4,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tax-cuts-jobs-act-generating-economic-resurgence-communities-across-country/>, 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30 日。

第一，逐渐弱化奥巴马时期的生物安全国际合作措施。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推动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但特朗普执政后逐渐弱化甚至取消前任政府的国际合作举措。^①例如，特朗普政府没有将奥巴马政府重点推进的全球卫生安全议程（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列入《国家生物防御战略》。

第二，背弃盟友，单独采取措施应对生物安全事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与其盟友共同应对，而是采取单边主义措施。例如，在没有与其西方盟友沟通协商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单独宣布了针对盟友的旅行禁令。此外，特朗普政府不仅不与盟友开展合作，还与盟友在防疫物资供给方面展开争夺，频繁曝出美国截取盟友防疫物资的新闻。

第三，削弱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重要平台，在应对全球生物安全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朗普政府不仅不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常运作，还在背后诋毁和削弱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政府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应对不力，宣布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支持，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二、特朗普政府改革生物安全治理的动因

特朗普政府推动美国生物安全治理改革有多方面动因，其是对生物威胁的重点领域发生转变、生物安全治理的专业化要求等治理形势的回应，最终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霸主地位。

（一）生物威胁的重点领域发生转变

在特朗普执政前后，美国所面临的生物威胁已经开始出现不同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转变。首先，生物威胁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挑战。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政府认为：“生物事件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死亡。针对美国本土的生物威胁——无论是蓄意袭击、意外事故，还是自然暴发——正在不

^① 韩召颖、黄钊龙：《“特朗普主义”：内涵、缘起与评价》，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4期，第3—18页。

断增加。”^① 在《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中，特朗普政府认为“生物威胁是美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威胁”，“管理生物事件的风险是美国的核心利益”。^② 这说明特朗普政府认为，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因此必须改革应对生物威胁事件的生物安全治理机制。

其次，生物威胁的重心发生变化。小布什政府时期发布的《21 世纪的生物防御》报告（Biodefense for the 21st Century）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应对生物威胁的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Biological Threats）均指出，生物威胁的重心是防范恐怖组织或敌对势力，获得生物技术并研发生物化学武器，发动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但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这一重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认为，虽然美国仍然面临生化恐怖袭击的风险，但生物威胁的重心已经从生化恐怖袭击扩大到疾病的暴发、生物科技的不当使用和生物实验室的管理漏洞。“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美国必须准备好应对自然疾病暴发、高致病性病原体事故或企图使用生物制剂的对手所带来的风险。”^③

再次，生物威胁的覆盖面空前扩大。如果说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生物威胁的重点对象是高价值的目标或重要的人群。那么到了特朗普时期，生物威胁的对象已经扩展到全社会。生物威胁不仅仅威胁到每个美国公民的健康和安全，还会威胁到美国引以为傲的美国生活方式，对美国的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秩序也产生了威胁。可以说，生物威胁覆盖了美国社会的角角落落。面对这种情况，特朗普政府在生物安全治理的领域推动改革成为必然。

（二）生物安全治理的专业化要求提高

进入 21 世纪以来，生物威胁事件尤其是重大传染性疾病频发。这些重大传染病呈现出传染性强、致死率高的特征。2002 年暴发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涉及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8000 多人被感染，916 人死亡，致死率超过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3 日。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 September 18,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09/National-Biodefense-Strategy.pdf>, 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3 日。

③ Ibid.

10%。^① 2007 年以来，寨卡病毒 (Zika virus) 发生多次大传染，涉及 87 个国家和地区。^② 在非洲佛得角的一个国家中，2015—2016 年期间被报告的寨卡病毒疑似病例就多达 7580 例。^③ 2012 年出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扩散到 27 个国家，患者的死亡率约为 35%。^④ 埃博拉病毒 (Ebola virus) 在 2014—2016 年大暴发，这次暴发的重灾区集中在非洲，其中塞拉利昂确诊病例 14124 例，死亡 3956 人，致死率为 28%；利比里亚确诊病例 10675 例，死亡 4809 人，致死率为 45%；几内亚确诊病例 3811 例，死亡 2543 人，致死率为 67%。^⑤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埃博拉病毒的平均致死率高达 50%。这几种传染性疾病都在美国本土出现。应对如此频繁暴发的高致死率的传染性疾病，客观上要求更加专业的机构来统筹应对。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统筹生物安全治理的是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部并没有掌握疾病防治的专业知识，而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在这个领域更为专业，其下属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更是美国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研究领域的顶级机构。当重大传染性疾​​病成为生物威胁的重要内容时，由国土安全部牵头的生物安全治理机制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生物安全保障的要求。由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统筹相关部门开展生物安全治理更符合美国生物安全的实际。正如时任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在《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为什么不是国土安全部而是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牵头生物防御”的问题时所指出，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生物威胁（包括流行病威胁，而不仅仅是生物武器攻击），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在这方面拥有绝大多数的科学和技术专长，因此，我们

①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ummary Table of SARS Cases by Country,” August 2003, https://www.who.int/csr/sars/country/country2003_08_15.pdf?ua=1,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②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with Current or Previous Zika Virus Transmission,” July 2019,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zika/countries-with-zika-and-vectors-table.pdf?ua=1>,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③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Zika Epidemiology Update,” July 2019,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zika/zika-epidemiology-update-july-2019.pdf>,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④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arch 11, 2019, [https://www.who.int/en/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iddle-east-respiratory-syndrome-coronavirus-\(mers-cov\)](https://www.who.int/en/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iddle-east-respiratory-syndrome-coronavirus-(mers-cov)),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⑤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bola Virus Disease,” February 10, 2020,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ebola-virus-disease>,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可以想到的每一个选择都指向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门。^①

（三）维护美国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霸主地位

美国将自己视为全球秩序的领导者，并致力于维护其全球领导者的地位。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要重回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美国要“为美国人民和世界谋求更加美好的未来”。^②在这一逻辑下，美国将自己视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领导者。在 2019 年白宫《新闻秘书关于全球卫生安全议程的声明》中，特朗普政府明确表明“美国政府仍然是《全球卫生安全议程》的坚定支持者，并且是促进健康安全的领导者”。^③同时，美国还将自己视为全球生物技术的领导者。美国全球霸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领先的科技，为了维护持续的霸主地位，必然要确保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因此，特朗普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在其执政不久就成立了一系列的机构专注科技创新，如：2017 年 3 月，成立美国创新白宫办公室；2017 年 6 月，成立美国技术委员会等。特朗普在与美国技术委员会圆桌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美国应成为生物技术的全球领导者”。^④在 2017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表明了对生物技术发展的重视，并且着重提出要通过支持生物医学创新来应对生物威胁。在《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中，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明确美国在生物科技中的领导地位，认为“生命科学的持续研究和开发对美国人民更加光明的未来至关重要”。^⑤在这种战略思维下，美国强化对生物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支持成为必然。

① The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on the 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 September 18,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s-briefing-national-biodefense-strategy-091818/>, 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8,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3 日。

③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from the Press Secretary on the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November 25,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s-secretary-global-health-security-agenda-2/>,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④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During Roundtable with the American Technology Council,” June 19,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roundtable-american-technology-council/>, 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7 日。

⑤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 September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09/National-Biodefense-Strategy.pdf>, 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3 日。

三、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使美国不能置身事外。美国一步步沦为疫情重灾区，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在生物安全治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对特朗普政府后续的生物安全治理带来了挑战。

（一）生物安全治理机制运行不畅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到了美国全境。2020年3月中旬，美国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纽约市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等美国领地均报告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①与此同时，美国感染人数快速增长，成为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死亡率也居高不下。在及时得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仍然没能迅速做好防御措施，没能阻止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大暴发，这表明美国的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存在巨大的漏洞。



扫码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免费获取完整版电子专辑

美、意、韩三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模式差异探析——基于国家自主性视角*

于少龙

内容提要：美国、意大利、韩国虽然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面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时，这三个国家的政府发挥的作用却不一样，取得的抗疫结果也大不一样。本文拟运用国家自主性理论来透视这一问题。国家自主性理论有其演进脉络，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国家中心学说视角下的相对自主性理论与当前的国家主义复潮趋势相近，但也存在时代背景不同的差异。在综合分析各国抗疫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背景，通过反思斯考切波理论观点，本文分析了影响国家自主性的三个显性因素，即国内阶级状况、国家传统与价值观。在各国政制普遍存在张力的情况下，不同的阶级力量、国家追求与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自主性程度。

关键词：新冠肺炎；国家自主性；国家中心说；比较政治

作者简介：于少龙，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9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北京，100089）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36(2020)06-0035-15

随着时代的推进，国家自主性理论也经历了从社会中心主义向国家中心主义的转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国家主义也曾一度委顿。^①至 2016 年，英国开启脱欧运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推行“国家至上”治国理念，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中心学说复潮明显。这与西达·斯考切波所提倡的国家中心学说视角下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念相似。本文拟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分析美、意、韩三国在 2020 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不同抗疫模式，归纳出影响这三国在抗疫问题上国家自主性差异的成因。

*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新冠疫情”研究专项项目“重大突发事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SYL2020ZX02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任剑涛：《找回国家：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凯旋》，载《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3 期，第 27 页。

一、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脉络及斯考切波的观点

“国家自主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中一个解释力很强的学术概念和国家理论。关于这一理论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马克思在深刻阐述其工具性国家理论时,也开始了对国家自主性的观察,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先驱;以普朗查斯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自主性理论进行了拓展;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自主性理论,其代表人物是斯考切波。

(一) 马克思、恩格斯与国家自主性理论

通过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观察与思索,马克思注意到:在历史与现实中,国家作为凌驾于市民社会与生产关系之上的力量并未完全表现出工具性的特征,有时甚至不顾统治阶级的诉求而采取行动,这就是国家自主性的现象。^①虽然马克思注意到了国家自主性的这种现实状况,但他论述的重点还是工具性国家理论,并且仅仅将国家自主性的表现视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比较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性国家理论兼具规范性与经验性,而其对自主性国家的认识仅是一种经验性观察。^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相较于社会的自主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强大的法国行政权积蓄了国家自主性能量;第二,阶级斗争为国家赢得自主性创造了条件。^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法国历史上这种由于阶级制衡而形成的国家短时期内的自主性现象称为“波拿巴主义”。

(二) 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推进

随着时代变化,以普朗查斯和拉尔夫·米利本德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明显感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变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并继而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做了新的理论探讨,而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论述就是这些成果的一部分。

① 杨光斌:《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

② 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的经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四期,第31—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一卷,第4页。

普朗查斯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独立于社会统治阶级的自主性。^①正如普朗查斯所言：“我的意思是指国家在阶级斗争领域的相对自主性，特别是起针对权力集团的阶级和派别的相对自主性，并扩大到针对权力集团的同盟和支持力量的相对自主性。”^②与普朗查斯相同，尽管米利本德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性国家理论，但他同时认为简单的工具论“不是一个对现实做了完美解释的绝妙的论述”。^③米利本德认为：“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并不减少它的阶级性质，相反，它的相对独立性使国家有可能以适应灵活的方式行使阶级的任务。”^④另一方面，米利本德还认为，不同形式的国家具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其程度与代议机构对行政权力的制约能力和压力集团的活跃程度有直接关系。^⑤可见，普朗查斯与米利本德分别是结构主义和代理人角度理解国家相对自主性的。

尽管普朗查斯和米利本德从不同视角出发阐述了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但是二者的理论仍未脱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中心主义的基本范式，这就为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三）回归国家中心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理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中心主义出现复兴，斯考切波就是这个时期国家回归学派的杰出代表。她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在回归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国家的自主性。斯考切波认为，必须将国家视为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主体才能理解政治危机的爆发和革命过程。^⑥总之，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国家回归学派，突破了社会中心主义的传统认知路径，重新确立了理论分析中国家的中心位置。因此，回归国家学派的自主性理论最核心的思想是将国家视为真正具有自我利益和潜在自主性的国家，尽管实际的自主性程度会因其具体情况而千差万别。^⑦

斯考切波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观点可概括如下：国家的本质是一种具有自身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一卷，第148页。

② [希腊] 尼克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利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转引自杨光斌：《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③ [英] 米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2页。

④ 同上第95页。

⑤ 杨光斌：《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

⑥ [美]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

⑦ 杨光斌：《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行逻辑和利益的自主结构，不一定与社会中的统治阶级融为一体，也不必然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自主性主要体现在，摆脱了支配阶级的直接控制；国家自主性的制约内部来自社会的阶级结构，外部来自各国的实际地位。^①

本文认为，在当前国家主义复潮明显的大趋势下，通过斯考切波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分析视角来探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各国政府抗疫模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二、美、意、韩三国抗疫模式差异

美国、意大利、韩国分别位于三个不同的大洲，但均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的大流行，不同国家政府在抗疫中发挥的作用差异明显，阶段性的抗疫结果也截然不同。从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国家中心学说视角下的国家自主性观点出发，根据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可将抗疫模式分为三种：美国的“弱国家”模式，韩国的“强国家模式”与意大利的“温和国家模式”。^②

（一）美国的“弱国家模式”

整体而言，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比较消极。由于主客观原因，美国政府本质上实施了“不抵抗”政策，这也致使美国成为全球感染新冠肺炎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回顾美国政府的抗疫过程，从早期的不重视，如特朗普所言“新冠肺炎就像普通的流行性感冒”，^③致使其错过了防疫的最佳时期，到美国的50个州全部因新冠疫情进入“重大灾难”状态。美国国内因政党分裂、联邦政府的限权与扩权之争等，各州和城市对疫情的控制始终是政令不一，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战略来遏制疫情并重振经济。^④在如此紧迫的国家形势面前，美国的政客们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如何防疫、抗疫之上，而是一味地甩锅、卸责。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却引发了一波波结构

① [美]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② 介于强国家和弱国家之间的模式。

③ 当时英国也流有“全民免疫”的说法。

④ 魏南枝：《美国抗疫不力的政治制度症结》，载《光明日报》，2020年6月19日第2版。

性的骚乱，美国的社会秩序遭到了重创。总之，美国国家整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本次抗疫问题上受到了挑战，美国在国家自主性上的“弱国家属性”表露无疑，尽管瘟疫蔓延不符合国内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但国家仍然难有作为。

究其原因，美国国家在抗疫自主性上的软弱具有深刻的历史根基与现实因素。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看，美国属于英国式的自下而上由社会力量推动的现代化，是历史自然发展的进程。^①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力量远远大于国家的力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美国国家形成了一种“强社会，弱国家”的力量格局。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是一个总统制共和制的联邦主义国家，实行分权制衡与两党制。美国的政治比较理性与成熟，但缺乏必要的弹性与应变机制。例如，美国宪法赋予了国民间接选举国家总统的权力，但并未赋予国民罢免总统的机制，这就使美国总统在行使职权时的随意性比较强，受到的制约比较少。尽管存在议会的弹劾机制，但总统的权力并非来自议会，总统可选择的空间很大。因此，美国总统治国的个人特征很明显。由于联邦制与分权制衡的存在，其凝聚力也就比较弱，国家相对缺乏统一的意志，并因此致使国家的自主性比较弱。从外部看，美国在世界超级大国中的国际地位也使其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客们在抗疫中萌生了一种相较其他国家的傲慢和优越心理，因此从开始时就轻视了新冠肺炎的危害性。

（二）韩国的“强国家模式”

与美国国家在抗疫中所表现出的“弱国家”模式不同，韩国国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强的自主性，并曾一度被视为发达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典范。回顾韩国的抗疫历程，自2020年1月20日发现首个确诊病例始，韩国政府便开始采取了多项严防措施，如：对机场等地严格筛查，限制疫情严重地区旅客入境，并在国内诸多地区配备消毒液、普及新冠肺炎信息等；2020年2月份韩国疫情出现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多项法律法规，调集全国资源集中抗疫，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可行性措施。随着疫情的扩散，韩国政府也不断提高国家预警级别。2020年2月23日，文在寅总统将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预警

^① 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

级别上调至最高“严重”级别,^①紧接着韩国成立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出台了一系列更加严格和具体的防疫措施。^②在此举措下,韩国成功地遏制了疫情在国内大规模地扩散,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胜利。总之,自始至终,韩国的抗疫举措都是在国家政府的统一意志下进行的,中央政府发挥了核心作用。

为什么韩国能够充分发挥国家的自主性,实现积极有效抗疫的结果?本文以为这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威权主义的政治传统;二是国民所具有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韩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威权主义性质的政府起了关键性作用,这种国家的强大力量已经成为韩国历史的传统,并进而成为推动后继事件作用方向的惯性。韩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就是这样一种“强国家”模式的典型体现。从另一方面来看,韩国位于东亚地区,在历史上深受中华文化圈的影响,这使其国民价值观层面具有集体主义的倾向,对国家和政府所采取的抗疫政策持认可与配合态度,而这与以美国国民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价值取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 意大利的“温和国家模式”

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作为欧洲国家的意大利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抗疫举措。例如,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于2020年3月9日宣布,将整个意大利列为“红色警戒区域”,并运用军队力量实行全国戒严管理。意大利也成为历史上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举国封城的首个国家。可以说,意大利采取了欧洲国家最为严厉的管控措施包括:禁止公共集会,暂停各种赛事,关闭全国各种娱乐场所,禁止举行任何仪式和活动,港口禁止邮轮停靠,各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等。尽管意大利的抗疫看起来非常严苛,但实际执行却充满了弹性。公民的各种活动并未受到实质性的限制,意大利的管控措施漏洞较多,其抗疫的总体结果也不尽理想,并曾一度成为全球蔓延最快的国家。总之,意大利的抗疫模式可以概括为国家试图强力作为,与实际操作懈怠之间的一种妥协模式,可以称之为“温和的国家模式”。本文认为,意大利这种“温和抗疫模式”的成因还是基于意大利自身阶级力量的政治体制因素,以及基于公民自律的封城管控措施。

① 这是韩国自2009年以来第二次发布最高级别的预警。

② 这些措施有:严格管理入境人员,取消大型公共集会,关闭图书馆、教堂之类公共聚集场所,建议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各类学校延迟开学或通过网络授课等。

三、抗疫模式中国家自主性差异成因

结合斯考切波制约国家自主性的两方面因素，可将美国、意大利与韩国三国社会阶级结构与国家实际国际地位与其抗疫自主性的关系列表如下（见表1）。经过分析对比我们发现，从斯考切波制约国家自主性两个因素（社会的阶级结构与实际地位）出发，可以看到国家抗疫自主性与国内中产阶级的比例成反比，与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有一定的负相关性。但本文认为，要分析这三国抗疫过程中真正影响国家自主性的因素，除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差别和国家的国际地位外两方面的影响外，还必须考察路径依赖（即国家自主性惯性因素）与国民的价值取向。

表1 美、意、韩三国国家抗疫自主性对比表

国家	国家中产阶级比例	国际地位	国家抗疫自主性程度
美国	82.3%	超级大国	弱
意大利	79.6%	中等国家	中
韩国	65.7%	中等国家	强



扫码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免费获取完整版电子专辑

新冠疫情跨国扩散背景下的西方对华污名化^{*}

曾向红 李琳琳

【内容提要】 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以来，西方借机对华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污名化浪潮。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多点暴发，对华污名化经历了从道德性指责到政治性攻击的演进历程，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动机政治化、内容复杂化等特征。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借助文化霸权和话语权力，妄图通过对华污名化将中国塑造为疫情的“罪魁祸首”，以此争取国内外支持，达到对华打压与遏制的政治目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面前，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运动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世界各地的亚裔成为种族主义者的攻击对象；中美两国关系愈加趋向紧张；中国的外交处境更加艰难。对此，中国应从污名生成的机制入手，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应对舆论危机的能力与韧性，在去污名化过程中做到有情、有理、有力、有节，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与人文关怀。

【关键词】 新冠疫情；污名与污名化；西方对华舆论；国际舆论环境；应对策略

【作者简介】 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琳琳，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兰州 邮编：730000）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20.05.007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20）05-0117-19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颜色革命’的发生、扩散与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19BGJ051）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2019jbkyjd005、2020jbkyjc001、2020jbkyjd003、2020jbkyxs017）的资助。

在国际关系中,污名(stigma)是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而污名化(stigmatization)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有目的、有意识地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的歧视或贬损。污名客体被污名所建构的动态过程需要经历污名萌生、污名发展和污名扩散三个阶段,其中群体焦虑、歪曲认知与话语架构则分别构成了上述三个阶段的关键力量。^①

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暴发后,以远远超出人们预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扩散,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020年7月17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确诊逾1380万例。^②在世界各国理应团结一心、同力抗疫的关键时刻,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借机发起了多轮猛烈的舆论攻势,不断炮制谣言、散播恐惧,大肆对中国进行污名化,以抹黑中国。由于污名化与单纯的辱骂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施加污名带来的贬抑和侮辱往往会通过激发想象和演绎意义将某种意向和隐喻暗含在内。因此,污名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地附着于污名客体,凸显为某种身份特征,并在后续的交往互动中成为污名主体对其进行谴责和排斥所借助的手段,这对污名客体而言,无疑是一种“持久的困境”。^③

正因如此,这场大规模传染性流行疾病已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成为一个道德事件、政治事件。那么,新冠疫情这样一场全球性灾难,是如何一步步与中国相联系,进而转变为部分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道德评判和政治态度的?哪些主体参与了这一过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轮对华污名化较之以往呈现出什么新的特点和趋势,会产生哪些消极影响?作为率先取得抗疫重大战略成果的中国,面对他国的污名化应该采取何种有效策略审慎应对,最大限度地化解舆论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护好我国的国际形象?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一、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对华污名化的演进与表现

自新冠疫情率先在中国武汉暴发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① 可参见曾向红、李琳琳:《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3期,第78—111页。

② “COVID-19 Map,” John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July 17, 2017,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③ Bruce G. Link and Jo C. Phelan, “Conceptualizing Stigm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7, No.1, 2001, p.379.

的命运与共和真挚关怀，与此同时，也不乏充斥着傲慢和偏见的种种污名化言论。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的污名化非但没有随着中国疫情逐渐趋缓而自然消失，反倒愈演愈烈，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在全民抗疫的过程中，中国不仅需要忍受疫情本身带来的惨重经济和社会代价，而且更得承受国际社会加诸疫情之上的舆论重压。纵观此轮对华污名化的发展态势，可以发现，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对华污名化有着边界较为清晰的两个阶段。如果说初期即疫情集中在中国暴发期间的对华污名化是部分西方国家反华势力基于疾病认知的“隔岸观火式幸灾乐祸”，是西方对华优越感的产物，那么疫情向全球范围内扩散期间的对华污名化则是部分西方国家面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和转移国内矛盾的“手足无措式以邻为壑”，是冷战思维下疫情政治化的表现。

（一）疫情集中在中国暴发期间的道德性指责

从2019年12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出现，到2020年2月25日中国境外报告的新增病例数首次超过中国的新增病例数为止，^①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暴发。在此期间，由于其他国家尚未感受到新冠疫情对自身潜在的切实威胁，作为疫情旁观者，部分西方国家反华势力对华污名化的话语，多表现为疾病本身衍生而来的对华固有偏见，污名化的心理动因则主要在于通过比较提升自尊，^②以彰显西方文明优越感。

疫情在中国暴发之初，西方媒体对“新冠肺炎和中国”这一想象性关联的话语架构便开始显现，随着中国疫情形势愈加严峻，疾病被塑造为“中国”和“中国人”相关其他特征的象征。例如，疫情发生后，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谴责“中国人生食蝙蝠而染上新冠病毒”；^③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刊发美国巴德学院教授撰写的评论文章，诋毁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文章加上了《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这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标题；^④法国报纸《皮卡尔信使报》在其头版

① “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ission Briefing on COVID-19-26 February 202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ebruary 25, 2020,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ission-briefing-on-covid-19---26-february-2020>.

② Thomas A. Wills, “Downward Comparison Principles in Soci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90, No.2, 1981, pp.245-271.

③ Justin Baragona, “Fox News Host Claims Chinese People Eating ‘Raw Bats’ to Blame for Coronavirus,” *Daily Beast*, March 2, 2020,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fox-news-host-jesse-watters-claims-chinese-people-eating-raw-bats-to-blame-for-coronavirus?ref=scroll>.

④ Walter Russell Mead,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4,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

刊登了一张中国妇女带着口罩的照片,并配以极其醒目的“黄色警戒”(法语“Alerte Jaune”,意为“Yellow Alert”)文字,隐含之意是所有亚洲人都是该病毒的携带者;^①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副编辑在其推特发布了报刊内页,其中刊登了一张红色口罩的图片,上面写着“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和故意拼写错误的“混乱”(Pandamonium,“panda”熊猫一词意指中国);^②英国《金融时报》则刊文声称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严重不足,断言新冠疫情如不能被快速防控,届时将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chernobyl moment),暗讽疫情之于中国如同切尔诺贝利事件之于苏联,一旦处理不当便会成为压垮中国的危机。^③

分析上述内容可以发现,这些文字和图片侧重于阐释种族和新冠肺炎的病因、传播与防控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对患病群体进行污名化,既是“健康群体”排解未知疾病唤起的内心恐惧的一种方式,也是其对患病群体施以道德惩戒并与之完成心理隔离的话语表现。在“我们”(未受感染的人)和“他们”(受感染的人)之间进行精神区分是“健康群体”获得安全感的重要途径。诚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描绘的:“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④既有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是通过蝙蝠这一中间宿主传染给人类的,^⑤这一判断给部分持“中国人食用野生动物而感染新冠肺炎”论调的群体可乘之机。心理层面的恐惧感与置身事外的安全感相互交织,为其批判和指责中国奠定了情感基础。^⑥在他们看来,新冠病毒作为通过野生动物进行传播的病毒,必定是经常食用野生动物的人更容易感染,而且这种不幸应该被视为上天对其行为的惩罚。于是,随着疫情进一步发展,对华污名化的话语架构加入了更多道德评判的意味,这些描述所引发的下意识联想又进一步强化了疾病与对

① Vincent Coste and Sandrine Amiel, “Coronavirus: France Faces ‘Epidemic’ of Anti-Asian Racism,” *Euronews*, March 2, 2020, <https://www.euronews.com/2020/02/03/coronavirus-france-faces-epidemic-of-anti-asian-racism>.

② “Corona Chaos,” *Herald Sun*, January 29, 2020, <https://twitter.com/ctinks/status/1222106794199117824>.

③ Jamil Anderlini, “Xi Jinping Faces China’s Chernobyl Moment,”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0,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6f7fdbae-4b3b-11ea-95a0-43d18ec715f5>.

④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⑤ Roujian Lu, et al., “Genomic Characterisation and Epidemiology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mplications for Virus Origins and Receptor Binding,” *The Lancet*, Vol.395, No.10224, 2020, pp.565-574.

⑥ Jost John T. and Mahzarin R. Banaji,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System-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sciousn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33, No.1, 1994, pp.1-87.

华固有偏见之间的关联。正因如此，中国因为新冠疫情成为道德层面的“传染者”与被排斥的他者，并诱发了部分西方国家的对华污名化。

（二）疫情向全球范围内扩散期间的政治性攻击

疫情发生后，中国启动了全面的社会管控措施，有力地遏制了新冠疫情扩散的速度与规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武汉在2020年1月23日实施的管控举措大加赞赏，并表示：“中方行动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①得益于此，中国境内湖北以外的新增感染人数自“封城”一个月后一直稳步下降，自2月21日起，多省份陆续下调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2月25日，中国境外报告的新增病例数首次超过中国境内，这意味着中国大规模的防控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境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应对疫情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在此期间，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一再敦促世界各国采取必要措施，并于当地时间2月28日将疫情全球风险级别调至“非常高”。^②但遗憾的是，这一举措似乎并未为世界各国敲响警钟，多国在疫情开始时，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减缓疫情的暴发速度。随着意大利、伊朗、韩国等多地确诊病例激增，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1日宣布新冠疫情的传播速度和严重程度从特征上已可称为“大流行”。^③

上述时间线表明，自2月26日起，新冠疫情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从疫情的发展态势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除中国初步控制住了疫情外，大部分国家防疫形势仍然严峻，美国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在欧洲，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死亡人数也均已破万。随着疫情演变为一场全球性危机，以往疫情的旁观者成为了亲历者，与这种身份变化相伴的，是西方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话语发生了急剧转变：对中国的指责不再局限于疾病本身引发的道德评判，而是转向富有极强政治内涵的舆论攻击。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为避免不当命名引发的疾病污名化，于2月11日将新冠

^① Stuart Lau, “Coronavirus: WHO Head Stands by his Praise for China and Xi Jinping on Response to Outbrea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3, 2020,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cience/article/3050351/coronavirus-who-head-stands-his-praise-china-and-xi-jinpin>.

^② “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VID-19-28 February 2020,” February 28, 2020,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28-february-2020>.

^③ “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VID-19-11 March 2020,” March 11, 2020,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11-march-2020>.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并告诫全球“污名化比病毒本身更危险”。^①某些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和政客依旧对此置若罔闻，频频使用带有地域指向的污名化用语，调查显示，“中国病毒19”这一用语曾一度进入推特热搜话题榜单。^②除此之外，西方舆论还炮制各种谣言混淆是非，先后抛出了“新冠病毒系武汉病毒研究所制造”的“中国制造论”；“中国政府故意隐瞒疫情信息和数据延误他国防疫行动”的“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就疫情扩散而道歉并提议向中国索取巨额赔偿”的“中国赔偿论”等荒谬论调。不难发现，这些指责中，关于“邪恶中国”的强烈关切是首要的，而关于新冠疫情本身的真实威胁则位居其次。

究其原因，西方掀起的新一波污名化浪潮有着相当坚实的情感基础和现实考虑。一方面，西方在抗疫成效上与中国展现的巨大差距激化了其长久积累的对华焦虑情绪，不仅暴露了其在药品、医疗技术和其他产品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更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处理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的优越性，唤起了西方国家面对中国迅速崛起带来地区格局变动的恐惧感。另一方面，随着一些国家疫情形势恶化，个人防护用品的短缺以及社会急刹车式停摆造成的经济萎缩使不少民众难以维持生计，政府有限的检测能力和不断扩大的确诊人数难掩逐渐焦虑的社会氛围。在此背景下，转嫁疫情引发的国内矛盾、动员国内政治支持的需要，也构成了部分国家强化对华强硬态度的首要政治考量。正因为如此，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些国家纷纷将矛头对准中国，不断歪曲事实，将种种污名加诸中国之上。发达的社交网络扩大了意见和观点的数量及传播速度，大量的观点和意见增加了公众从中辨别事实的难度，^③伴随着无限放大的社会情绪，一些不那么有科学意识的、或处于极端民族主义意识状态下的群体便把这些错误认知加以吸收，从而加深了对中国的偏见，这在客观上为部分国家煽动焦虑情绪，误解、过度诠释中国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操纵社会舆论向中国施加污名提供了一定便利。

① “WHO Press Conference on COVID-19,” March 2, 2020,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transcripts/who-audio-emergencies-coronavirus-press-conference-final-02mar2020.pdf?sfvrsn=cf76053d_2.

② “Trendinalia USA,” March 10, 2020, <http://www.trendinalia.com/twitter-trending-topics/usa/usa-200310.html>.

③ 欧亚、吉培坤：《“后真相”与“假信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的新动向》，《国际论坛》2019年第6期，第115页。

二、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对华污名化的特点

事实上，对华污名化并非是近来才有的新鲜现象。历史上，有关“东亚病夫”“黄祸论”和“中国崩溃论”等声音一直伴随着中国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讨论也甚嚣尘上，并且不断演化出各种新的版本。这些围绕中国的污名，不仅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而且成为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舆论武器。但较之以往，此次西方借新冠疫情发起的对华污名化运动，无论是持续时间、波及范围还是影响烈度均前所罕见，从而使此次突发事件引发的对华污名化浪潮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

（一）污名化主体趋向多元

整体而言，此次疫情背景下的对华污名化呈现出美国“身先士卒”、其他西方国家“彼唱此和”的态势，但内部分化严重，未形成明显的联动迹象。疫情在中国出现后，对疾病的猜疑与忧惧使得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批评甚至诋毁中国的声音，但烈度和影响相对有限。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美国成为全球疫情的重灾区。随后，美国对华态度急剧恶化，一些政客、媒体和研究机构纷纷利用新冠疫情大肆抹黑中国，掀起了对华污名化的高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诸多共和党议员多次在公开场合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或者“外国病毒”。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将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归咎于中国政府早期的应对不力，认为中国政府在疫情相关数据上的隐瞒使其他国家在应对疫情时陷入被动，以致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经济损失。^①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科里·加德纳（Cory Gardner）、委员会成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联名致信特朗普，呼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成立特别工作小组，“对抗中国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邪恶宣传活动”。^②美国政客的上述污名话语一经抛出便广泛传播，西方各大媒体也竞相发声

^① Geneva Sands, et al., “U.S. Government Report Assesses China Intentionally Concealed Severity of Coronavirus,” May 4, 2020, CNN, <https://www.cnn.com/2020/05/03/politics/mike-pompeo-china-coronavirus-supplies/index.html>.

^② “Rubio, Gardner, Romney Urge Creation of Taskforce to Counter CCP Propaganda,” March 23, 2020, <https://www.rubio.senate.gov/public/index.cfm/2020/3/rubio-gardner-romney-urge-creation-of-taskforce-to-counter-ccp-propaganda>.

指责中国。“驰名双标”媒体《纽约时报》在意大利效仿中国封城之后连续发表推文，批评中国封城“给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带来巨大损失”，而盛赞意大利封城是“冒着经济风险遏制病毒以保全欧洲”。同是防“疫”举措，在中国是“反人权”的措施，在意大利却成了“崇高的牺牲行为”。^①3月24日，加拿大《国家邮报》刊载文章，称“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是威胁我们生存最危险的‘中国病毒’”，处心积虑地在新冠病毒、中国政府、甚至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借疫情抹黑中国。^②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也发表歧视性报道，声称在澳中企和华人从澳大利亚购买了大量防疫物资驰援武汉，致使澳大利亚防疫物资紧缺，医疗体系运转失灵。^③美国污名化中国的猛烈攻势将中国推向了国际舆论的风暴中心，上述种种论调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广泛报道和关注中不断发酵，与美国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了此轮西方对华污名化浪潮。这场全球性危机下，西方政界人士和媒体的密集关注与集体卷入，在塑造民众对新冠疫情相关问题的认知与记忆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高频而又形式多样的对华污蔑与贬损，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对华认知。

需要注意的是，与2017—2019年澳大利亚掀起的反华风波不同，此轮西方对华污名化运动在西方社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其一，不同的西方国家在反华情绪上并不一致，如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对中国更多持同情和赞赏的态度，而澳大利亚则与美国亦步亦趋，甘当美国的“马前卒”，在污名化中国的进程中，颇有“美扮红脸，澳扮白脸”之势。^④和美国一样，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澳政府曾高度评价中国应对疫情的透明度，但这在4月中旬发生了改变。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质疑和美国政府将疫情“甩锅”给中国的时间线高度吻合。4月下旬，在全球抗疫的紧要关头，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声称，由于怀疑中国疫情处置和信息发布的透明度，澳大利亚支持就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应对情况展开“独立调查”，并游说德国、法国、

① The New York Times, Twitter, March 8, 2020, <https://twitter.com/nytimes/status/1236479276586807296>.

② Kevin Libin, “Kevin Libin: Beijing’s Communist Regime is the Biggest ‘China Virus’ Threatening Our Survival,” *National Post*, May 23, 2020, <https://nationalpost.com/opinion/kevin-libin-beijings-communist-regime-is-the-biggest-china-virus-threatening-our-survival>.

③ Kate McClymont, “Second Developer Flew 82 Tonnes of Medical Supplies to China,” March 26, 2020,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second-developer-flies-82-tonnes-of-medical-supplies-to-china-20200326-p54e8n.html>.

④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U.S., Australia Play Good Cop, Bad Cop with China,” *Asia Times*, May 8, 2020, <https://asiatimes.com/2020/05/us-australia-play-good-cop-bad-cop-with-china/>.

新西兰等国“入伙”。^① 尽管中方多次表达反对和抗议，但澳大利亚不为所动，甚至不惜以牺牲中澳关系为代价维持对华强硬态度。澳大利亚外长玛莉丝·佩恩多次敦促中国保持程序透明，并声称应对疫情的调查要独立于世界卫生组织。^② 然而，对于这一提议，英法两国表态谨慎，认为当前并非专注于调查的适当时机。^③ 西方国家的内部分化可见一斑。

其二，不同社会阶层内部，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之间虽有趋同的倾向，但对华话语出现了极化现象。在疫情国际扩散的背景下，迎合民众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精英有其群众基础；反之，同情和支持中国、反对污名化的政治精英和民众也不在少数。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痛斥美国个别政客别有用心地将新冠病毒赋予“中国化标签”，强调这种幼稚的政治谩骂会伤害全球抗击疫情的努力。^④ 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也多次为中国应对疫情的反应辩护，他表示中国在疫情之初就做出了非常迅速的反应，并呼吁停止对中国的污名化和指责。^⑤ 4月7日，作为世界顶级学术刊物，英国《自然》杂志以《停止新冠病毒的污名化》为题发表社论，为曾经错误地将新冠病毒与武汉和中国关联道歉。^⑥ 这则以科学名义向世界发出的呼吁立即引发了各方的热议和共鸣，很多人表示应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名化，携手共抗新冠病毒。

（二）污名化动机逐渐明确

如前所述，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西方对华污名化经历了从道德性批判到政治性攻

① Andrew Probyn, “Scott Morrison Lobbies Donald Trump, Others for Greater World Health Oversight to Prevent Another Pandemic,” *ABC News*, April 22, 2020,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4-22/morrison-to-push-for-anti-pandemic-inspection-powers/12173806>.

② Brett Worthington, “Marise Payne Calls for Global Inquiry into China’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BC News*, April 19, 2020,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4-19/payne-calls-for-inquiry-china-handling-of-coronavirus-covid-19/12162968>.

③ Thomson Reuters, “China Angered by Australian Call for International Inquiry into Coronavirus Origin,” April 29, 2020, <https://www.cbc.ca/news/world/china-australia-coronavirus-1.5548868>.

④ Matthew Knott, “‘Despicable’ Coronavirus Name-calling From U.S. Leaders Infuriates China,”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rch 11, 2020, <https://www.smh.com.au/world/north-america/despicable-coronavirus-name-calling-from-us-leaders-infuriates-china-20200311-p548ue.html>.

⑤ Web Desk, “Bill Gates Defends China’s COVID-19 Response, Says it Did ‘Lot of Things Right’,” April 27, 2020, <https://www.theweek.in/news/world/2020/04/27/bill-gates-defends-chinas-covid-19-response-says-it-did-lot-of-things-right.html>.

⑥ “Stop the Coronavirus Stigma Now,” April 7, 202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1009-0>.

击的明确转变，转变的关键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在疫情面前身份的变化。疫情在中国暴发之初，西方国家重提“东亚病夫”与“黄祸论”的污名，实质上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偏见，据此认为新冠疫情是中国乃至亚洲面临的问题，而自己可以独善其身。这种傲慢与自大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未能认识到新冠疫情的严重性，也未意识到尽早在国内开展病毒检测和拥有足够医疗设备的重要性，进而导致欧洲和美国先后沦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

这一困境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自1月21日报告首例本土新冠肺炎病例以来，特朗普政府忽视早期情报与专家警告，迟迟未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进入3月，美国各地均呈现出疫情暴发迹象，特朗普不得不于3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①截至7月17日，美国已是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卫生系统效率低下与不公平的情况。与欧洲相比，美国没有建立像欧洲国家那样更公平的福利政策和更完善的全民公共卫生体系，而是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高昂的医疗保健费用导致疫情早期无法负担检测与治疗费用的弱势群体面临生命危险。2020年4月的一项调查显示，14%的美国受访者表示，由于担心费用问题，即便他们或家庭成员有咳嗽和发烧的症状，也不会寻求医疗帮助。^②甚至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美国就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因为费用问题而推迟接受医疗服务。^③与此同时，社会急刹车式的停摆也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根据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的数据，美国4月份制造业指数创11年来的新低，第一季度出现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④经济停滞导致国内失业率激增，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失业率飙升至14.7%，失去了2050万个工作岗位，创下了1939年政府追踪该数据以来最大的跌幅，这几乎将2008—2009年债务危机后美国创造的净

① Derek Hawkins, et al., “Trump Declares Coronavirus Outbreak a National Emergency,”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0/03/13/coronavirus-latest-news/>.

② Dan Witters, “In U.S., 14% With Likely COVID-19 to Avoid Care Due to Cost,” April 28, 2020, <https://news.gallup.com/poll/309224/avoid-care-likely-covid-due-cost.aspx>.

③ Dylan Scott, “Coronavirus is Exposing all of the Weaknesses in the U.S. Health System,” March 16, 2020, <https://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20/3/16/21173766/coronavirus-covid-19-us-cases-health-care-system>.

④ “PMI® at 41.5%; April 2020 Manufacturing ISM® Report On Business®,”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 May 1, 2020,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pmi-at-41-5-april-2020-manufacturing-ism-report-on-business-301050619.html>.

就业人数消耗殆尽。^①因此,相比于其他西方国家,此次疫情给美国造成的民生和政治后果更为严重。迅速蔓延的疫情和要求重启经济的呼声交替出现,成为贯穿美国疫情的主要矛盾,造成美国国内前所未有的混乱。特朗普政府疫情防控方面的荒唐表现也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极大不满。5月28日至6月9日美国“真实政治网”(Real Clear Politics)的民调数据显示,在大选民意测验中,乔·拜登比特朗普领先8.1点。^②民意的变化对特朗普今年能否顺利取得连任构成了极大挑战。

国内疫情的恶化使美国自顾不暇。在灾难来袭时,这个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在国际层面并未显示出强大的风险管控能力与国际领导力。在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非但不愿对欧洲盟友提供帮助,反而奉行“美国优先”,在未同欧盟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禁止欧洲国家公民入境。^③此外,美国还截留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防疫物资,^④甚至从疫情严重的意大利运走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⑤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极尽污名化之能事,在病毒源头和抗疫责任上编造谣言、无端指责,加大对华施压力度。这些破坏国际合作、阻碍共同抗疫的行为不仅导致美欧安全利益分离进一步加大,^⑥而且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西方凝聚力和公信力等诸多质疑,使美国的全球领导者角色变得复杂。

内外交织的困境让特朗普的大选前景变得愈加黯淡。在疫情与党争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当局对华态度急剧恶化,率先掀起了对华污名化的高潮。此时的污名化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包含了明确的政治诉求,希冀通过制造敌人来转移矛盾,缓解美国当前的国家困顿与国际孤立。在此阶段,对华污名化成为美国处理内

①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Th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for April 2020,”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May 8, 2020, <https://www.bls.gov/cps/employment-situation-covid19-faq-april-2020.pdf>.

② “General Election: Trump vs. Biden,” Real Clear Politics,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epolls/2020/president/us/general_election_trump_vs_biden-6247.html.

③ “Coronavirus: EU Condemns Trump Travel Ban on 26 European Countries,” BBC News, March 12, 20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51857462>.

④ Kim Willsher, et al., “U.S. Hijacking Mask Shipments in Rush for Coronavirus Protection,” The Guardian, April 3,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02/global-battle-coronavirus-equipment-masks-tests>.

⑤ Marcus Weisgerber, “U.S. Air Force Flew Half a Million Coronavirus Test Swabs From Italy to Tennessee,” March 18, 2020, <https://www.defenseone.com/threats/2020/03/us-air-force-flew-half-million-coronavirus-test-kits-italy-tennessee/163879/>.

⑥ 赵怀普:《从“欧洲优先”到“美国优先”: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国际论坛》2020年第3期,第49页。

政外交有力的政治工具。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此前曝出，美国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全国委员会向党内竞选人员发送了一份长达57页，内容翔实的备忘录，旨在告知候选人如何通过积极攻击中国来应对对特朗普政府的质疑。共和党借对华污名化“甩锅”的计划性、目的性昭然若揭。^①在有关疫情的话语架构中，美国倾向于自我标榜为“受害者”，对内可以转嫁有关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的责任，对外则妄图利用“广场效应”激发部分西方国家的情感共鸣，在国际社会中构筑统一战线，形成利益一致、日渐庞大的“受害者群体”。当这些污名主体在集体情感归属的影响下自我界定为疫情中的“受害者”后，必然对应着假定的“加害者”，而中国则成为被指责对象。概而言之，通过发起对华舆论战，美国使疫情问题政治化、冲突关系扩大化的目的得以实现，这为特朗普政府争取国内支持、联合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塑造为主要的“替罪羊”提供了正当性。正因如此，美国一反此前往往推动其同盟国走在对华污名化前列的常态，自己赤膊上阵，在此轮对华污名化浪潮中充当了反华急先锋。



扫码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免费获取完整版电子专辑

新冠疫情期间世界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

全 燕

【内容提要】 新冠疫情期间，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异动状况引人瞩目。一些右翼政府和政党为转嫁国内压力，将病毒传播政治化，制造了一系列极端排外的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事件，具体表现在对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口的污名化，推行排外的民族主义政策，以及制造针对特定群体的阴谋论等。逆全球化潮流是这场民族主义政治异动的深刻背景，世界各地不断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以及各国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使得民族主义成为显著的政治思潮，并在疫情期间迅速蔓延。从深层次看，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的不平等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相互构建，从根本上形成了疫情期间政治异动的根源。应对这一异常的世界政治新动向，需要我们以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公平为支撑点，坚持多边主义的政治共识，减轻民族主义敌对排外情绪的消极影响，并将环境可持续性、人口公平和人道主义团结置于重建和复兴方案的核心，才有可能形成修复政治、阻击疫情的决定性力量。

【关键词】 新冠疫情；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异动

【作者简介】 全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州 邮编：510006）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20.05.003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20）05-0043-16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民粹主义思潮最新发展动态及其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6AZD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疾病，新冠疫情（COVID-19）的蔓延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流行病的扩张范围，它已经越过各大洲的边界，威胁着数以亿计的人们的健康安全，它带来的人员伤亡、经济崩溃、边界关闭以及其他影响，都在不断刷新人们对风险社会的想象，而新冠病毒的传播也在实践着另一种“全球化”的统治之路。

面对疫情，各国政府和社会的应对措施已经并将持续深刻地影响世界。我们看到，就在疫情引发的新一轮逆全球化的表面之下和边缘之外，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正在挑战着西方世界的秩序。虽然我们乐观地相信世界迟早会从新冠病毒疫情中恢复过来，但疫情的深度扩散已经让世界治理体系处于动荡状态。它暴露了全球信任的裂痕、全球相互依赖的陷阱，导致资本主义全球化处于新一轮危机中。观察人士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兴起可能会成为病毒大流行和各国应对措施的后果。^①

在疫情阴影的笼罩之下，人类的政治关系被重新定义，病毒正在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定时炸弹，它引爆了与种族资本主义相伴相生的极端排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并已经在一些国家引发深度政治危机。随着各国边境的关闭，资本主义内部不平等、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弊端空前加剧。在国内压力下，挑动民族主义向极端排外方向发展成为右翼政府和政党寻找政治突围的出口，也形成了新冠疫情时期世界政治的突出风险症候。这场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具有哪些典型表现？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根源何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而如何开展新冠疫情危机中的政治修复与社会重建工作则是我们思考与探究的最终落脚点。

一、新冠疫情期间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状况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民族主义已经发展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引人瞩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形式，成为民族国家社会的重要特征。民族主义是一种可塑性极强的狭隘的意识形态，它更看重一个国家或种群的成员身份。^②民族主义者认为世界是由国家和民族构成的，国家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自然单位。但民族主义的发展往往又是高度两极化和分裂的，因为它经常与否认其他政治立场合法性的民粹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

① Gideon Rachman, "Nationalism Is a Side Effect of the Coronavirus," *Financial Times*, March 23, 2020.

② Florian Bieber, *Debating Nationalism: The Global Spread of Nations*, London: Bloomsbury, 2020, pp. 519-540.

使其蒙上了一层威权主义色彩。在这种政治氛围中，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倾向很容易被合理化，而新冠疫情期间，这种发展趋势与流行病联系在了一起。

从相关文献来看，将流行病的传播与民族主义思潮关联的研究并不多，然而流行病术语却被经常用于民族主义研究，例如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就声称“民族主义是一种婴儿疾病，它是人类的麻疹”。^①在世界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中，始终存在一种极端化意识形态，就是将流行病与特定种族群体的污名化联系在一起。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纳粹德国的反犹太言论，他们把犹太人比作影响德意志民族身体的疾病，例如，在纳粹的宣传片《永恒的犹太人》中，犹太人就被比作携带鼠疫的老鼠。由于犹太人被描述为流行病的携带者，从公共卫生和控制疾病传播的角度来看，他们被边缘化是合理的，这种污名化行径在纳粹赋予犹太人非人类地位和为犹太人无辜被虐杀的行为辩护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80多年过去，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使这一幕再次重演。当全世界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如何更好地遏制病毒的传播这一紧迫问题上时，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却别有用心地制造与病毒相关的政治构陷，制造对特定民族、种族、宗教的污名化和迫害。在这场意外危机中，阻击病毒成为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制造事端的绝佳借口。我们看到，印度国内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极端排外民族主义迅猛抬头，并发展成为一场政治异动，这种状况非常值得警惕，它是威权主义和极端排外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印度执政党人民党利用这场意想不到的危机制造民族冲突，为他们的宗教迫害辩护，并伺机加速这种迫害。随着疫情在印度蔓延，人民党内部的极端排外民族主义者以防控新冠病毒疫情为掩护，大肆宣传该党长期坚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即反穆斯林的意识形态。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印度人民党宣扬的一种基于“印度神圣的祖国只属于印度教徒”的政治意识形态，它“用印度教价值观定义了印度文化，排斥印度其他宗教和种族文化”。^②随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印度的显著增长，莫迪总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严厉的封锁，他和幕僚们抓住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带来的意外危机，将疫情与反穆斯林的印度教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将病毒传播政治化，制造穆斯林民族是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播者的一系列话语，并通过三个阶段把穆斯林塑造成印度的国家敌人。

^① Albert Einstein, “What Life Means to Albert Einstein: An Interview by George Sylvester Viereck,”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October 26, 1929.

^② Rana Muhammad Ayyub, “I have reported on Modi for over a decade. His Hindu nationalist ideas will be even more dangerous now,” *Time*, May 24, 2019.

第一阶段是把病毒传播归咎于印度的穆斯林人口，制造新冠病毒是由伊斯兰传教组织塔布里·扎马特（Tablighi Jamaat）的成员传播的谣言，并通过合法机构生产出一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先入之见。谣言首先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中广泛传播，而当各种印度官方机构纵容这些谣言并以实际行动赋予其合法性后，这些谣言遂成为政治构陷的依据。2020年3月31日，德里警方出具了一份针对塔布里·扎马特的创始人的曾孙、印度穆斯林学者莫拉纳·萨阿德·康德劳维（Maulana Saad Kandhlawi）的报告，他也是该组织总部所在地的现任负责人。在这份报告中，警方根据《流行病法》和《印度刑法》对这位负责人和其他六人提起了指控，理由是他们故意违反政府为遏制病毒大流行而发布的封锁指令。^①4月2日，印度内政部将塔布里·扎马特成员中的非印度人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从事扎马特的活动。^②印度政府在其关于新冠疫情的每日简报中也专门将塔布里·扎马特组织列为传播病毒的高危组织，卫生部长哈希·瓦尔丹（Hashish Walden）直接将病毒的扩散归因于穆斯林人口的携带与传播。^③

第二个阶段是通过煽动性的政治言论妖魔化穆斯林。来自政府机构的对病毒起源的构陷，使穆斯林很快被视为对印度国家和印度教的生存威胁。人民党领导人开始在社交媒体和其他公开场合展开有针对性的攻击。例如，德里人民党领导人卡米尔·米什拉（Kamil Mishra）在推特上制造煽动性舆论：“塔布里·扎马特人开始向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吐痰！很明显，他们的目标是用新冠病毒感染尽可能多的人并杀死他们！”^④印度人民党信息和技术部门的负责人阿米特·马尔维亚（Amit Malviya）在4月1日发推文称：“塔布里·扎马特人的病毒传播使德里的阴暗时刻正在到来！”4月4日，喜马恰尔邦人民党主席拉杰夫·宾达尔（Rajeev Bindal）宣称，“中央和邦政府在与新冠病毒的决定性战斗中不遗余力，但包括塔布里·扎马特在内的一些人，像人体炸

① Shaista Naqvi, et al., “How Tablighi Jamaat Event Became India’s Worst Coronavirus Vector,” *Aljazeera*, April 7, 2020,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20/04/tablighi-jamaat-event-india-worst-coronavirus-vector-200407052957511.html>.

② Sarmad Hussain, “Muslims Targeted as India’s Lack of Capacity to Fight COVID-19 Exposed,” *Daily Sabah*, April 9, 2020, <http://www.dailysabah.com/opinion/op-ed/muslims-targeted-as-indias-lack-of-capacity-to-fight-covid-19-exposed>.

③ Yasir S. Elhassan, “India Is Scapegoating Muslims for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Foreign Policy*, April 22, 2020.

④ Ellis-Petersen, Hamidah Abdul Rahman, “Coronavirus Conspiracy Theories Targeting Muslims Spread in India,” *The Guardian*, April 13, 2020,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13/coronavirus-conspiracy-theories-targeting-muslims-spread-in-india>.

弹一样移动，阻挠他们的努力”，^①等等。可以看到，组织极端排外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前两个阶段是相互依存的，目的是在社会上制造普遍的道德恐慌，为疫情中的印度人构建一个假想的敌人，即伊斯兰教的实践者。在普遍的道德恐慌中，许多印度人开始相信，如果不消除敌人，现存的印度社会——包括其文化、传统、宗教等将会崩溃，因此必须保护社会不受敌人的侵害。

政府机构的构陷加上政治领导人的煽动性言辞，制造出一种恐惧和偏执的环境，这种环境极易激发对被构建的敌人实施象征性和身体上的暴力，为第三阶段铺平了道路。此时，暴力的幽灵已经扩大到整个国家，暴力实施的对象涵盖了所有穆斯林。而一旦新冠病毒的伪装不再必要，对待穆斯林的暴行就会变得合理化、正常化，印度教民族主义就会成为赤裸裸的施行暴力的动力。疫情期间，无辜的穆斯林遭遇暴力的事件在印度比比皆是。4月5日，印度一名22岁穆斯林男子遭到村里其他人的毒打，并被录下来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在殴打过程中，可以听到攻击他的人要求他回答：“告诉我们你的计划！你的计划是传播新冠病毒吗？”^②就在同一天，来自另一个村庄的37岁穆斯林男子因不堪忍受村民指控他携带并传播新冠病毒而上吊自杀，尽管就在几小时前，这名男子的病毒检测结果被证实为阴性。同样悲惨的还有一位来自旁遮普邦的穆斯林妇女，她4月10日在当地一家医院轮班后开车回家，她的车被一群男人包围，她被强行拉出来，遭到咒骂、殴打和性侵犯，在虐待过程中，暴徒不断高喊“滚回巴基斯坦！”^③

这三起案件让人们看到，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民族宗教的、种族化的“我们”一旦被动员起来，就会成为排斥和削弱那些被认为是不同的人（公民和移民）的社会主力。也就是说，将新冠病毒有效地用于政治目的造成了强烈的道德恐慌，一旦被构建的敌人在人们的思想中具体化，那么普通的穆斯林也会遭受群体暴力。在新冠病毒的掩护下，印度教民族主义不再是一套停留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想象中的仪式化内容，而是很快发展成为一种暴力思想，进而转变为暴力行为。尤为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暴力行为不是由印度人民党官方力量实施的，而是由普通公民实施的。例如在三起案件

① S. Elhassan Pasha, “India’s Coronavirus-related Islamophobia Has the Arab World up in Arms,” *The Wire*, April 20, 2020.

② Jeffrey Gettleman, Kathy Schultz, “In India, Coronavirus Fans Religious Hatred,”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2020, <http://www.nytimes.com/2020/04/12/world/asia/india-coronavirus-muslims-bigotry.html>.

③ Yasir S. Elhassan, “India Is Scapegoating Muslims for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Foreign Policy*, April 22, 2020.

中，印度教攻击者对穆斯林受害者并不陌生，他们甚至互为邻居多年。新冠病毒为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政府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它诱使疫情中惶恐的人们形成一种风险社会的“隧道式视野”（tunnel vision），这一视野狭隘而偏执，并选择性无视更多事实和真相，它阻止了人们对极端排外民族主义言论被包装起来以实现极右翼政党意识形态目标这一问题的理性审视。

疫情期间除了印度人民党挑起的反穆斯林浪潮之外，欧美国家的极右翼党派也不约而同推出了针对有色人种和移民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政策，并爆发一系列种族歧视行为。极右翼政客们为了转嫁国内压力和矛盾，会把有色人种和移民贴上“病毒携带者”的标签，在本已严峻的环境中制造出一种深深的不信任和仇恨的气氛。在美国，抗击疫情的紧急条例授权国土安全部可以在不经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将非法和无证移民送回原籍国。^① 总统特朗普一度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造谣其由实验室设计、通过中国人旅行并与国际人口接触而导致广泛传播。与极右翼政客的言语诽谤遥相呼应的是，美国国内针对华裔的种族主义歧视事件也大大增加，仅仅2020年3月19日至4月1日短短两周内，美国的一个在线报告就记录了1135例。^② 在欧洲，德国新选择党（AfD）和奥地利自由党（FPÖ）等极右翼政党把新冠病毒传播与所谓的移民威胁联系在一起，并要求采取专门针对移民的镇压措施。^③ 在匈牙利，总理维克托也声称新冠病毒的传播与移民有关。虽然他的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但他依然下令出台了非常严格的移民隔离制度。^④

种族歧视造成了对特定宗教或种族群体成员的社会排斥，而歧视性政策对被歧视群体疫情期间的生活和生计造成严重影响。在美国，种族居住的隔离制度是被载入联邦政府的住房政策里的，这一制度由司法系统执行，同时被教会和其他文化机构所倡

① León Castellanos-Jankiewicz, “COVID-19 Symposium: U.S. Border Closure Breaches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Opinio Juris*, April 3, 2020, <http://opiniojuris.org/2020/04/03/covid-19-symposium-us-border-closure-breaches-international-refugee-lw/>.

② Jeung Russel, “Incidents of Coronavirus Discrimination,” Report for A3PCON and CAA, http://www.asianpacificpolicyandplanning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Stop_AAPI_Hate_Weekly_Report_4_3_20.pdf.

③ Jansen Frank, “Wie Rechte das Coronavirus zur Hetze gegen Flüchtlinge benutzen,” (《右翼人士如何利用新冠疫情来挑动人们反对难民的情绪》), *Der Tagesspiegel*, March 9, 2020, <https://www.tagesspiegel.de/politik/video-mit-pistolenschuss-wie-rechte-das-coronavirus-zur-hetze-gegen-fluechtlinge-benutzen/25625008.html>.

④ Edit Inotai, “How Hungary’s Orban Blamed Migrants for Coronavirus,” *EU Observer*, March 20, 2020, <https://euobserver.com/coronavirus/147813>.

导的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所合法化。而种族居住隔离意味着有色人种的穷人必须被迫住在靠近制造业和其他有害毒素和废物的地方，这大大增加了这些人群感染新冠病毒的机会。^①另外，美国边境和监狱中被监禁的人口绝大多数是黑人、棕色人种和穷人，他们的脆弱性和不自由也导致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极为突出。^②还有调查发现，当有色人种患者出现了感染新冠病毒症状去急诊科就医时，他们痛苦的情形会被刻意淡化或不被重视，并得不到足够的医学关怀以及及时的治疗。^③统计数据显示，在与新冠肺炎相关的直接死亡人群中，底特律、芝加哥、新奥尔良、纽约等地 40% 是黑人。^④失业、普遍的经济悲观情绪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心理影响折磨着受到歧视和驱逐的人们，已经导致一些国家种族冲突、政治不信任和社会不稳定情况加剧。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已经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加剧全球不平等，并有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萧条——而这种情况已经开始——预计将有 8% 的世界人口陷入贫困。^⑤

民族主义政治异动还表现在阴谋论的空前活跃。通常在政治动员中，恐惧是一种强大而危险的动力。我们看到，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利用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传播恐惧和阴谋论，从 5G 技术传播病毒的观点，到认为这种病毒只是政府阴谋的烟幕弹等，各种匪夷所思的谣言一直在流传，这些谣言是通过与极右激进组织活动人士有联系的 4chan 和 8chan 这样的社交媒体展开传播的，目的是制造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尽管这些社交媒体主要被较小的、相对边缘的激进团体所使用，但谣言已广泛传播，并受到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的重视。正如发生在印度的宗教骚乱所证明的那样，在一个充满恐惧和不确定的环境中，阴谋论变得特别普遍，也更有可能找到追随者。阴谋论会破坏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引发暴力冲突。我们有理由怀疑，

① David R. Williams, Colin Collins, "Racial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 fundamental Cause of Racial Disparities in Health," *Public Health Reports*, Vol.116, No.5, 2001, pp.404-416.

② Ira Gardner-Morse, "Thousands of ICE Detainees at High Risk Amid Coronavirus Pandemic," *Al Jazeera*, March 19, 2020.

③ Susan Novy McDonald, "In 1918 and 2020, Race Colors America's Response to Epidemics," *Undefeated*, April 1, 2020, <https://theundefeated.com/features/in-1918-and-2020-race-colors-americas-response-to-epidemics/>.

④ Edward AD Mitchell, "The Shortages May B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The Atlantic*, March 11,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humanitys-long-history-of-making-epidemics-worse/607780/>.

⑤ Andy Sumner, Chris Hoy, Eduardo Ortiz-Juarez, Estimates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Global Poverty, UNU-WIDER Working Paper, April 5, 2020.

全球将在短期内看到一个与疫情息息相关的“新冠民族主义”（coronationalism）^①在一些国家出现，它由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极右翼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混杂而成。

二、民族主义政治异动的逆全球化背景

如果说新冠疫情是民族主义政治异动的导火索，那么波及世界的逆全球化潮流则是民族主义涌动的深刻背景。全球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它将全球范围内不受约束的市场作为实现资本主义繁荣承诺的关键要素。全球化涉及人员、信息、货币和产品的流动，这些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加，使国际商业得以繁荣。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第三世界的结构调整和1989年苏联模式崩溃的刺激下，全球化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它的意义不仅仅是重塑市场，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利用其国内力量，对外输出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文化等内容。^②

然而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使其成为潜在破坏资本主义自身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后果包含了全球变暖、第六次物种灭绝和海洋污染等与环境正义对立的风险，以及经济发展不平等加深等体现强国霸权的内容，这也导致抗议之声不绝于耳。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之内，各种政治动员频繁涌现，全球范围内的有反WTO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阿拉伯之春”运动、“欧盟反紧缩运动”等。而在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中，各种青年抗议活动也经常占据全球新闻的头条。在智利，人们反对地铁票价上涨、私有化和不平等；在黎巴嫩，抗议对象从反对汽油和税收扩大到抗议宗派统治、失业和腐败；在伊拉克，人们反对腐败、失业，呼吁组建新政府；在伊朗，人们抗议油价上涨，并呼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台；在印度，人们反对新的反穆斯林公民规则；在印尼，人们对反腐败委员会的削弱表达强烈抗议……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实践方式，它们是激烈的政治运动的重要补充。

而全球化核心国家美国和历史更悠久的欧盟成员国，也在经历传统的权力中心——社会民主党和主流保守派——日益失去影响力的过程。^③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2019

① Ozkirimli Umur, “Coronationalism?” *Open Democracy*, April 14, 2020,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can-europe-make-it/coronationalism>.

② Miche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in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p.87-104.

③ John A. Agnew, Michael E. Shin, *Mapping Populism: Taking Politics to the Peopl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9, p.68.

年的英国大选结果就是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打击，也是逆全球化的显著政治事件。特朗普和约翰逊的伙伴关系不是由亲市场的智库和传统媒体催生的，而是出于他们对各自国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减弱的本能反应。他们将全球化认定为根本性矛盾，并将民族主义描述为解决方案，将经济、政治和军事监控跨境流动相结合，以促进白人国家的经济利益。在美国，民粹主义左派桑德斯和民粹主义右派特朗普至少在原则上都同意与保护主义和单边贸易相关的问题，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原本左派的身份政治已经被重塑为另类右翼的身份政治。美国当前日益严厉的移民控制和驱逐，反对环境倡议和对全球变暖的质疑，也昭示出逆全球化和极端排外民族主义的抬头。而约翰逊的英国脱欧计划也有着类似的共鸣，它是由重新建立国家壁垒，回到英帝国统治时期，以及“让英国再次强大”的渴望所支撑。

与此同时，大数据算法的兴起使个人隐私、共识、真相遭受瓦解，西方党派和利益集团为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操纵信息、事实和个人观点，也在加剧意识形态分裂，破坏共同政治立场。这些都导致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分歧越来越大，种族优越感、仇外心理日益合法化，对任何“异族”的日常化排斥以及有组织的暴力行为都在增加。可以看到，全球民粹主义领导人都采用了非常相似的策略。除英美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印度总理莫迪、巴西总统博尔萨纳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这些领导人都反对全球主义，支持有利于其选民的民族主义政策。^①越来越多的政治竞选结果表明，世界各地的极右翼政党在主流选民中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及其政治主流化意味着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许多国家变得更加广泛和被社会接受。

新冠疫情在西方世界暴发后，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化造成了消费品和人员的全球流动，是导致新冠病毒在北大西洋两岸蔓延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导致支持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力量和声音显著上升，民粹主义反弹，全球化力量和声音被显著压制。民粹主义政客纷纷呼吁关闭边境，并声称他们长期强调的关闭边境是正确的。特朗普发推特称，“这就是我们需要边界的原因！”^②极右翼芬兰党副主席、欧洲议会成员劳拉·胡塔萨里也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证明了边界管制

① Ayesha Masood and Muhammad Azfar Nisar, “Speaking out: 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the Academic Discourse on Far-right Populism,” *Organization*, Vol.27, No.1, 2020, pp.162–173.

② Donald John Trump (@realDonaldTrump), “THIS IS WHY WE NEED BORDERS!” *Twitter*, March 23, 2020, <https://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status/1242092738973249536>.

是正确的！”^①而民族主义政策的支持者们更是强硬表态，“当全球化本身使我们面临如此严重的风险时，追求全球主义（即便是一种理想）还有什么意义？”^②受此影响，最初是中国和伊朗公民面临入境限制，随着疫情蔓延到欧洲，意大利人遭遇了入境限制，而当疫情在全球呈现蔓延之势时，持续的边境限制影响到来自南半球的公民，其结果无疑加剧了全球不平等，而移民政策也可能会持续僵化。虽然关闭边境可能是暂时的，但出于各种动机，一些措施的截止期限遥遥无期，重新开放边境和恢复全球交通可能还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对于此种情形我们不难推测出，除疫情控制之外的其他考虑往往都与排外的民族主义政策紧密相连。这一切都会导致逆全球化的趋势加深，国家至上主义也将大大削弱全球治理和合作的实效。

与此同时，整个北大西洋社会的亚裔群体发现自己正遭受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攻击，反亚洲的地域歧视不断加深，对有色人种的社会疏远正在导致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比例增加。^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也在借疫情加速蔓延，特朗普将世界卫生组织作为替罪羊，就在新冠病毒开始在非洲扩散之际，停止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在欧盟，申根协定的成员国早已关闭边境，联盟的一致性受到威胁，欧洲内部的分歧——尤其是有较大经济差异的南北之间分歧进一步加深。意大利副总理萨维尼猛烈抨击欧盟在抗击新冠病毒方面的缺失，并警告说欧盟的未来岌岌可危。另外，由于治疗新冠肺炎的费用和随后复苏计划需要的费用需要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分摊，荷兰、德国、奥地利等国对共同出资的抵制也使联盟遭受打击，这种裂痕被欧洲怀疑主义政党利用，可能会导致欧洲内部的进一步分裂……不出所料，这场病毒大流行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提出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拷问——是捍卫利润还是拯救生命。

① Erik Kirschbaum, Laura King and Meg Bernhard, "Nationalism Rears Its Head as Europe Battles Coronavirus With Border Controls," *LA Times*, March 19, 2020, <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20-03-19/nationalism-could-rear-its-head-as-europe-battles-coronavirus>.

② Nicholas L. Waddy, "Pandemic Nationalism," *American Greatness*, March 23, 2020, <https://amgreatness.com/2020/03/23/pandemic-nationalism/>.

③ Eamonn. J. Dickson, "How Social Distancing Could Lead to a Spike in White Nationalism," *Rolling Stone*, March 18 2020, https://www.rollingstone.com/culture/culture-news/covid-19-coronavirus-pandemic-extremism-white-nationalism-southern-poverty-law-center-969079?fbclid=IwAR238yjEG2CnFvZ2UtlgFqbF39CFyQ77q4KqOVjo4diuHPwHV_0NLYk-Xg.

三、新冠疫情期间民族主义政治异动的根源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不平等和极端排外民族主义相互构建，从根本上形成了新冠病毒疫情中政治异动的根源。研究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指出，资本主义是种族化剥削和资本积累共同的产物，因为“发展、组织和扩张的资本主义本质导致其必然追求种族主义方向，并通过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等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①在新冠疫情期间，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瓦解和其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导致在病毒大流行的危机面前民众受到的影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阶级或种姓，他们的性别和年龄，以及他们居住的区域，例如发达国家的有色人种和贫困的工人阶级会因无法接受平等的医疗救助和卫生保障而大量暴露在感染和死亡的威胁中；另一方面，疫情被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利用，将种族歧视包装成了民族问题，“美国或欧洲优先”等狭隘的民族主义做法加剧了这场危机，被煽动起来的极端仇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病毒流行的科学认知和危机时刻的团结与共识。



扫码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免费获取完整版电子专辑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困境与应对策略*

刘文革 杨志文

内容提要：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各国（或地区）形成了四种主要的应对模式，体现了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根据新冠疫情期间暴露出的全球协调力量不够、合作机制不足、统计数据不准等问题，有针对性地推动相关合作理念、组织机构、协调机制等建设，是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必然选择。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世界各国（或地区）合力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保障全球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新冠疫情；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刘文革，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院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钱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经济学；杨志文，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杭州 310018）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36(2020)05-0068-13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的战略家思维、全球化视野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①这一重要思想赢得了许多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为全球化的深度推进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世界各国（或地区）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暴露出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表明，人类需要在思想和行动上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

* 本文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项目编号：18VSJ024）、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中的义乌元素研究”（项目编号：19NDJC292YB）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9日第6版。

以这一重要思想为引领，增进国际间的团结与合作，克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诸多难题，合力共建美好家园。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①

一、世界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四种主要模式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世界各国由于社会价值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基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医疗卫生体系的应对能力等因素的考量，采取了各不相同的抗疫策略。除因医疗卫生体系薄弱而无力组织起有效力量抗击疫情少数欠发达国家之外，其他各国应对新冠疫情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

（一）生命健康至上的中国模式

面对新冠疫情，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②宁愿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依然坚决并及时采取了“封城”“隔离”“停工停产”等严密防控措施，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采取的是“全政府、全社会策略”，“中国成功的联防联控经验，值得世界学习和借鉴”。^③不仅如此，中国还本着专业、负责的精神，最大程度地发挥医疗卫生专家等专业人士在疫情防控决策中的作用；政府则根据专业防控要求和规则，细化落实防控举措，整体防疫模式呈现出全民动员、举国上阵、科学透明、实事求是等特点。

中国还深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真正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排除国界关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有形无形的阻碍，全方位、大力度推进国际抗疫合作。中国不仅在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在第一时间同世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及时公开病理解剖结

① 《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通电话》，《人民日报》，2020年5月8日第1版。

② 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20年3月27日第2版。

③ 《携手拉起最严密联防联控网络——抗击疫情离不开命运共同体意识》，《人民日报》，2020年4月3日第3版。

果、动态通报疫苗研制情况,^①而且努力向国际社会提供防疫经验和物质支持。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12日,中国诊疗和防控方案分享给了18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组织或地区组织;共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已经或正在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向20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包括706亿只口罩和3.4亿套防护服。^②中国的抗疫行动,彰显了人本精神和天下情怀,闪耀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③实践充分表明,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模式,坚持生命至上的理念,坚守生命无价的情怀,且不分肤色、种族、信仰、国家等,真诚关怀每一个生者、衷心尊重每一个生命、全力拯救每一个病患,深刻践行着大爱无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二) 以韩国为代表的有限防控模式

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度、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均采取了一定的防控措施。但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均努力在“控疫情”与“保经济”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平衡点,力求将经济、社会代价降到最低程度。这种抗疫模式虽然部分实现了“保经济”的目标,但也使得疫情持续较长时间。同属亚洲的韩国、日本、新加坡和印度,借鉴了中国“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经验,但为了“保经济”,并未采取严格管控措施:日本为了避免2020东京奥运会延期甚至被取消而造成巨大损失,只对病情严重的患者进行检测;新加坡在初期只对疑似者、有密切接触史者实施“强制休假令”和“居家隔离令”,直至外来劳工出现大量确诊病例后才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印度尽管较早下达了“全国封锁令”,但设置了很高的病毒检测门槛,使得许多患者未能被甄别出来,导致新冠病例累计确诊数居全球第5位。^④

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由于受政治制度、价值观念、

① 《中国抗疫堪称“现场直播”——携手全球抗疫 彰显中国担当》,《人民日报》,2020年5月9日第1版。

② 《担当道义,力促团结合作——瞩目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人民日报》,2020年6月12日第3版。

③ 《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值得加倍珍视——抗击疫情离不开命运共同体意识》,《人民日报》,2020年4月7日第3版。

④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ituation-reports>, 访问日期:2020年6月12日。

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始终在经济与防疫、隔离与自由、中央与地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寻求平衡。尽管中国自 2020 年 1 月 3 日起，就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世界卫生组织也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将新冠病毒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上述国家在疫情初期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即使较早宣布全国“封城”的意大利，对内也未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其“封国”举措主要针对他国入境人员；而俄罗斯则忽视了欧洲疫情的传入渠道，对从欧洲回国的俄罗斯人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从而导致疫情恶化。截至 2020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的新冠病例累计确诊数分别居全球第 3、6、7、9、10 位。^①

（三）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优先模式

美国、巴西、墨西哥、匈牙利等国，在面对新冠疫情时，由于担忧疫情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损害执政者的声誉，在初期均极力淡化疫情的危害性。这种经济优先的抗疫模式，导致美国成为全球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和病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巴西、墨西哥、匈牙利的确诊病例数和病亡率则明显高于周边国家。以美国为例，在收到中国首个疫情通报之日起的 70 天里，总统特朗普 34 次淡化新冠疫情的严重性，断言疫情会“奇迹般地”消失。^② 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技术力量在疫情防控中受到排挤或难以发声，体现在最初对欧洲是否采取旅行禁令的分歧上。它反映了美国内部将公共卫生放在优先位置的人，与决心在选举年避免对经济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的人之间产生了对立。^③

正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坚持经济优先，惧怕疫情对金融市场、经济发展、总统选举等造成影响，迟迟不愿采取严格防控措施，才导致疫情在美国的蔓延。然而，即使美国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形势十分严峻，特朗普政府依然唯利是图，漠视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会费，并大肆抹黑污蔑中国，宁愿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转移视线、

①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ituation-reports>，访问日期：2020 年 6 月 12 日。

② 《〈华盛顿邮报〉调查报道复盘美国政府疫情应对失误》，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4/16/c_1125866710.htm，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16 日。

③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疫情防控遭受质疑，华盛顿邮报长文披露：美国就是这样错过了关键的 70 天！》，<http://www.inewsweek.cn/observe/2020-04-20/9162.s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20 日。

推卸责任、嫁祸他人，也不愿集中精力抗击疫情，这深刻反映了其资产阶级的价值立场和追逐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本质。

（四）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模式

英国、瑞典等国，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政府出于避免经济陷入困境，或避免对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严重冲击等考虑，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自由放任策略，甚至寻求实现“群体免疫”。例如，在疫情爆发初期，首先提出“群体免疫”概念的英国，意图通过延缓疫情高峰到来以错开流感季节而降低对卫生系统的冲击和压力，故未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致使首相和王子等政要相继感染了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暴增。截至 2020 年 6 月 12 日，英国新冠病毒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 29 万人，居全球第 4 位，确诊病例病亡率达 14.2%，成为欧洲因新冠肺炎而病亡人数最多的国家。^①

北欧国家瑞典也是采取放任自流防疫策略的典型案列，实施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宽松防疫政策，仅建议民众减少社交接触，商场、酒吧、学校等保持开放，其公共卫生局停止了对新冠确诊病例的统计和对轻症、疑似患者的检测，其首席流行病学家甚至表示该国将实现“群体免疫”。这种放任自流的防疫策略，致使人口仅 1000 余万的瑞典新冠病毒累计确诊病例数近 4.7 万人，且确诊病例病亡率超过 10%，^② 远高于周边国家。

表 1 列举了全球应对新冠疫情的四种主要模式，即生命至上模式、有限防控模式、经济优先模式和自由放任模式。

表 1 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四种主要模式的对比（截至 2020 年 6 月 12 日）

应对模式	典型国家	累计确诊病例数(例)	累计病亡人数(例)	确诊病例病亡率(%)	每万人确诊病例数(例)	公共卫生治理机制
生命至上模式	中国	84652	4645	5.5	0.6	生命健康导向的联防联控型积极防控机制

(待续)

①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ituation-reports>，访问日期：2020 年 6 月 12 日，笔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第 143 号新冠肺炎疫情报告进行计算得出。

② 同上。

(续表)

应对模式	典型国家	累计确诊病例数(例)	累计病亡人数(例)	确诊病例病亡率(%)	每万人确诊病例数(例)	公共卫生治理机制
有限防控模式	韩国	11947	276	2.3	2.4	多方利益平衡导向的 应激型被动防控机制
	日本	17292	920	5.3	1.4	
	新加坡	38965	25	0.1	69.3	
	印度	286579	8102	2.8	2.2	
	俄罗斯	502436	6532	1.3	34.9	
	西班牙	185416	8755	4.7	22.6	
	意大利	151145	29257	19.4	23.4	
	法国	242280	27136	11.2	52.3	
	德国	235763	34114	14.5	39.7	
经济优先模式	美国	1968331	111978	5.7	61.1	特定阶层利益导向的 多方博弈型消极防控 机制
	巴西	739503	38406	5.2	35.6	
	墨西哥	124301	14649	11.8	9.7	
	匈牙利	4027	551	13.7	4.1	
自由放任模式	英国	290147	41128	14.2	44.1	经济利益导向的政府 无为型消极防控机制
	瑞典	46814	4795	10.2	47.6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ituation-reports>，访问日期：2020年6月12日。其中，中国的数据包含了港澳台地区，每万人确诊病例数由各国累计确诊病例数与其总人口之比计算得出，确诊病例病亡率和每万人确诊病例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第143号新冠肺炎疫情报告得出。

纵观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四种主要模式，它们反映了不同的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其中，生命健康至上的中国模式，属于生命健康导向的联防联控型积极防控机制；以韩国为代表的有限防控模式，属于多方利益平衡导向的应激型被动防控机制；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优先模式，属于特定阶层利益导向的多方博弈型消极防控机制；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模式，属于经济利益导向的政府无为型消极防控机制。不同治理机制背后体现的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区别，即究竟把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还是将经济发展、政治利益等放在首位，四种模式呈

现出重心从前者逐渐转向后者、依次递进的关系。图 1 的数据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正如图 1 所示, 尽管中国模式的确诊病例病亡率 (5.5%) 并非最低, 但每万人确诊病例数最低 (0.6 例); 虽然新加坡、俄罗斯、韩国、印度的确诊病例病亡率较低, 分别为 0.1%、1.3%、2.3%、2.8%, 但每万人确诊病例数分别为 69.3 例、34.9 例、2.4 例、2.2 例, 明显高于中国; 采取自由放任策略的英国和瑞典, 每万人确诊病例数和确诊病例病亡率均居各国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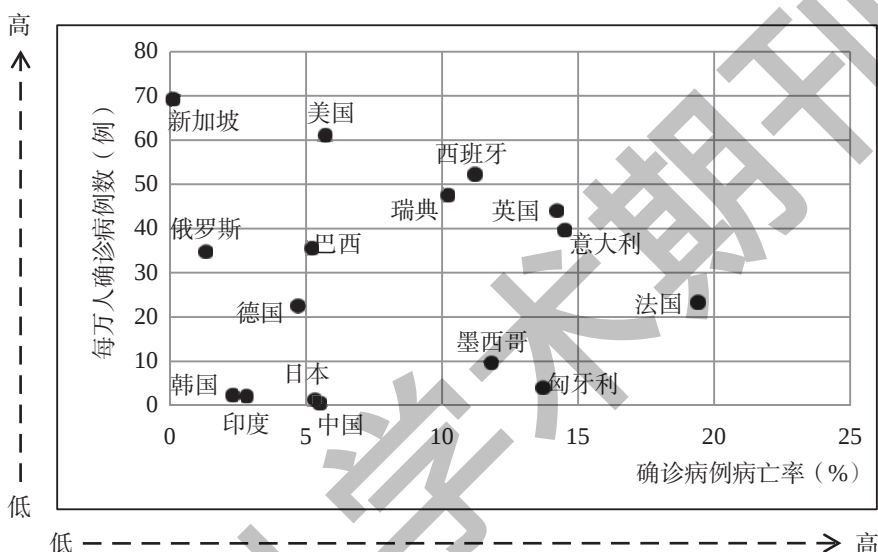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主要国家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和病亡率比较图

二、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扩散, 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国际人员往来密切造成病毒的传播。相反, 正是由于全球化还不够深入、各个国家 (或地区) 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不够完善, 未能形成全球“一盘棋”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才使得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在疫情的冲击下暴露出诸多缺陷。

(一) 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作为负责卫生事务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拥有 194 个成员国的世界卫生组织是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最权威、最专业的国际机构，在突发传染病的早期检测预警、协调防控策略、共享诊治方法、组织国际援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①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不可或缺。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及时通报并分享病例信息、发布感染防控指导建议、启动团结应对基金、建立全球检测网络，对协调全球力量共同防控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权限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调动全球相关资源、协调各国（地区）合力应对疫情方面的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尤其是美国不仅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会费，特朗普政府还肆意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未能及时分享疫情信息和提供防疫政策建议，企图借此转移视线、掩盖自身抗疫不力的事实。究其原因，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关注公共卫生安全往往与自身利益相结合，美国与欧洲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争夺在国际公共卫生机制中的话语权。^②世界卫生组织未按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逻辑，而是基于事实对中国抗击疫情给予充分肯定，引致了美国的非议和胁迫。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全球防控疫情的大局，给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二）国家（地区）间缺乏协调合作机制

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③然而，少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中国新爆发冠疫情后，不但未能给予必要的援助支持，反而最先采取针对性的旅行限制措施；在疫情爆发、医疗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不是集中精力防控疫情、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反而将新冠疫情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对中国的防疫药品出口施加美国认证门槛，企图以美国标准、认证贬损中国产品形象，并通过发动舆论战炒作、抹黑中国，陷入制度优劣、模式之争的桎梏之中无法自拔，甚至发起索赔诉讼，妄图转嫁国内矛盾，对全球合作抗击疫情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① 《必须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抗击疫情离不开命运共同体意识》，《人民日报》，2020年4月8日第2版。

② 赵磊：《以国际合作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学习时报》，2020年4月17日第2版。

③ 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载《求是》，2020年第8期，第1—5页。

在国际关系中，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应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①避免出现单边思维、孤立主义的行为。然而，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许多国家（或地区）之间非但没有充分沟通协商、协调合作抗击疫情，反而各自为战、以邻为壑，数十个国家（或地区）对防疫物资出口进行“一刀切”的限制，甚至截留、争抢防疫物资，严重损害了国际间合作抗击疫情的互信。事实上，全球抗疫的根本成功取决于应对疫情能力最弱的国家，即木桶原理中最短的那块木板。因此，建立开放透明、快速响应的互助合作机制，尤其是发达国家加大对医疗条件落后国家的帮扶力度，才是全球合作抗击疫情的正确选择。

（三）疫情数据的统计报告存在明显缺陷

客观及时地统计和发布疫情信息，对于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有效防控措施、民众正确认识和对待新冠疫情至关重要。然而，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初期对疫情防控重视不够，在事实上已发生社区传播甚至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情况下，对病例的检测、报告和数据统计发布不及时，加之美国疾控中心统计的确诊病例需核酸检测呈阳性并经其认定才算确诊，此后甚至停止发布与检测人数和死亡人数相关的数据，使民众难以真正意识到新冠病毒的危害性，在应对上疏忽大意，导致美国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从全球视角来看，由于缺乏可执行的统一标准，各个国家（或地区）在病例检测、报告体系上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受检测意愿和检测能力的制约，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检测范围有限，一些无症状患者和未经筛查检测便已死亡的病例未被纳入统计数据之中，导致疫情数据失真。不仅难以发挥应有的预判、预警依据作用，甚至误导疫情防控。而部分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自身疫情数据统计报告混乱、政府管理缺位而依靠大学和新闻媒体发布疫情数据的情况下，却意图通过质疑他国疫情数据真实性来转移视线，严重影响了全球疫情数据的共享和合力抗击疫情的互信基础。

新冠疫情暴露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背后，是一些西方国家畸形的资本逐利行为。在资本贪婪追逐利润的驱动下，将少数阶层的经济利益置于广大民众的普遍利益之上，充分显露了资本疯狂逐利的病态。资本追逐个体利润最大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23 页。

化的本性与全球共同体的整体发展之间存在主体与客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产生全球性问题的根源。^① 因此，要破解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上述困境，就必须在理念和行动两个方面同步推进相关机制建设，尤其是必须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深印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中。

三、新冠疫情对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启示

新冠疫情在带来冲击的同时，也给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创新带来了新契机。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② 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应该遵循“多边共治”原则，凝聚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政府、企业、社会乃至普通群众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共同的力量，形成联防联控的大格局。



扫码关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免费获取完整版电子专辑

关于后疫情时代¹ESP 教育改革的思考^{*}

莫莉莉 浙江万里学院

提要：全球化的发展将ESP教育推向一个新阶段，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则对ESP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鉴于此，本文在梳理ESP教育最新进展的基础上，对后疫情时代ESP教育理念、教学方式展开讨论，提出面向未来和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教育理念。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构建基于深度主动学习理论的ESP教学模式，深化后疫情时代ESP教育改革。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ESP；教育改革；教学重构；深度主动学习

1.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新时代人才教育的核心之一是国际化能力，而外语能力，特别是英语能力则是这一系列国际化能力的基础。有学者指出，全球化的世界需要全球化公民来应对我们面临的各项国际化挑战（Chmelikova & Hurajova, 2019）。在此背景下，ESP教学对高等教育至关重要。

ESP与EGP（通用英语）对人才培养的侧重点不同。EGP可拓宽国际视野、百科知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综合素养，而ESP则可提升专业知识、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的能力以及学术素养（文秋芳，2014）。EGP侧重国际视野和综合外语能力和素养的提升，而ESP侧重专业知识、专业交流以及学术素养，更多的是发挥工具性作用。

ESP包含学术英语、商务英语、法律英语等各类专业英语（Muñoz-Luna & Taillefer, 2018; Kenny et al, 2020），宗旨是借助英语教学提升学习者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Kenny等（2020：1）认为：“ESP通过英语教学满足学习者在特定领域用英语交流的需求。除用于商贸和科技用途之外，当前ESP包括学术英语、医学英语、商务英语、法律英语以及社会文化用途英语等。”ESP的核心特征是满足特定领域特定学习者的具体需求，因此需求分析是ESP教学的基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外语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教室、图书馆等物理空间，虚拟空间的在线教育受到较大关注，线上、线下互动的混合式教学逐步成为主流教学方式。而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使得包括ESP教育在内的各类教育平行移到网络与云端，在线教学骤然成为唯一的教学方式。在此背景下，如何保障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学生学习参与度、保障学生学习投入度，成为教育者绕不开的话题。以上问题均涉及ESP如何教和怎样学的问题，但问题的背后则是ESP教育理念更深层的问题。

1 后疫情时代，在时间上，是指疫情过后或者疫情被完全控制之后。当前还处于过渡期，后疫情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

* 本文系2018年浙江省教改项目“交叉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创新路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jg201802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次疫情对教学时间、空间、内容以及方式带来根本性改变，也将诸问题摆在ESP教育者面前。比如，ESP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什么？究竟哪些内容是ESP教育必须传递给学生的？哪些能力是学生必须提升的？如何高效开展网上ESP教学？等等。

2. ESP教育研究现状分析

闵小梅、张文霞（2018：105）发现2000—2016年ESP研究主要聚焦ESP教学，涉及需求分析、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教材选编等内容，对教学评估、师资培养、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极少。此外，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自主学习、个性化教学、信息化教学等方面的探索，对学习者的学习方式的研究需要加强。因此，在ESP教育后疫情时代的改革和提升中，这也正是大有可为的一个领域。

近年来，各领域的ESP研究都取得新进展。张法连、朱洁（2017）研究“一带一路”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时提出，不同类型的高校应采取分层分类法律英语教学，分别构建适合学习者不同学习阶段和不同层次的法律教学体系。卜青妮等（2018）实证研究中国南方某高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ESP学习动机减退的问题时发现，ESP学习动机减退主要表现为课堂参与度低、被动参与、学习积极性低、课堂及课下学习效果差，而影响动机减退最重要的因素是学习者内部因素（如学习目的），而内部因素又受教师、学校管理及教材等外部因素调控。

需求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在ESP教学中广受关注。蔡基刚、陈宁阳（2013）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出发，曾对ESP需求分析进行系统讨论。鉴于医生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可以为学生职业规划以及学院课程设计提供参考，李黎、李霄翔（2019）采用问题导向的需求分析方法，对学生和医疗工作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了医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审视了现有英语课程设置。卢凤香等（2018）从需求分析视角出发，提出医学ESP课程体系建设分层次、分阶段、模块化的课程体系构建方案。

近几年，ESP教师教育研究取得新进展。Xu et al（2018）借鉴学习管理系统理论，在TPACK框架下考察ESP教师培训的个人学习环境问题及ESP教师自我管理学习能力的提升。Xu & Sun（2019）采用混合式研究方法对中国高校ESP教师的TPACK能力展开研究。不得不说的是，“ESP课程目前在国内尚未真正形成一只专门的教学队伍，ESP教师主要由大学英语教师和少数专业教师构成”（孔繁霞，2019：36）。

疫情带给外语教育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两个关键力方面，即自主学习动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王教凯，2020）。前者涉及由被动听讲到主动学习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学习者学习内驱力的提升；而后者聚焦学生对学什么的选择和如何学的策略提升，关乎学习者对学习本身的认知。该研究提出自主学习能力包括动力和能力两个层面，是对自主学习能力认识的拓展和深化，对外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技术以及新兴教学方式如移动设备、翻转课堂等在ESP教学中的应用也逐步受到关注。Muñoz-Luna & Taillefer（2018）从双重视角切入，讨论了ESP教学中的学术英语和职业英语中新兴技术应用，一是将教师和其他语言专业人士看作在线活动及技术应用程序的数字技术使用者，二是从教师和专业人员的实践经验出发将其看作应用程序创造者。Mori（2018）发现翻转课堂是深化主动学习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有助于提升学习者的主动学习能力和主

动学习效果。Nhật et al (2019) 实证研究了越南某高校ESP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发现该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还有助于改善学生的学习态度,增强学生学习信心,提升学习参与度。

美国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国家研究委员会报告强调了深度学习对培养21世纪生活与工作能力的重要性(Pellegrino & Hilton, 2012)。来自多个国家的研究者针对ESP探索与挑战、ESP特殊技能教学、ESP教师职业发展、基于内容和语言的整合式学习及学术英语研究等内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系统讨论了当下ESP教育现状及实施路径(Kenny et al, 2020),对我国ESP教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3. 后疫情时代ESP教育改革路径重构

3.1 重塑面向未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ESP教育理念

经过此次疫情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逐步从概念走向现实,作为社会现实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由此,高校ESP教育应该培养具备处理应急问题的能力、进行国际沟通的能力和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的专业化人才。

随着全球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的外语教育尤其ESP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外语能力,尤其ESP能力成为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商务、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的关键所在。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等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原有学科的界限,并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提升学科互鉴优势,拓展学科发展范围并深化学科向纵深发展。

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外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不难看出,两者并非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是可融为一体进行考查。ESP教育需要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将外语、专业、学科等打通,帮助学习者获取专业知识、提升专业技能,拓宽学习者国际视野、学术视野和专业范围,成为其提升人文素养的主要途径之一。

ESP教育不仅是外语类院校或者综合类院校外语人才培养所关心的话题,也对高等教育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培养有重要意义。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海量信息,借助外语所传递的国际舆情,以及国内外媒体对新冠疫情报道中所呈现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看问题的立场与视角等,不仅为外语学习者提供大量学习内容,同时也引发了研究者对外语教育,尤其ESP教育的重新思考。

突发的新冠疫情将中国和国际社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原有的时空间隔、语言障碍、文化距离逐步被打破,在信息传播、交流方面几乎同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变得更加清晰。外语能力,尤其ESP能力成为连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其作用远远超出翻译或跨文化交流本身。ESP能力培养已不单单是语言知识和技能之争,也不仅仅是外语的人文性和工具性之争,而是关乎国家安全、国家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声音对外传播的力度和效果,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定位和地位等问题。

重塑后疫情时代ESP教育理念,首先要厘清ESP教育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场域。ESP教育的重心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下,培养跨语言、跨文化、跨文明、跨行业、跨

国界的交流能力,以及通过提升ESP能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共情能力的新时代专业人才。ESP教育理念应定位为面向人类、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教育。后疫情时代ESP教育必须处理好ESP教育和通用外语教育、专业教育及其所处的社会场域和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唯有将ESP教育置于更大的空间和场域进行多方位审视才能认清其在学科内部、学科之间以及学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所处的地位。

鉴于后疫情时代ESP教育方式的转变,新学科范畴内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化,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国际视野、国际沟通和国际共情能力的要求,ESP教育既不能固守原有学科范畴,也不能仅仅针对国际与国内市场需求分析,其目标应当是培养能立足本土、服务全球、扎根当下、面向未来的,具有外语沟通能力、应用能力以及借助外语实现可持续专业发展能力的新时代ESP人才,终极目标则是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

3.2 重构基于深度主动学习理论的ESP教学模式

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作为一对概念,于1976年由Marton和Säljö正式提出。深度学习关注分析、评价与创新等高阶思维,浅层学习关注记忆、理解与应用等低阶思维。深度学习是一种基于理解的学习,“强调学习者批判性地学习新思想和新知识,把它们纳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将原有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从而帮助决策、解决问题”(焦建利、贾义敏,2011:39)。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教育者和教育研究者对深度学习关注增多,逐步构建起深度学习国际教育网络(Matsushita,2018)。

主动学习是“让学生参与到正在做的事情中去并反思所做之事”,即先行动再通过反思这些行动而学习;而深度主动学习则是“一种学习目标,旨在让学生通过与他人互动来参与社会,帮助学生将他们现学知识和已学知识及经与未来生活联系在一起”(Matsushita,2018:11)。Mizokami将主动学习定义为“超越单向知识传输的讲授式教学(=被动学习)的所有类型的学习,要求参与活动(写作、讨论和汇报)并将这些活动的认知过程外显”(2018:79)。主动学习旨在结束“仅关注输入、单向、被动”的教学方式,以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Matsushita,2018:17)。

不过,主动学习虽然可以有效促进学生在学习中的参与度,但弊端是过度关注任务及参与,容易流于表面,学习深度不足。由此,关注学习方式的主动学习和关注聚焦学习质量和学习内容的深度学习有效融合,深度主动学习应运而生(Matsushita,2018)。后者同时关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教学效果,对中国ESP教育和教学具有重要理论借鉴和指导意义。深度主动学习的目的是帮助学生通过与他人互动而最终能参与社会活动,帮助学生将现在的学习和过去所学以及未来所需联系在一起,因而既是面向未来的学习,又将当下和过去所学知识进行有效衔接,目的是解决未来生活可能面临的问题。这对培养面向未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ESP能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深度主动学习理论提倡通过提升学习者学习内驱力开展主动学习,提升学习者知识应用能力、创新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该理论对ESP教学模式重构的借鉴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ESP教学从教师教学端转移到学习者和学习端,有助于解决当前ESP教育对学习者的关注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通过培养学习者的深度学习能力,提升其对跨文化问题沟通和解决能力,以及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能力,解决知识和能力割裂问题,实

现学用互促、知行合一。学习者能力培养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提升面向未来的可迁移的深度学习能力。

4. 结语

在人类命运如此紧密相连的后疫情时代,ESP教育需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与重构,需要ESP教育一线工作者、教育研究者、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的跨界合作。面向未来和人类共同体的ESP教育理念,将ESP教育从个人能力提升到国家人才培养层面,从服务市场需求提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层面,有利于从不同高度和视角重新审视ESP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

本文借鉴深度主动学习理论,倡导实现学习者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转变,由知识学习到知识应用,再到跨文化、跨专业、跨界问题解决能力的转变,这样才有助于实现ESP人才满足社会需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目标。

参考文献:

- CHMELIKOVA G, HURAJOVA L, 2019. ESP teachers in the world of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J]. *The journal of teaching English for specific and academic purposes*, 7(4): 443-452.
- KENNY N, IŞIK-TAŞ E E, HUANG J, 2020.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instruction and research: Current practices,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 [C].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 MARTON F, SÄLJÖ R, 1976. On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I Outcome and process [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6: 4-11.
- MATSUSHITA K, 2018. Deep active learning toward greater depth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C]. Singapore: Springer.
- MIZOKAMI S, 2018. Deep active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learning theory [C]//MATSUSHITA K. Deep active learning toward greater depth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Singapore: Springer: 79-91.
- MORI T, 2018. The Flipped classroom: An instructional framework for promotion of active learning [C]//MATSUSHITA K. Deep active learning toward greater depth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Singapore: Springer: 95-109.
- MUÑOZ-LUNA R, TAILLEFER L, 2018.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C]. Cham: Springer.
- NHẬT N Q, LEE K W, DUNG N N P, 2019. Incorporating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in an ESP class: A quantitative study [J]. *The Asian ESP journal*, 15(3): 125-169.
- PELLEGRINO J W, HILTON M L, 2012. Education for life and work: Developing transferable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he 21st century [R].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 XU X S, CHAN F M, SUN Y L, 2018. Pers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 experience with ESP teacher training [J].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DOI: 10.1080/10494820.2018.1552872
- XU X S, SUN Y L, 2019. A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framework for ESP teachers in tertiary education in China [J]. *The Asian ESP journal*, 15(3): 193-227.
- 卞青妮, 徐海女, 刘凯, 2018. 中国高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ESP学习动机减退研究[J]. *中国ESP研究*

(2): 52-68.

蔡基刚, 陈宁阳, 2013.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专门用途英语需求分析[J]. 外语电化教学(5): 3-9.

焦建利, 贾义敏, 2011. 学习科学研究领域及其新进展——“学习科学新进展”系列论文引论[J]. 开放教育研究(2): 33-41.

孔繁霞, 2019. 高校ESP教师能力发展框架设想[J]. 中国ESP研究(1): 35-44.

李黎, 李霄翔, 2019. 基于需求分析的ESP课程体系优化与升级——以东南大学医学院教改实践为例[J]. 中国ESP研究(1): 45-57.

卢凤香, 田甜, 李星明, 刘涵, 2018. 基于“需求分析”的医学院校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优化建设[J]. 中国ESP研究(1): 27-36.

闵小梅, 张文霞, 2018. 国内ESP研究现状与研究热点分析(2000—2016年)[J]. 中国ESP研究(2): 105-117.

王教凯, 2020. 云端教育变革时代: 全面育人需把握两个关键力[N]. 教育思想网, 2020-03-24.

文秋芳, 2014. 大学英语教学中通用英语与专用英语之争: 问题与对策[J]. 外语与外语教学(1): 1-8.

张法连, 朱洁, 2017. 论以市场为导向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以法律英语教学为突破口[J]. 中国ESP研究(2): 1-10.

作者简介:

莫莉莉 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研究方向: ESP、外语教育与实践。通信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钱湖南路8号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邮编: 315100。电子邮箱: molili@nbu.edu.cn